

自序

當我草晚明史籍考的時候，凡關於明季黨爭和社盟的材料，隨手札記下來，想作一篇明清之際黨社運動的文字。及至晚明史籍考草成以後，承袁守和先生厚意，在北平圖書館爲我印行。但關於此項史蹟，雖然積稿成堆，仍沒有把他整理。

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從日本歸來，仍服務北平圖書館，在編纂室中我把舊稿從事整理。同時朱桂辛先生又約我到營造學社編營造書目。那時我唯一的興趣，就是寫這篇文章。其間雖然荒廢了館務，疏忽了學社的屬託；但是費了三個月的功夫，終把這篇文章寫完成了。

我寫這篇文章的宗旨：因我昔年，讀全謝山鮎埼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覺得明亡雖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於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章，就以黨爭和結社爲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我覺得要得到一般讀者的同情，還是以語體文寫，較爲便

利一些：因此事實則引據原書，敘述則文由己出，但爲讀者不感枯燥起見，有時文章也不免稍爲煊赫一點。

二十二年秋，來中央大學講授明清史，就把他拿來作講義。並且從新修改一下，我感覺所謂「煊赫」的地方，總歸於不忠實，遂把他刪去了，仍鈔錄原文以存真相。又把重複的地方，重改過，遂成了這篇稿子的樣子。並把以前作的明季奴變考，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附在後面，都爲一集。

已經隔過二三年的文字，再來校讀，時過境遷，思想見解已與昔日不同。結果總覺著不滿意；而且現在我治明清史的興味，已經沒有以前濃厚了。我想由清初以上推到遼金渤海的歷史，來作東北史整個的研究；又想讀點史學基本書籍，以藥不學之苦。這幾篇文字，在我的治學史上如白雲蒼狗已成過去，存此一集，聊覘我治學的過程罷了。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記於國立中央大學教職員第一寄宿舍。

目次

一	引論·····	一
二	萬曆時代之朝政及各黨之紛爭·····	一四
三	東林黨議及天啓間之黨禍·····	四六
四	崇禎朝之黨爭·····	七二
五	南明三朝之黨爭·····	九九
六	清初順治康熙間之黨爭·····	一一七
七	復社始末上·····	一四五
八	復社始末下·····	一七二
九	幾社始末·····	一八七
十	大江南北諸社·····	二〇四

十一	浙中諸社附閩中諸社·····	二一六
十二	粵中諸社·····	二四〇
十三	餘論·····	二五〇
附錄一	明季奴變考·····	二五七
附錄二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	二九〇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一 引論

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會裏，有一種現象；一般士大夫階級活躍的運動，就是黨。一般讀書青年人活躍的運動，就是社。「黨」和「社」名詞雖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覺的現象。如今我把黨社的意義和他簡單的趨勢分開來說：

一 黨

吾國古代，像漢代的黨錮，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元祐黨人，本來就有黨爭的事情了；但爲什麼到了明末又會有黨爭的事件發生呢？吾國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黨爭的事件，都是在每個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來抗議，羣小又起來挾私相爭，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所以人民提起來都頭痛，但我以爲黨爭的發生，至少，是一種人民自覺的現象，同時與國家政治的制度也很有關係。所以在一個

不良的政治之下，而有黨爭的事件發生，也可以說是人民自覺的進步。但要是諸黨相軋，也有極大的危險。楊公達撰政黨概論引季特爾（Gettell）的話：

『政黨是一部份，有組織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單位，根據其選舉權的使用，去參加政治，監督政府，以實現其主張。』

吾國的黨爭，雖未必與歐洲的政黨相同，但我以為黨爭的發生，至少須有兩個條件：一是人民必須有發揮言論自由權；一是政府必須有發揮言論的機關，合這兩個條件，然後才有黨爭的發生。在專制時代，人民沒有發言的機會，那會有黨爭的事情？但是在吾國唯一專制的政局，像秦皇漢武這樣的很少。就是在秦皇漢武時代也有御史制度之設。晉書百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杜佑通典：『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因為在古代御史大夫制度是監察政府的機關，其來已久，並且漢代太學的生徒也有發言的權利。所以在政治清良的時代，看不出來有黨爭的事，但是到政局崩壞的時候，政府裏既然設了彈劾政府的機關，那麼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彈劾政府，而一般讀書的人，也要借機會來譚論國是了。

到了明代，內閣的權較低，而御史的權更高了。並且讀書的人，也有發言的機會，這不能不算政

治的進步。所以我們要研究明代黨爭之所以發生，不能不先明瞭明代的官制。

明代雖沿著漢唐的舊制，但監察機關的權特別的高。明代的官制是：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到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祇備顧問。殿閣大學士的黜陟由於閣臣的會推。到了宣宗時候，政柄無論大小，悉交大學士楊士奇等辦理，內閣的權日重，到了嚴嵩等當朝，權更高了，和真宰相差不多，六卿皆歸內閣節制。這是明代的行政機關。同時監察的機關是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之職，直隸於都察院，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的設置。明史職官志云：

『洪武十六年，陞都察院爲正三品；設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經歷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十七年陞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僉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七品。建文元年，改設都御史一人，革僉都御史。……宣德十年，始定爲十三道。……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十人。……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及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員。

御史的職權，明史職官志云：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鞠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其奉勅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

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勉勵學校，表揚善類，翦除豪蠹，以正風俗，振綱紀。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

給事中的官職，及其職權，明史職官志卷三云：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鈔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

御史是監督內閣的機關，六科給事中是稽察六部的機關，並且有封還章奏的權力。至銓敍的

機關是吏部吏部黜陟的責任，惟一是考察。明史職官志卷一云

『凡內外官，給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平常不稱職而陟黜之，陟無過二等，降無過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己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職者降罰有差；四品上自陳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撫按官，各綜其屬三年內功過狀，註考彙送覆核，以定黜陟。』

同時內監爲君主的近侍，是傳達命令，出納章奏的機關，他的權柄也很大。明史職官志序上說：『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

由上諸端，我們可以明白明代的官制。（一）行政機關，內閣僅備顧問，責任六部，共任天下的事。（二）監察機關，御史大夫是監督政府的機關；六科給事中，是監察六部的機關。（三）銓敍的機關，大臣是會推，小臣是考察，吏部的考察，是進退官吏的惟一機會。觀以上的制度，似乎是很完備了，但到明代中葉，卻發生了變化。內閣的權高了，六部不能不聽命於內閣，銓敍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御史大夫監察的機關，不能不出來彈劾政府，政府自然而然的與言官相水火了。言官是代表一

般的輿論人民多同情於言官，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內閣的勢力稍一低落，則不能不勾結言官；御史大夫們，那能個個人品靠得住，所以就自己分了黨派。自張居正以後，一班庸愚的宰相，像沈一貫，王錫爵之流，他們只知道鞏固地位，傳衣鉢，那知道國家的大計。東寇日逼，朝事日紛；那一般內監們，趁著機會起來，攫奪了政府的實權，宰相們反得聽命於內監，御史大夫和六科給事中，與內監成了對敵的現象，那時候，黨禍之勢就成了。

凡萬曆時代之朝政。我們所知道的所謂：國本論，三王並封，建儲議，福王之國，楚太子獄，科場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憂危竑議，妖書，熊廷弼案等事，一直到挺擊，紅丸，移宮等三大案，這都是他們的爭端，凡當時紛爭的人，像東林，齊，崑，浙，宣等黨，是他們的黨派，他們討論的焦點，拿現在的眼光來看，似乎過去；但他們倔強不撓的精神，是可佩服的。

到了天啓年間，魏闡當政，崑，浙，宣三黨投降了內監，把以前最紛亂的案件都歸納到三大案裏面造成了三朝要典，東林黨人榜等書，可算是把東林的勢力壓下去。但崇禎初立，消燬三朝要典，更立逆案；東林的勢力又膨脹起來。但我們看崇禎一代，錢謙益，周延儒的相爭，周延儒，溫體仁的相傾，袁崇煥的被戮，鄭鄤的獲罪，姜采，熊開元的廷杖，他們的背景，都脫不了兩黨的暗鬭，而把東，會的侵

路，彷彿形若無事的一樣。一直到了北都不守，清兵南下，福王弘光帝即位南京，半壁的天下，應該和衷共濟了，但福王之立，馬士英阮大鍼重修要典，僞太子，僞皇妃之獄都脫不了，黨爭的糾紛。可憐隆武處福建，魯王監國海島，他們還要辨白叔姪的名分，桂王僅有雲貴兩省，他們臣子還分了吳黨，楚黨，直至呪水之役，同歸於盡，纔算完事，這真是又可憫，又可笑了。

平心而論，魏黨的跋扈，禍人誤國，固不足道；但東林太存意氣，在形如累卵的時局，他們還要鬧家務，還存門戶之見，置國是於不問，這也太不像話了；但是一般無恥的士大夫，明代覆亡之後，既入仕新朝，就好好作官罷了，他們在一個雄猜之主，康熙帝的掌中，偏偏的要鬬一點心智，自相傾軋，假道學的名義，來行其奸詐，士大夫的氣節就此掃地，真可謂黨爭的末路了。這一套的假面具，我們不能不爲他揭破。

由上我們看來，在萬曆年間，東林和三黨之爭，他們所爭的有宗旨，有目標，到了魏闕專權以後，他們好像鬧家務，目標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萬曆間是東林與三黨相爭的時期，天啓間是魏黨專橫的時期，崇禎至永曆是兩黨相軋的時期，康熙初年是黨爭的末路。

二 社

社這個名詞，來源很久，說文社字下云：「地主也，從示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人民在所住的地方，祭他們所居住地方的神祇，封土以爲記號，那就是社，周禮所謂社是祭神的地點，春秋是祭社的時間，因此有春社秋社之稱。周禮所謂州社，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漢代有鄉社里社的名稱，由社爲一地之主，因其地而引申爲社會的組織。後來習武備的叫作社，文士的結合也名作社，像晉代的惠遠蓮社，宋代胡瑗的經社，元代的月泉吟社，這都可以說明代結社的起源了。俞正燮癸巳存稿云：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按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錄解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吳自牧夢梁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踢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八股語錄，幾社多奇士偉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拿究，皆非社而冒稱社，俗之敝，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

文人的社集，到了明季最繁盛了，但是爲什麼到了清代，有這樣的嚴厲禁止，這很有研究的價值。我們知道明代以入股取士，作八股的，須要識得風氣，知道一時的風尚，文章才不至落選。比仿儒林外史上，馬二先生說：『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弘又是一變，』文章要變的時候，這非揣摩他的風氣不可。所以一般書店，就借此機會，選出幾篇文章來牟利，而這般書店的老板非借重一般選家，或者可以說是操選政的名手不可，所以馬二先生之流，就可以在西湖上大出風頭了。

因此一般士子們集合起來習舉業，來作團體的運動就是社，他們或十日一會，或月一尋盟，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幾社六子，自三六九會藝，詩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遊，澹若忘者。』並且社事的集會，有讀載書歆血等事，所以又名作社盟。而他們集合同社的文章，選出來，就是社稿。只要社稿能得一時人的景仰，那末他的社一定可以得到勢力了。

在萬曆天啓年間，江西艾南英，陳際泰，章世純，這一般人，他們號召成弘派的文章，來改革當時的風氣。當時一呼百應，很披靡一時，艾千子常從南昌跑到江浙蘇杭的地方去選文，他的勢力，就此可以概見。

那時候太倉的張溥，他利用這個機會，就將張采等所成立的應社，與孫淳吳翀所辦的復社合

併，第一步就提倡銘經鑄史的方法，來改革主張弘派的文章，不久他的社員皆中了高科，這是他的計劃成功了。第二步他就利用以羣衆作後盾去干涉政治，明崇禎間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換。這時候一般讀書人的勢力有這樣的偉大。所以我們看吳應箕的復社姓氏錄上，他聯合全國的士子不下二三千人，他綜合北至山東南至湖廣的小團體，不下有數十個，這樣的狀況，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就是東漢的黨錮，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結社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風氣，文有文社，詩有詩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廣東，江西，山東，河北各省，風行了百數十年，大江南北，結社的風氣，猶如春潮怒上，應運勃興。那時候不但讀書人們要立社，就是士女們也要結起詩酒文社，提倡風雅，從事吟咏（見照世杯小說）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緣加入社盟了（見二刻增補警世通言小說）。

社盟的成立，既然這樣的繁盛，他們結社會朋，動輒千人，白下，吳中，松陵，淮揚，都是他們集會之所，秦淮河畔，槳聲，鐙影，虎丘池邊，塔影，夕陽，桃葉，問渡，小院，留人，這種景況，我們讀了王士禛的秣陵新詩，『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的詩，彷彿還見其蹟。張天如的國表序說：『社集之開，胥閭之間，維舟六七里，平廣可渡，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陳去病的五石脂說的更好：

『據父老傳說，第就松陵下邑論，則垂虹橋畔，歌臺舞榭相望焉，郡城則山塘尤極其盛，畫船燈舫，必於虎丘是萃，而松陵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集會，輒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風波爲苦也。聞復社大集時，四方士子之拏舟相赴者，動以千計，山塘上下，途爲之塞，迨經散會，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侶，經過趙李，或泛扁舟，張樂驩飲，則野芳濱外，斟酌橋邊，酒罇花氣，月色波光，相爲掩映，倚闌騁望，儼然驪龍出水，水晶宮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飛瓊王喬，吹瑤笙，擊雲璈，憑虛凌雲以下集也。』

在這流連詩酒，談笑歌舞的當中，猛然霹靂一聲自天而降，想不到的清兵，自北而來，無情的鐵蹄，踏破了金陵，掃蕩了河山，這一羣士子，由詩酒結社之逸情，一變而爲殺敵滅仇的偉舉，死的死亡，亡的亡，有志的青年，大半都爲國犧牲了性命。頹廢的老者，也入山當了和尚。那時候清兵由江蘇一直殺到廣東，我們的華族，至死不屈，就是留下一二的殘黎，像王翊李長祥等人，他們還在浙江的大蘭山，安徽的英山、霍山，依巖結寨，鬧了五六十年。我們知道他們唯一對敵的方法就是抵抗，他們自衛的方法就是不屈。像這般有爲的青年，大半是社局中人。到了時過境遷，澄江一碧，惟餘嗚咽之水和兩三點寒鴉的晚噪，漁夫樵子們還在那裏唱著山歌，靜寂的山光，無情的煙水，這些壯士的英靈，又上那裏去了。我們讀了孔尚任的哀江南曲，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因此在社集的活動方面，我們可

以分爲三個時期：

(1) 萬曆初年的社集以文會友，是社集萌芽的時代。

(2) 崇禎年間社局，由詩文的結合而變爲政治的運動。

(3) 弘光以後，由政治的運動而變爲社會革命的運動。

我們綜合『黨』『社』兩件事看來，黨的起始建設的意思很好，但他的結果教我們很失望；社的起初，不過是論文的集會，但他的結果變成了社會上革命抗清的運動，在吾國民族精神上應當表章的。

三 以上黨社的情形大概如此，至關於黨社的文章在我未作此篇以前，朱邊先先生希祖指導他女兒朱倭撰有南應社考，中江社考，讀書社考等篇，對於黨社的一部分，已經有很精詳的撰作，但我爲什麼還要寫這篇文章，我不能不敘述一下：

(1) 「黨」與「社」是在吾國近古，政治上和社會上是很要緊的一種運動，與國民黨的發生很有關係，要知現在黨的建設，不能不知以前黨的來源和他的背景。

(2) 明代萬曆年間的政治最爲複雜，像三王並封等事，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似乎沒有什麼

關係，但京察諸事，與明代的制度卻很重要，所以我們不能不明白他的最簡單的歷史。

(3) 由東林黨的發生，一直到社事的終止，差不多有百年之久，這裏邊的變動很多，很可以見到明末清初的社會狀況。

(4) 南明雖然不久就滅亡了，但是與吾國民族興亡史上很有關係，我們必須加以研究。

(5) 我們要知道，明代鬧黨最利害的時候，就是清兵入關最緊急的時候：這是極應注意的一件事。

我懷著這五個思想，所以想把黨社的來源和背景，作一個有系統的介紹。至於考證精湛的作品，還希望將來專家補助我的不足。我作這篇文章，我最誠懇的聲明：我不是要爭奇鬪博，來誇耀我的作品。我們要明白的是明末清初的幾個書獃子受壓迫的民衆，他們不怕清兵的鐵蹄，就是粉身碎骨，他們都甘所不辭。這就是我中華民族的國民性，這就是我中華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中華雖然屢遭外族的侵略，而能長久存在的精神在此。以往的先烈們，看來是失敗了，但他們的成功，也就在此。諸君要注意，凡是爲我民族造幸福，凡是事業成功的創造者，都是受壓迫的人呀！

二 萬曆時代之朝政及各黨之紛爭

自神宗冲年卽位，內監馮保，以兩宮的詔旨，趕走了高拱。張居正遂居了首輔的地位。居正人品的好壞，我們不去管他，但他很有政治主張，手段也非常的老辣。因此萬曆初年，財政和吏治，辦的都很上軌道。明史張居正傳說：『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萬曆初年的政治，不能不算是澄清。居正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大權獨攬，用高壓的手段，權威都歸到內閣，言官等於木偶，來取媚於內閣。居正到了晚年，位高望尊，傲慢的態度，更覺暴露無遺。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己，削了他的官職。御史劉臺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大怒，把他命杖一百，貶到遠方，卒死戍所，這已經夠不滿人意了。到了萬曆五年居正丁父憂，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這是清議所不能容的事，很起了士大夫們的公憤，像翰林王錫爵吳中行趙用賢等皆以爲不可，不聽。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論，皆坐廷杖謫斥有差。居正以爲輿論就此可以壓下，更目空一切。馮保與他勾結，通行

賄賂，官職的升降，都由他的愛憎，他的兒子嗣修等都中了高第，居正的勢力，真是炙手可熱，氣蓋一世；但是他的積怨，就潛伏其中了。言官的輿論，表面上看來，似乎已被削奪，裏面更是膨脹。而一般無恥士大夫，借著機會來彈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時相。例如趙用賢，以劾居正奪情被杖，戶部郎中楊應宿復力詆用賢。高攀龍，吳弘濟等，又來論救，皆被貶謫。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趙用賢傳上說：『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迄於明亡云。』黨論之興，就燎原於此了。

到萬曆十年，張居正死了，遂爲衆矢之的。馮保被謫，居正身後抄了家，削去了官爵。御史丁此呂等競起掊擊當道。言官被張居正壓制了十年，至此如江河千里，一瀉直下。夏燮明通鑑卷六十八云：『初，言路爲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羊可立，李植，江東之並荷上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啓愚立南京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上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尙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上爲罪啓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上乃聽巍出此呂于

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我們看繼任張居正的首輔，像申時行，王錫爵之流，他們的威望遠不如張居正，手段也不如張居正老練，他們只知道唯諾因循，來取媚於皇帝；想盡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衣鉢相傳，支持了十幾年。庸愚的萬曆皇帝，他只知道兒女之情，那知道國家的大計，儘著內閣和言官，在那裏鬧，所以到了沈一貫當國的時候，黨勢已成，一貫與次輔沈鯉，禮部侍郎郭正域不合，立儲的事彼此掣肘，鬧出妖書和楚太子獄等事出來。政治已呈了紛亂的現象，及至方從哲薦李可灼釀成了紅丸一案，沈灌教內監魏忠賢的內操，卒至宦豎當權，把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時局越發不可收拾了。

在這時局紛亂的當中，我們要明白他一個系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無已，我們只好由當時政治紛亂的現象，分成兩方面說：（一）是萬曆宮庭的紛亂和三案的發生。（二）歷年的京察，內閣和言官鬧。我們從這兩方面來作一系統的研究，庶可以得到一個梗概。

一 萬曆朝宮庭的紊亂和三大案的發生

宮庭裏鬧家務，似乎沒有什麼注意的價值，但歷代的政治，因皇帝的家裏，一點小事，可以引起社會上極大的糾紛，這種糾紛，在他那一個時代是極有關係，——因為在專制時代皇帝家私事，與朝章大政是分不開的，而且一切的事實都有時代性的問題。在現在看來是一件重要的事，但後二百年看來反不足輕重，這樣的事很多。——所以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並且說起來也很可笑。

神宗是一個風流而好安閒的皇帝，他可以好幾年不上朝，他們的朝政的好壞，我們就可想而知了。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傳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爲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侍記年月，及所賜以爲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

恭妃生子名常洛，即後來的光宗。不久，神宗又愛上了貴妃鄭氏，生皇三子，名叫常洵。鄭貴妃很有幾分姿色，所以就把鄭貴妃進封皇貴妃，並且有立常洵作太子的意思，所以早把王恭妃置在腦

後，也沒有把她晉封貴妃。禮部尚書沈鯉請建立皇太子，進封其母，不許，並罷了他的官。那些持正的老臣們，像顧憲成等，很以為不立皇太子為可慮，所以就發生了國本論。首輔申時行因循委蛇，他無有特出的見解，不能為國家作一個堅決的計劃。次輔王錫爵進三王並封之說，所謂三王並封，就是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一體並封為王，到了他們長大之後，再擇其善者立為太子。這種辦法是不妥當的。經大臣們的反對，才把此議取消。臣子們對於這個問題，非常的重視，議論紛起。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有請豫教元子之先後疏，張有德有請冊立儀之疏，御史錢一本以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有論相建儲二疏。萬曆已經好幾年不坐朝了，看了這些奏疏，極為震怒，反把冊立的事情往後退改年限。錢一本的疏上說：

「陛下覆載機穽，以饒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變之曰：此等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

一本的疏，說得非常痛快，神宗雖然把一本斥為平民，但到了二十二年，就命皇長子出閣講學。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爭國本云：

「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就此我們可以見神宗待常洛的情形了。

最可以教神宗警醒的事情，是他有一天病了，並且病得發昏過去，神宗在病困的當中，覺得自己枕在恭妃王氏的手臂上，及至醒來，見恭妃面帶悽容，淚還沒有乾，問鄭妃，則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這時候，神宗才恍然大悟，有立常洛之心。文秉先撥志始云：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瞑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溼，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祕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收。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於是冬正東宮之

位。……」

二十九年十月常洛既正了東宮之位。同時請福王到洛陽藩封的不知有多少位臣子，但神宗總不願意福王離開左右。據明史卷一百二十常洵傳上說：『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廷臣請王之藩數十百奏，不報。』到萬曆四十二年纔令到洛陽，就藩封的地位。常洵是驕奢淫佚慣了的，在河南無非是『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崇禎年間，流寇李自成從洛陽趕到開封，用河水決了開封的城，把福王擒住，將福王的玉體和鹿肉攪在一塊，同煮了一鍋肉，名作喝福祿酒，這位活寶才算了結。

常洛當時雖立爲太子，但外邊的謠言，不利於太子的話很多，在常洛被立爲太子的先後，就有憂危竑議和續憂危竑議的妖書發現。明史卷一百十四鄭貴妃傳上說：

『二十九年春，皇長子移迎禧宮，十月立爲皇太子，而疑者仍未已，先是侍郎呂坤爲按察使時，嘗集閨範圖說，太監陳矩見之，持以進帝，帝賜妃，妃重刻之，坤無與也。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匿其名盛傳京師，謂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立己子之據，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坤曾有憂危一

疏，因借其名以諷，蓋言妖也。妃兄國泰，姪承恩，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帝重譴二人，而置妖言不問。踰五年，續髮危竑議復出，是時太子已立，大學士朱廣得是書以聞，書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廣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詞尤詭妄，時皆謂之妖書。

這種妖書的發生，因郭正域與太子很有關係，有說是正域所爲的。顧荅三朝大議錄云：

「十二月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康丕揚疏斥禮部侍郎郭正域所爲，且及次輔沈鯉。上勒正域在籍聽勘，又漢中府同知胡化出首撰妖書人爲渠縣訓導阮明卿，明卿與化有夙憾，化江夏人，正域同鄉也。丕揚等遂謂化爲正域所使，自撰妖書誣明卿以脫己，巡捕都督陳汝忠緝得正域舍人毛文尙，江夏布衣王忠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共十三人……輔臣沈一貫授意刑部尙書蕭大亨，大亨屬郎中王述古，榜治胡化，令化供出正域及鯉。述古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於今日矣。』及再鞫胡化，述古立疏送大理，劫之入正域名必不可，又劫之重罪胡化，必不可，劫之禍且不測。述古恬然安之，卒不易原疏一字……」

正域因述古的守正不阿，纔能免了誣妄之罪。後來發覺刊刻妖書的人爲皦生光，專以刊刻打

詐爲生，把生光定了凌遲之罪，妖書一案才算草草了結。在妖書發生的前後，同時還有楚太子獄一事，與妖書一事很有關係，附帶著敘述於此。

原來楚恭王素有陽痿的毛病，因此沒有後嗣，恭王把這件事，常擱在心上，不久恭王死了，宮人胡氏遺腹生下兩個兒子，一個名叫華奎，一個叫華璧。據說華奎爲王妃弟王如言妾尤金梅所生，華璧爲妃族王如綽所生，妃密令承奉郭倫潛匿以入，以爲己子。華奎大了，就繼嗣楚王。楚宗華越的妻子是王如言的女兒，華越對於這事覺著很不公平，乃盟宗室二十九人，入都訐奏，同時楚王華奎也奏華越諸不法狀，那時候郭正域正署都事，頗主華越之說，但是首輔沈一貫與郭正域反對，他卻不以正域之說爲然。楚王華奎怕奪了他的地位，趕快輦金闕下，使人與郭說項，說：「只要不窮治楚事，請以餽四明相公者餽公。」正域一點不受，主張更力，羣小老羞成怒，反說華越的訐奏，係由正域所指使。（以上據文秉定陵注略。）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正域傳上說：

『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李廷機，官左侍郎。）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陽劾禮部壅闕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沈子木，官通政使。）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遺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

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域，尙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皋，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

兩方面互相訐奏，本來是楚王的私事，現在已經變成朝廷上的大政。討論的結果，神宗很主一貫的說，把華越算是誣告，華奎乃繼嗣楚王，同時也沒有治正域的罪。但正域與首輔積怨太深，不久妖書事發，又把他牽到妖書案內。那時候正域已經聽勸回籍了，正域乘船正走到楊村，被兵捕回，拿到東廠拷治。皇太子在宮內，聽到他的師傅被東廠拷掠的消息，非常的難過，教太監傳語東廠說：

「饒得我，卽饒郭先生罷！」（文秉先撥志始卷上，照原文錄。）

妖書和楚太子獄，剛剛的結束，正域也算幸免，告老還家，掀然大波的三案，就接聯著發生。

光宗可算是多災多害的命運，悲慘的日子，過了好十幾年，做皇帝不到一個月，就嗚呼哀哉了。是在他凶慘的歲月之中，卻發生了無數最離奇而可悲的事件。

當妖書這件事，平息了未久，就有挺擊的事發生，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下午酉刻時候，有不肖的兒子，手持棗木棍，突然闖進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到簷下，被內官韓本等把他擒住，

經御史劉廷元審問，知道持挺的人名叫張差，奏稱他：『迹似瘋顛，貌實黠猾。』並沒有證明他的事實，提牢主事王之案，乃證明他外面裝著瘋顛，實係有人所指使，供出由太監龐保，劉成所領導而進宮挺擊的。並上疏說：

『據差供龐公名保在薊州東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嘗往龐公處送炭，劉公名我說了劉成罷，龐保與劉成商量，叫馬三舅李外父逼我來。對我說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成跟我來，竟走進宮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前說引到京城騎馬的即龐保也……』

我們知道，鄭貴妃是常洛的對頭，妖書之事，就由於鄭貴妃而起，那末挺擊一事，縱不爲鄭貴妃所指使的，但鄭貴妃是一個嫌疑犯，是一定無疑的！這件事的發生，王之案主有所指使，劉廷元主跡似瘋顛，後來遂成兩黨對爭的口實。同時右寺丞王士昌給事中李瑾都有詳細的奏疏，神宗看著沒有法子，二十八日早上，神宗到慈寧宮謁見太后，召見大臣，執著太子的手，示羣臣說：『此兒極孝，我極愛恤他。』表白他極愛太子的意思，後經太子當著大衆，宣示他的心蹟說：

『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

爲不孝之子。』（照原文錄）

經此一番訓告，張問達首先疏請速了此局，把張差治罪，挺擊一案，就算含糊了事。到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崩後，光宗卽位，鄭貴妃的權慢慢的失去，她看著不另變對付環境的方法，是不足以自存的，以她銳敏的腦筋，首先的辦法，就獻媚於光宗的妃子李選侍，與她運動晉封皇后，請他遷到乾清宮，李選侍也請晉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如此一來，那末她覺著她的地位就可以鞏固了。他第二步就來取媚光宗。在光宗喪服還沒有滿半月的中間，鄭貴妃就進了女樂兩部，宮女四人，來討光宗的諱。可憐光宗是幽囚久了的人了，那識得這樣的擡舉，把家國的大故早置在腦後，在苦塊之中，變成安樂之所，儘不得每天的「琴瑟在御」，不到幾天就生了大病。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云：

「……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猶豫。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湯趨和藥進，上飲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九，亟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

在李可灼進紅丸之前，一般大臣像兵部給事中楊漣及左光斗等，均以方從哲辦事太不妥當，上奏摺去參他。及至光宗疾危的時候，鄭貴妃和李選侍已包圍了皇長子，好爲將來的地步，而一般臣子如熱鍋上馬蟻想不出什麼辦法。

在百忙之中，而能有鎮靜的態度，不慌不忙，把國家的大事，辦的妥妥當當，我們不能不佩服楊漣。

當光宗臨危的凌晨，楊漣與劉一燝已經急忙的進了宮庭，到乾清宮去，侍衛的人擋著不教他們進去，楊漣奮臂大聲的說：

『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明史本傳）

據明史謂：

『閹人卻，乃入臨，……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媛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漣等乃擁皇長子卽位。』

那時候李選侍已與太監魏進忠（就是魏忠賢）結合，想包圍皇長子，來把持朝政。不意楊漣，劉一燝，左光斗，出其不意的進來請皇長子卽位，並且以李選侍既非皇后，不能居乾清宮，請她卽刻

搬出宮去，費了許多周折，李選侍才應許遷到嘯鸞宮，於明日庚辰，皇長子即皇帝位，就是天啟皇帝。（以上據明史、明通鑑、先撥志始等書。）

我們看以上所述的，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不過是宮闈瑣事，似乎不值得詳細的敘述，但後來兩黨紛爭，遂成了重大的問題，相爭的焦點。

二 歷年的京察政府與言官的紛爭

我們知道萬曆初年的政治，尚不如此混亂，自從趙用賢、艾穆劾張居正的奪情案，江東之丁此呂等疏參張居正的兒子張嗣修並劾高啓愚的科場案，言路就露了鋒銑，不久張居正的內閣就倒了。可是張閣雖然崩潰，然內閣的勢力仍是存在。像湯顯祖的疏上說：『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譴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這條可以證明申時行尚可保著內閣的權威，但神宗受張居正的約束怕了，像李植、江東之等先後發居正的奸，神宗對他們非常的滿意，很想提升他們的官爵，但爲內閣申時行等所抑，於是言官和內閣就相水火了。在內閣威權集中

的時代，吏部的權，並不算重，自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尚書，稍爲振飭，到了萬曆二十年間，孫鑰做了吏部尚書，吏部的權更高，慢慢的政府和吏部起了衝突。在張居正的時代，大權獨攬，並沒有生了許多黨派；但到申時行一流的人物，做了內閣，反生出了糾葛。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申時行輩，自私心過多，首尾兩端，實在自己拿不起來，也放不下去，因此自己失了自己的信用。譬如國本和並封這兩件事，做內閣執政的，他們本可以主持一點公道，很可以得到人民的同情心，但他們虛與委蛇，既不能取好於宮庭，也不能同情於人民，他們自己根本失去了信用，言官又難怪責備他們。但內閣既經言官的責備，他們怕自己勢力的動搖，所以不惜自己一身的去就，來保持他們一系的政權，譬如沈一貫去了，他可以薦王錫爵。那末沈一貫雖去，但他的靈魂仍在，所以名作傳衣鉢。至於沈一貫的爲人，剛愎自用，還不如申時行，他只知道弄權植黨。萬曆時代的礦稅是一件苛政，在萬曆三十年間，神宗病了，本有取消的機會，但一貫游疑不決，終究不能立斷把苛政除去，因此內閣的信用，更加掃地。言官的輿論一天膨脹一天，而言官的本身，慢慢的分出派別來了。在萬曆的中葉，言官和一般士大夫比較能主持正義的就是東林黨，與東林反對的就是齊崑宣三黨。萬曆年間的政治，可以說是東林與三黨消長的歷史，而他們消長的焦點，就是與吏部京內及外省官吏的考察，考察的制度，上章已

經說過。考察這件事，明代歷來並沒有這樣的嚴格；但到萬曆以後，一般清流當政，纔慢慢認真起來，而黨爭之因，即肇因於此。文秉定陵註略卷三癸巳大計云：

『往例凡內外大計，必先稟明政府，謂之請教。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成故事久矣……』

這是明代考察的現象，到了萬曆以後考察的現象，就大謬不然，他們發生了極大的爭端，我們知道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曆一五九三）的大計京官，二十三年（乙未西曆一五九五）的大計外吏，三十三年（乙巳西曆一六〇五）的大計，三十九年（辛亥西曆一六一一）的大計，四十五年（丁巳西曆一六一七）的大計，天啓三年（癸亥西曆一六二三）的大計等事，這都是各黨紛爭的焦點，也是各黨勢力消長的機會，如今把各年的京察和各黨的爭論略述於后：

（1）萬曆初年（一五七三——一五九二）的大計。萬曆初年的吏部尚書之宋纁、陸光祖、楊巍等，他們沒有孫鑰、孫丕揚的嚴厲，京察尚須秉命於內閣，明通鑑卷六十九云：

『巍素清操，有時望，然年耄輒戢，多聽柄臣指揮，自居正敗後，言路張甚，于是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

有所澄汰，魏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這是萬曆初年，吏部受內閣的指使，成一個系統，而言官是與政府和吏部相水火的。到萬曆二十一年，吏部的權日高，內閣、吏部和言官的勢力就成了鼎足之勢。

(2) 二十一年(一五九三)的大計。是年吏部尚書主計的爲孫鑰，考功郎中爲趙南星，銳意的來澄清吏治，考功主事顧憲成很幫他們的忙，被黜者大半爲政府的私人。因主計的人，像孫鑰趙南星多不保於位，內閣與政府成了不兩立的地點，明通鑑卷七十云：

「會大計京朝官，鑰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鑰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皋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底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于廷，主事章養，鑰語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鑰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上疏爲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論救，……疏入，上怒，調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鑰乃上疏請賜

駭骨不允，遂杜門稱疾，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卒諡清簡。」

這次京察，辦的很是嚴厲，顧憲成之力居多，文選郎 孟化鯉也極力幫忙，明通鑑卷七十云：

「鑑之掌考察也，文選郎 孟化鯉佐之，時內閣權重，每銓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託，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言官復交章論救，上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爲民，既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遊者恆數百人，久之卒。」

不久顧憲成（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因吏部缺官會推閣臣，以推王家屏忤了當政的意旨，削了職，回家講學，東林黨議，就因此而起。同時吏部侍郎趙用賢也因得罪了閣臣，因著趙家和吳家退婚的家事，削了職。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東林黨議條云：

「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妾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免諸臣，應宿爲詔諛，應宿遂許攀龍，并及文選郎 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十一月高攀龍上

言「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近李楨，曾乾亨，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自孫繼考察失敗，吏部全體更動，二十二年就命孫丕揚做了吏部尚書，丕揚是秦人，他與東林，顧憲成，趙南星很要好，所以顧憲成等雖然歸了田里，他們還有發言的機會。同時淮揚的巡撫李三才，是與顧憲成很要好的朋友，他的言論，很能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並且他養成了一種勢力，可以把持朝權。同時部郎于玉立，雖然是江南人，他與秦省的人很接近，因此陝西的士大夫，和江蘇的士大夫，成了一個系統，而山東，安徽，浙江的士大夫，又自成一個系統，顯然成了一個分裂的趨勢。在參劾張居正的熱情，和劾高啓愚的科場案的時候，士大夫的輿論是一致的，後來就慢慢的分歧，乙未（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的外計，就是士大夫意見分裂的一個大關鍵。

（3）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的外計，當孫丕揚做了吏部尚書，他也不知道孫繼考察的失敗，

他想起了一種掣籤的辦法以爲可以杜免了爭端。明史卷二百二十四不揚傳上說：『不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然這種辦法並沒有解決了糾紛，明通鑑卷七十二云：

『是秋御史趙文炳劾考功郎蔣時馨考察受賄狀。先是吏部尙書孫丕揚掌外察，時馨佐之，黜浙江參政丁此呂，而此呂故與右都御史沈思孝善，時馨疑文炳之劾思孝，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己，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上惡時馨坐罷官，于是丕揚與思孝各疏辨求去。思孝謂此呂建言有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受賕有狀，豈得以建言輕恕，因上此呂訪單，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者也。上慰留丕揚，逐此呂，請讓思孝，自是不揚思孝遂有隙，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二人蓋亦各有所左右云……』

丕揚考察失敗以後，不久即罷了官，自此士大夫就分了黨派，政府反利用不肖的士大夫，以傾害正人，考察一舉就等於虛設了：

(4) 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的大計。這時沈一貫當政，政局更不像個樣子，內閣與銓部已成了水火，銓部的職權已不能執行，遂爲言官彈劾之，國是更不堪問了。明通鑑卷七十二云：

「先是楊時喬署吏部與都御史溫純主察典，時首輔沈一貫欲芟其所私，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純積與一貫忤，爲其黨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所劾求去。章二十上，杜門九閱月，上雅重純諫，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大計京朝官，與時喬力勸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于外，一貫大慍，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將半年，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無留中者。而是時夢皋方假楚王事，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上意果動。』至是下其章，特留夢皋，已復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奏辨，請罷斥不問。」

京察留中不下，是明代僅有的現象，這次主察的楊時喬溫純是東林黨中堅的人物，經此失敗以後，到三十九年（一六一一）辛亥的京察，丕揚再出主察，自以垂暮之年，很想振作有爲，但爲各黨的糾紛，終歸失敗，自三十九年以後吏部的勢力，遂歸入齊楚浙三黨之手，而東林黨的勢力全被三黨所攫奪無遺了。

（5）三十九（一六一一）年的京察，二十一年的京察，是東林黨主政，二十三年外計和三十三年京察，東林雖然失敗，但是當局的人還是東林，到了萬曆中葉以後，浙黨的沈一貫，東林黨的

沈鯉，同時去了位。王錫爵入了內閣，吏部都垣陳治則與錫爵黨比，黃汝亨、汪元功皆投誠於陳，所以就有三十五年（一六〇七）末考選的糾紛出來，這件事影響於政治尚不甚重，故不詳細的敘述。同時李廷機、葉向高入閣當政，雖然是東林黨，但他們沒有什麼本領，同時東林黨的健將，李三才也罷了官，宣黨崑黨的朋友們，像湯賓尹、顧天峻也效法東林，招收黨徒，聚集講學。這一次孫丕揚重新出山，來主銓政，他非用嚴厲的手段不可，但畢竟是失敗了。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孫丕揚傳云：

『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偁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峻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峻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明通鑑卷七十四云：

『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等降黜有差，先是計典將屆，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分發訪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侍郎王圖亟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而圖掌翰林院祭酒，京察

例由掌院注考，賓尹以庚戌事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爲浙江巡撫鄭繼芳僞書詆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卽不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爲侍郎，與不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言乃達之不揚，不揚不爲意。明時廉得之，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等，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僞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閼然。及注考，不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不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疏辨，復犯上諱字，上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爲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力攻不揚等，結黨欺君，不揚因發聚奎前爲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不揚、徐大化，主事鄭振先、張嘉言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不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爲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卽抗章盡發官崑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爲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久之察疏乃

下，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圖，並及丕揚。」

又明史孫丕揚傳云：

『先是楊時喬掌察，斥科道錢夢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羣情益快，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林居耆、顧若沈、鯉呂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丕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疏徑歸。』

這年的京察，觀之似乎勝利，但齊楚浙三黨已完全得了勢力，正人已有汲汲不能在位的樣子，三黨的首領是湯賓尹、顧天竣。賓尹的爲人，是很不守廉隅的，所謂「庚戌」之事，就是翰林院修撰韓敬，是湯賓尹出房的門生，在庚戌那年，賓尹在禮闈看卷子，越房把韓敬報取第一，敬有時名，喜縱橫之學，可是貪財好色，名譽很不好，所以就歸咎於賓尹。這庚戌科場案是萬曆間，兩黨紛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科場舞弊的罪，賓尹不能不負點責任。但同時金明時又發現王圖的姪兒王淑抃在寶坻縣任內貪贓的事情，這也是東林黨大不能掩住人的口實的污點。所以不久王圖、王國就罷了官。

孫丕揚他本來想薦許多東林名流，來鞏固黨勢，但結果一個也沒有用，祇好自行告退。葉向高也去了位。方從哲是一個最庸愚的首輔，他能有什麼作爲，孫丕揚去後，吏部尚書就換了趙煥，趙煥是齊人，爲人很有清望，但上了幾歲年紀，人又老糊塗了，頗受齊黨示誨教等包圍，只好自行告退。這個時候政府的人員被言官紛紛彈劾，不必內閣下令去教他們走，全都自行告退，所以各部署裏都缺了官。大吏不告自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久就是鄭繼之作吏部尚書，是浙黨姚宗文劉廷元的同鄉，未幾鄭繼之因考察去了位，趙煥再上臺，以年老昏瞶，重來當銓敍之政，只有全受齊黨的支配了。因此四十五年（丁巳）的京察，可以完全是三黨當政，最有權威的時期。

（6）四十五（一六一七）年的京察。我們上章已經講過，萬曆初年言官彈劾張居正的奪情是一致的，自從國本並封等事發生，言論就不一致，到了梃擊案發生，雖劉廷元的主張跡似瘋癲，而王之案主張有人指使，以前意見尚同，以後就漸漸分歧起來，三案就成了他們討論的焦點。所以三黨得政，丁巳的京察，就先黜王之案爲民。因爲他是梃擊案的導火線，是東林黨的中堅分子。明通鑑卷七十五云：

「三月始命考察京官，吏部尚書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銑司其事，銑亦浙黨所推轂者，

也。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銖受成而已。一時齊楚浙三黨盤踞，言路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擊異己爲事。初葉向高秉政，黨論方興，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向高不能救。比方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之一空。

夏四月辛亥，黜刑部主事王之寀爲民，仍奪誥命。初之寀發龐保劉成等事，上欲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違罪之也。至是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因拾遺劾之，寀貪縱，遂黜之。

這是三黨最勝利的時代，四十七年（一六一九）的會推閣員，即操縱於三黨之手，東林黨的人物，幾乎沒有人在朝。但不久齊浙兩黨，自己就鬧了意見。主事鄒之麟，是齊黨，元詩教，韓浚的黨徒，但因求轉吏部沒有到手，就與元詩教起了衝突，遂因計奏元詩教韓浚被斥。同時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姚劉是浙黨，從此齊浙兩黨遂形分離。之麟的朋友夏嘉遇，魏光國鍾惺亦被改用，他們都負有才名，經此一番挫折，都合起來攻元詩教趙興邦，齊黨的勢力就此衰微，而所以衰微的緣故，都是由東林黨汪文言所出的把戲。明通鑑卷七十九云：

「文言歛人，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來遊京師，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鬪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

到了天啓三年（癸亥）的大計，是趙南星主察。明史卷二百四十三云：「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在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特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尙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經此番振作，東林稍爲得勢，然積怨於三黨更深了。

在萬曆在位四十多年之中，由內庭的黑闇，和京察的糾紛，他的政治，我們總括起來，可以得到四個現象：

（a）缺官 萬曆中葉以後，因爲言官的糾紛，銓部已失去了效力，自用掣籤法後，部權日輕，只要經言官的彈劾，就不辭自去，政治已茫無頭緒，所以發生了缺官的現象。明史卷二百二十五趙

煥傳云：

『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

政治腐敗到如此，焉有不崩潰的道理，所以不久就有巨奸魏忠賢出來，大加掃除，這是應有的事實。魏忠賢的心術，固極可卑；但他用統制力建設清一色的政府，是有相當理由的。

(b) 大臣與大臣黨比小臣與小臣黨比 文秉 定陵註略丁未考選條引御史吳亮的疏說：「說者謂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誠爲確論；而浙人又繼浙人，榜首又付榜首，尤屬真銓。銓相種種無窮，時事可知矣。」因此沈一貫他可起用王錫爵朱賡，他雖然去位，仍有遙領的權柄。又如一貫與沈鯉不對，因爲李三才給沈鯉說話，一貫反到遷怒於三才，從此浙黨與東林就成仇隙。三十二年的京察，溫純因爲得罪了一貫的死黨錢夢阜張似渠，一貫可以將京察留中不發，又如趙用賢與吳之佳絕婚，因爲得罪了王錫爵，爲之佳所告，竟至罷官。因此廷臣們一舉一動，後面皆有背景，而每一件瑣碎的事情，皆可以引起他們的爭端，就成了上下黨比，紛爭無已的情勢。

(一) 各黨的分歧 因爲廷臣的黨比，就生出了黨派，這是一定的情勢。在萬曆二十年間，湘潭李騰芳勸王錫爵不要三王並封，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峻善，天峻險詖無行，爲世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明史卷二百十六李騰芳傳。）這是分黨的張本，到三十八年祭酒湯賓尹和顧天峻召收黨徒，專與東林作對，天峻、崑山人，賓尹、宣城人，那時名作崑黨、宣黨。（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孫丕揚傳。）到四十年以後才有齊楚浙三黨之分，（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夏嘉遇傳云）

「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廷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全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盛，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尙書趙煥，鄉人也，煥、廷昏，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之麟者，浙人黨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爲黜

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

湯賓尹是三黨的主謀，他著有睡菴集，是很有智謀的人。他爲韓敬因緣得獲榜首，成了科場的寵兒，我們是知道的了。他並且有奪妻事，我們似乎不可不注意。文秉定陵註略卷八荆熊分袒條云：『宣城湯賓尹，先年奪生員施大德之妻徐氏爲妾，徐氏不從自盡，合縣不平，致激有民變。及是復占生員徐某妻賈氏爲妾，徐某者尙書徐元泰之姪廩生徐日隆之弟也，湯微時曾受辱於元泰，故必納其姪婦爲妾，以雪此恥。徐某與賈氏兄弟俱無異言，而日隆心抱不平，上控下懇，湯四布羅網，直欲得日隆而甘心焉。日隆乃亡命走燕齊，於是合郡沸然。』

賓尹這種卑劣行爲，固不足道，但當時巡按荆養喬不直賓尹，而學使熊廷弼，以受湯之託，頗以湯說爲然，很給湯賓尹幫忙，於是我們知道熊廷弼本來是楚黨，後來才轉入東林的。三黨在萬曆末年真赫赫一時。明史李朴傳，朴上的疏說：『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下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凶人之室；身則鬼域，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這真可以說是痛快的話了。

(d) 東林黨議之興起及淮撫之專橫 東林這個名稱，本來是三黨代爲加上去的，但東林黨實在有他的組織，東林黨中的李三才于王立，我們平心而論，他們運籌帷幄，就等於三黨的湯賓尹，是同一樣的人物，三才等事實，詳於下章，此處暫爲從略。

由以上四個現象，我們再總括來說，自張居正以後，由內閣的庸弱，祇知道保持自己的地盤，內閣，銓部，言官分成了三派，各不相謀，所以就造成了齊楚浙三黨和東林兩大派。在萬曆二十年至三十年（一五九二——一六〇二）是東林當政的時期。三十年（一六〇三）以後，是兩黨互持的時期。四十五年（一六一七）以後，是三黨專政的時期。天啓初年（一六二一），東林又得到政權。我們看到黨爭這件事，在初成的時間是合作的，到了成熟，就要分裂。齊楚浙三黨在四十五年三黨專政，他們就起了裂痕；東林黨的汪文言就因機而起，破壞了三黨。及至天啓初年，東林得了勢，他們又以同鄉的關係起了小組的運動。所謂黨中有黨，派中有派。因此魏忠賢專了權，那三黨不得志的人們，全都加入了運動，把萬曆泰昌兩代的糾紛，全都加在東林黨頭上，在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的京察，趙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閹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明史顧憲成傳上說：

『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

三 東林黨議及天啓間之黨禍

一曲的弓溪，兩三株老柳，樹林裏面有幾間破舊的老屋，在無錫的城外邊，這是宋代楊龜山先生時講學的地方，名叫東林書院。那時顧憲成先生在吏部做考功主事，因為討論三王並封，和會推閣員王家屏與政府不合，因此被削了官爵。他因感遇不合，在萬曆二十二年二月裏，從北京回到無錫，就在弓溪旁邊的東林書院，約了幾個好朋友高攀龍、錢一本等，還有他兄弟允成，就在此講學。

我們要知道東林黨的所以發生，不能不先明白東林的領袖高顧的歷史。

顧先生名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萬曆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從小性情沈毅，異於常兒。十五六歲時，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所會。（據明儒學案）有一天他的先生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憲成說：

『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

老師問他：

「何也？」

他說：

「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驅除，是主人與奴競。孔子所謂：『仁者吾不知也』」那句話了。」

他老師非常的高興的說：

「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據高攀龍撰行狀）

他的心目中有所主宰；他的學問是徹內徹外的。在哲學上他的本體論是一元的，所以他反對陽明四無之教爲中上人說法，四有之教爲中下人說法的主張。他認人性根本是一致的，決無分歧的道理。他的實驗的方法是在致用，所以涇陽的學問，與其說是一個哲學家，無寧說是一個政治家。第一，我們看他哲學上的主張。質疑編續上說：

「自古聖賢教人，惟曰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者，執其上一語，

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欣而復困之以所厭，卑之以所樂，而復撓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顧璣文公年譜卷下）

第二：他的致用的方法，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八上說：

『先生論學以世爲體，嘗言，官箴穀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本來儒家的學說，就講學以致用，所謂致用，就是治國平天下。換一句話說，在古來學術與政治並未分家，他們所說的形而上學的心性，就是求治的目的，「濟物利人」，是他們求治的方法。所以顧涇陽的幾篇奏疏，和寤言等編，都是他的政治學說。他所以作寤言的緣故，據高攀龍作的行狀謂：「丁未，婁江相（王錫爵）再徵，先生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丁寧，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寐言寤言貽之弗省也。」寤言上頗有他的政治主張，茲節鈔於后：

『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冰炭，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更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異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於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否則分宜江陵，殷鑑不遠，尙不如不問之爲愈耳。』顧端文公集卷五與友人書曰：

『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肖從旁靜觀，大都起於識見之歧，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欲爲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

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已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獨知獨見處，爭慊，不就苦見處爭勝。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是，非而知其非，不爲偏執也；如是又何所容其歧與激耶！『年譜下

萬曆間的言官只是爭意氣，往往一個很小的題目，可以鬧到不成樣子，這兩段話，很可以見到當日的弊病。大抵顧先生的爲人，是屬於陽剛一類的人物，所以很能表現他的風格，但高先生的性格，卻又稍稍的不同。

攀龍字成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年二十五歲的時候，從涇陽講學，始志于學，他的學問以主靜爲主，他常說：

『爲人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這裏有一段高景逸的由無錫乘船返鎮江的故事，據明儒學案上說：

「某日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酌，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于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于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物，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寸所可言也。』」

把心靜得澄徹一片，與大自然融合而爲一，這是何等的氣象。內心實有所主，所以外界的環境，皆能由我心力來支配，這一點是與顧涇陽相同的。

因此顧涇陽就約了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諸人，就因宋代楊龜山講學的地方

東林書院，聚集講學。這時東林書院已廢爲僧舍了，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造，把從前的東林書院重復舊觀，到了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甲辰東林書院完全落成，涇陽就在東林書院大會吳越的士友；同時還在無錫虞山一帶，來往的講學，他作了東林商語一篇，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實踐上做工夫，嘗言：

『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恆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爲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呈些精采，以推勘到不厭不倦處，便一切都使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行狀

涇陽的主張是志在世道的，他的出發點與空談性命者不同，所以他不尙空論。至於東林的會約和會期，許獻重修東林書院志卷二云：

『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一六〇四）之秋，十月徧啓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爰作會約，以諗同志，而景逸先生爲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明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飭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衛道救時，周詳懇到，其間闡提性善之

旨，以關陽明子天道證道之失，尤見一時障川迴瀾之力。是時海內論學諸賢，各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的實者。」

我們看他們的會約，知道他們的態度很純正；並且顧涇陽的爲人，一切都很公開，他很有號召同志的能力，一視同仁的氣概，他在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九月，東林第二次大會宣言上說：

「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的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學，卽一鄉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學，卽一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學，卽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榜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舉講習中至切要者，時用觀省。」

因爲涇陽的魄力很偉大，他能涵蓋一切，所以那些「抱道忤時」的士大夫，退居林下官僚，都跑到東林來，全舍的人都住滿了。涇陽是一個政論家，不是爲學問而學問的學者，我們是知道的。所以明史上說：『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東林聲望日高，但所以遭忌的地方，也在此。

同時東林還有與淮撫聯合的事情，淮撫就是李三才，原來三才做淮陽巡撫很有成績。萬曆時徵收鑛稅，內監四出騷擾，人民極感痛苦，三才在淮陽時，能制伏內監的淫威，很得一般人民的同情，但他的操守，不大很好，明史上說他：「結交徧天下，性不能持廉，」這是不能免的事實。三才與東林黨的人很接近，當沈一貫當政的時候，沈是東林的人物，與一貫不合，三才反來勸一貫不要與沈鯉作對，因此與時相抵牾。後來會推閣員，在一般士大夫的輿論，頗有入閣的聲望，三才也貪圖大拜，極力拉攏東林的人物，因此更被他黨邵輔忠等所忌；屢次參劾，竟落職爲民，明史本傳云：

「三才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梟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又侵奪官廠爲園囿……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

但顧涇陽對他很好，常來保舉他。涇陽上葉相國臺山先生書說：

「憲聞之，天下之最不可混者，莫如君子小人之辨，最不可欺者，莫如真是真非之心……淮上脩吾李司徒，憲與之交三十年矣，中心實信服者，乃今言者紛如，又率借東林爲案，其借東林爲案也，或引而內之，或推而外之，又若冰炭然何也？憲泉石間人也，卽置之兩忘，亦何不可。獨計司徒之是非，所關於國家甚大，而不肖之知司徒又甚深，敢具列本末，爲明公誦之。夫憲何以服司徒也，

語云：「觀人必於其素。」又云：「觀人必於所忽。」以其日用平常安排所不到也。憲始與司徒同官戶曹，一日過訪，適當午。遽問飯乎？憲曰：「未也。」因遂留飯，相對一蔬，一腐，一肉而已。察其色，充然自得，絕無歉意，憲心異之。他日復過訪，復留飯，加饌至數品，憲訝而問之：「何前倨而後恭也？」司徒曰：「皆偶然耳，無而爲有，有而爲無，所不能也。」憲益異之，以爲車塵馬蹄之間，誰能有如此襟度，遂與定交。自是數相過從，互有切磨，非先哲之軌不談，非天下之大計，國家之表裏不語。憲之服司徒者一也……」

三才這種態度，是否由衷，不得而知；但當時涇陽的確的被他蒙蔽了。因此遂爲東林的語病，但三才實在是東林的健將，他爲東林辨白的疏，寫得非常的痛快。疏云：

『……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讐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井，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明史本傳

由這疏上，我們就可以看見淮撫與東林的關係了。我們平心而論，東林黨中的人格是一件事

實，黨的組織這又是一件事實，我們不可以并題而論。因為一個黨勢力的完成，一方面必須有青年作後盾，一方面必須有政治和經濟作背景。以東林而論，淮撫李三才他在政治上，有相當的勢力；在經濟上，也有相當的援助。東林之與淮撫的關係，這與復社和周延儒吳昌時差不多。在政治上既然有相當的勢力，他們纔能在社會上得到一點實權，因此就有反動的派別，起來與他作對，那麼欲知對方的破綻，非有通線索，用奇計破敵方的人不可，所以就有于玉立，汪文言一輩的人應運而生，醞釀既久。因此，東林在明季社會上的確成了一種不可撓的勢力。他的勢力的消長，在萬曆年間，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在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間，是東林萌芽的時代；第二個時期是王錫爵沈一貫專政的時代，東林的旗幟鮮明，人民的輿論與他一致，他們唯一的對方就是政府，我們可舉一個例子，明儒學案卷五十八云：

『婁江（王錫爵）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

這可以代表東林的言論，和內閣成為對壘的情形，所以當時的人，目東宮為大東，目東林為小

東，因為他們討論的問題，不出建儲國本等問題。至於第三個時期，齊楚浙三黨得了一部分的勢力，於是東林不能不想盡方法，來破壞三黨，而三黨也不能不想盡方法來破壞東林，所以于玉立汪文言一輩，就成了中堅人物。那萬曆年間的京察，就成了他們勢力消長的機會。自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以後，三黨得了實力，到天啓初年葉向高韓爌入了閣，張問達趙南星作了吏部尚書，東林才算重握政權，但三黨懷恨在心，就借魏忠賢的毒焰，一網打盡。幸顧涇陽在萬曆的四十年，已經故去，不及見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一件事，近來的人們，多以為天主教的東來，與東林有什麼關係？我以為東林有新進的思想，所以他與西來的人物，有相當的表同情，而沒有直接的關係。在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間，義大利人利瑪竇由南方來到北京，後來龐迪我，費奇規，熊三拔等均來到中國，利瑪竇到北京後，與葉向高很談得來。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四上說：「爾時西士所記，名公鉅卿，如相國沈一貫，葉向高諸公，亦時相過從，若以下之庶司僚，則尤不知凡幾。」在士大夫裏面，天主教的信徒，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皆為同情於東林的人，而反對天主教的就是沈淮，沈淮是魏忠賢的黨徒，在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沈淮正做南京的禮部侍郎，他串通了內閣方從哲把內地傳教

的教徒，全都監禁起，押解出境，在西史所謂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的教難（但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謂沈淮內結太監魏進忠，可是這時魏忠賢尚未有露頭角，所記是錯誤的。）到了天啓魏閹專權以後，天主教徒徐光啓等，也同時與東林一樣的被擯斥了。還有利氏到北京的時候，就住在宣武門附近，後來鄒元標辦的首善書院，就是現在天主教在故都最老的南堂，這兩點可以說與東林有點蛛絲馬跡罷了。

到了天啓初年，鄒元標首召爲大理寺卿，趙南星做了吏部尙書，他們都是被三黨排擠的人，以前他們在林下與顧涇陽講學，海內目爲「三君」，到了這時，都得到地位。同時韓爌葉向高等都入了閣，可算是清一色的東林專政時代，也可以說東林的黃金時代。那時鄒元標與副都御史馮從吾，在北京建立了首善書院，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爲之記，東林的確的極一時之盛，並且東林黨的人物，南而江蘇，西北而陝西，傳布的地方很廣，響應於學風也很衆。

我們不能不佩服鄒元標，他很有和衷共濟的精神，御史王允成主張聯絡各派，這都很有見地，但東林黨初得了勢力，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他們很懷疑元標晚節務爲和易，對他有一點不滿意，據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本傳上說：

「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倖勳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

我們看當時的大臣們，若全有鄒元標的態度，天啓間的政局，不至於弄得這樣的糟，也決不會有魏閹當政的這樣的慘變出來。他們大臣所持的態度，應該把以前所持的萬曆年間的京察建儲的討論，三案的爭端，諸黨的裂痕，把他一筆勾消，教他們後來沒有翻三大案的影響，在他腦筋裏。不得志的朋友們有了地盤，有了飯碗，誰又肯依附邪黨？這是水到渠成，最容易辦的事情。我們最可惜的是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都斥爲異黨。在天啓年間內閣中像黃克纘畢自嚴崔景榮等本不是壞人，因爲關於三案的討論，所持的論調與東林不合，東林黨人就反對他；明史卷二百五十六崔景榮傳贊云：「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爲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爲輕重，豈篤論哉！」這些話，說的非常的痛快。因此東林剛得了勢，禮部尚書孫鑰就起了追論紅丸三案，勅方從哲庇李可灼，教其他的黨人聽見了都很寒心，留了極不好的影響。天啓三年的京察，趙

南星持之過甚，把三黨的黨徒，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等一網打盡，甚至連南星朋友魏允貞的兒子魏廣微，南星都說他『見泉無子』，擯不見。豈知水清無魚，教他們無以自新之路。不錯，有極老辣的手段，有詭譎的智謀，像李三才一流，未始不可以作一個清黨的政策，統一了政治；但他們又沒有這樣的本領。吏部尚書周嘉謨因為得罪魏忠賢，首相葉向高尚且保不住他的地位，本黨的健將汪文言被忠賢所忌，向高也不能挽救。太監可以把相府的門圍起來，連一個太監魏忠賢，在萌芽初生的時代都不知道撲滅，他們只知道樹本黨的嚴威，可是沒有辦事的實力；徒得罪了許多人，而自己與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了許多小組，這種無實力的紙糊老虎，一碰就破了。但我們不能不佩服東林黨人格的坦白和直率，因為他們全是一夥書獃子，實在是太老實了。

魏忠賢本來是肅寧縣的無賴少年，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因為把家產敗盡了，跑北京來，自宮作了太監，改名叫李進忠，後來纔復姓魏，賜名叫忠賢。他因太監王安，纔入得宮來，王安為人到很好，李選侍移宮之事，王安很與正人幫忙。忠賢到了宮裏，就與熹宗的乳媪客氏勾結，反把王安害了。那時候內閣裏不肖的臣子沈淮，教忠賢練習內操，熹宗又常派太監去查邊防，而熹宗是一個無智識的小孩子，一天只知道遊戲，那能管理得朝政，因此忠賢就慢慢的得了勢力。天啓初年，那一般東林黨

人，布滿了朝局。凡是反對東林的人，都被擯斥。因此齊楚浙三黨的人物像王紹徽阮大鍼崔呈秀魏廣微馮銓與東林不合的一流人物，都趁著機會起來，投到魏忠賢的名下，專與東林作對。像三案，京察等項的事情，本與忠賢不相干的，但三黨的人物都借著忠賢的毒餒，起來與他本黨出氣。都投到魏忠賢名下做乾兒，並說：「東林將害翁。」因此忠賢也樂得興大獄了。我們知道汪文言是東林黨裏破壞三黨最主要的人物，給事中傅櫬和忠賢的外甥傅應星結爲兄弟，就起來誣奏汪文言並及左光斗，魏大中，將文言下了鎮撫司獄，並把東林黨的劉僑，換了忠賢的私人許顯純，作鎮撫司的官吏。顯純是忠賢的死黨，慘酷的閹君，凡是東林的正人君子，都是死到這位劊子手裏面的。那個時候李應昇等都起來彈劾忠賢練習內操，引用私人，但是都被忠賢矯旨詰責。因此副都御史楊漣，看著很不平，起來參劾魏忠賢有二十四大罪。大旨謂：「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腐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

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文章做得非常激烈。同時左光斗魏大中等都起來彈劾忠賢，就成了黨禍的張本。我們知道孫籙一般的人，在天啓初年，他們要清查三案中李可灼等人，這時候反對東林黨的人，反到要起來翻案，清查東林黨了。自天啓三年京察失敗以後，東林已失去了實力，首輔葉向高韓爌趙南星等因為不得志，也都退了職，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也都免了官，工部郎中萬燝，被魏黨庭杖打死了。那時候一般的羣小，都想起來，爭翻三案，和萬曆朝歷年的京察，於是就有重修光宗實錄的詔令。御史楊維垣首先翻挺擊一案，以為張差瘋癲係屬真情，王之案過於多事，即碎其骨，也不足贖其咎。給事中霍維華並論三案東林處置的非當。喬應甲首翻京察；石三畏追論三變，謂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和天啓三年（癸亥一六二三）的京察，因為歸罪東林，名作三變。倪文煥參論黨人，盧承欽請榜黨籍，一切的罪過，都歸罪到東林黨的身上。想借汪文言之獄，把東林黨的領袖，都牽連到他們的身上。但大理寺丞徐大化，以為：「但坐移宮罪，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聽了非常喜歡，就重新更嚴治汪文言的罪，教他招出來，楊漣左光斗貪賊的情形，文言受刑不過，仰天大呼說：

「世豈有貪賊之楊大洪哉！」

我們可以知道東林諸賢的清白情形了。

說起來封疆一事，教我們非常的痛心。奴爾哈赤氏是生在東北女真建州左衛的部落，在明代永樂年間，遠征軍超過了庫頁島，立永寧寺的紀念碑，建州三衛早屬了我們的版圖了，奴爾哈赤氏是部落裏面的一個酋長，他的祖父覺昌安，他的父親塔克失，死於阿台之難，奴爾哈赤氏自小就養在明代大將李成梁手裏的，後來叛了明廷，屢次撓亂邊疆，明廷對他沒有辦法，在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先併有了南關哈達氏，就自立稱金國汗，以七大恨出師，來侵略明國，明廷派楊鎬四路出師與奴爾哈赤氏打仗，但不幸四路的官兵，全都被建州打敗了，在清朝歷史上，就名作薩爾滸之役。奴爾哈赤氏就此立定基礎。我們要知道當明兵喪師的時候，就是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鬧家務最利害的時候，不久明廷就派熊廷弼經略遼東，未出關，而開原，鐵嶺繼陷，廷弼到了遼東，很有一番作為，想培養兵力，再來作戰，但爲人所忌，說他因循不戰。乃命袁應泰代他，但應泰剛到瀋陽，就失守了。又命熊廷弼回任，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以作三面進攻的計策。可是廣寧巡撫王化貞與熊廷弼不合，廣寧就此失守。化貞和廷弼就得了罪，下了監獄，然

而王化貞反死在熊廷弼的後面，這是天下最冤枉的事情。廷弼性情雖然倔強，但他爲人很精明，辦事是很負責任的。廷弼是湖北人，本來不是東林黨，但是現在把東林黨人全拉到封疆重案裏面去了。

在天啓五年三月，以汪文言之獄，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鎮撫司獄，就說他們都受了熊廷弼的賄賂，楊漣、左光斗坐贓二萬，大中、化中等均坐贓數千萬不等。天啓六年二月，因提督蘇杭織造大監李實誣劾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皆遣緹騎前往逮之，這前後兩次所逮的不下二十個正人君子，全都被無情的劊子手許顯純，用非刑打死在監獄裏了。

同時忠賢的爪牙，魏廣微，顧秉謙等把正人趕掉了，點了一部縉紳便覽，像葉向高、韓爌等百餘人，均目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餘人，目爲正人。東林本不過是一講學之所，本沒有什麼黨的名稱，這時候凡是正人君子，或與魏閣作對的，皆名爲東林黨，齊黨的王紹徽，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重，乃倣水滸傳的本例，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御史盧承欽，求媚忠賢，乃仿王紹

徽點將錄，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等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等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謂之東林黨人榜。在天啓五年十二月，把榜揭示天下。同時還著有天鑒、雷平、同志、稗、稗點、將蠅蚋、蝗蝻等七錄，以表白東林黨人的罪惡。並從逆黨張訥的議，把東林、關中、江石、徽州、首善各書院全行拆毀，忠賢的意思以為搗毀東林的巢穴，跳梁的小醜，自然可以無容身之地了。

乃於天啓六年，從霍維華的請，命纂三朝要典。未幾開館，乃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編這本書的意思，是專門來罵東林，暴揚東林的罪惡。明通鑑卷八十云：

『其論挺擊，以王之案開釁骨肉，爲誣皇祖，負先帝；論紅丸，以孫愼行創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爲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案慎行，連爲三案罪首。時方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卽據要典改正。』

這麼一來，三朝要典，就成了千秋的鐵案。魏忠賢的話，成一代不刊的聖典，凡是爲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說兩句公平話的人，都立刻把他們誅死。據明史本傳上說：『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慘，』

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在天啓的五六年間（一六二四——一六二五），忠賢封到上公，他的本家魏良卿封寧國公，凡是他的爪牙和三黨的重要人物，像顧秉謙，崔呈秀，霍維華等，都布滿了朝局，魏忠賢就是太上的皇帝。督撫大吏像閻明泰，姚宗文等，爭請著爲忠賢立生祠；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的父親配啓聖公。明史卷三百五本傳上說：

「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賊，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等三十餘人，爲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大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

並且把熹宗的妃子李氏害死，墜了皇后張氏的胎。熹宗真如一個木雕泥塑的人，任著魏忠賢的擺弄。所謂『亢龍有悔』。魏忠賢的毒焰雖然薰天，但他的死黨魏廣微，馮銓輩日夜相軋，已經起了糾紛，所以熹宗剛死之後，皇五弟由檢卽位，忠賢的勢力，就一敗而不可收拾，政局上又起了大變

化。（以上所據爲明史，明通鑑兩朝剝復錄等書。）

像魏忠賢這樣卑鄙惡濁的事情，真是可以不說；但是在專制時代，士大夫犯了罪，可以不經法律的手續，由太監來隨便的殺，真是一件怪事；而楊左諸君這樣高尚的人格，不怕惡勢力的精神，卻不可不特爲的介紹一下。

楊左諸君子，無緣無故坐了貪賊的罪過，真是千古的冤獄，而他們所受的非刑，真有人所不能堪的苦楚，據明通鑑卷七十九上說：『漣，光斗，大中，三人另發大監，其夕同爲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爲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矣。』這在淒風苦雨，慘澹景像當中，卻有一段英雄識英雄的故事。原來明代的政治，壞敗於萬曆天啓兩朝之手，羣小當政，闇無天日，幸虧有楊左諸君子的光芒，纔可以爲士大夫的節氣上增一點光彩。自明崇禎以後，清兵入關，明祀尙可以在江南支持了幾年，這種偉績不可不歸功於史可法，可是史可法是左光斗在患難之中，識得的一個知己，是一樁很有精彩的故事，我們因敘述楊左不屈的精神，不妨略敘他們遇合的情形。顧公燮撰消夏閑記摘鈔上左光斗識史閣部條云：

『桐城左光斗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散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

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扃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貌寢，左公矍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名，曰：「此他日社稷臣也。」既入泮，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能繼吾志者，惟此生耳。」又謂史公曰：「童子勉之，前半節事在我，後半節事在汝。」及左公爲逆閹害，下詔獄，史公冀求一見，逆閹防伺甚嚴，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公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屨，僞爲除不潔者，引至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跪抱公膝而鳴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即先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這一節，我們不但可以知道左光斗史可法的遇合，並且可以知道他們所受人間所沒有的苛刑了。我們知道這兩次所逮的東林諸君子，除了高攀龍是投水死了，其餘無一個幸免的。周順昌本來與東林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因爲把他的女兒許配了魏大中，所以也遭了毒刑。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

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當周順昌被緹騎擒往北上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看著很不平，幾乎引起了民變。其中有顏佩章，馬傑，沈揚，楊會如，周文元等五人，文元是周順昌的轎夫，把緹騎打散了，事後把他們五個人殺了，到了崇禎初年，在蘇州虎丘的旁邊，與他立了一個五人墓，給他立了一個祠堂。他們的祠堂，就是與魏忠賢立的生祠，還沒有完工，就改爲五人祠了。並且轎夫周文元的大名，也載入明史。在被難諸君子的子弟當中奔走最力的，要算是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洙，他爲他父親把性命犧牲了。朋友中間最幫忙的，要算周順昌的朋友朱祖文。同時在北方讀書人中間，前後諸君子之被逮，他們沒有不費盡心力營救的，就是孫奇逢，鹿太公，張果中，當時稱爲高陽三烈士。夏峯是清初的碩儒，我們是知道的。鹿太公是鹿善繼的父親，張果中是夏峯的弟子，果中家住在白溝，是南北來往必由的路。果中家裏，遂成了被難諸君子聚會之所，那時鹿善繼，他在孫承宗那邊當幕府，承宗督師在山海關，很有力量，可以說話的人，善繼請承宗與諸君子幫忙。夏峯與孫承宗的信上說：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能不慨

然。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廬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平乎！」『乙丙紀事』

孫承宗立刻就要到北京，觀君面議。但是被魏黨說他要來清君側，矯旨命孫承宗中止來京，這件事又算失敗了。在這三烈士之中，孫夏峯最有謀略，營救的方法，夏峯出的主意最多。楊左諸君子，是清廉自守的，家裏那有許多錢財，及至追賊之說起來，三日一比，五日一比，打的肉飛骨斷，但是輸款是毫無辦法。可是左光斗曾做過屯田使，曾拿十三場子粒，爲河北定興開永賴之利。那時孫夏峯和鹿太公請定興的老百姓，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錢數十萬貫。老百姓聽了這個消息，不到幾天，就湊足了錢，送到京去。並且定興的縣官王永吉也很幫忙，他親自捐了百金，他說：『金不于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王拱極是一個清貧的秀才，他把他妻子首飾當了十金，也助了捐，但款剛送給魏閣，楊左諸君子早已斃在杖下了。

朱祖文自從周順昌來到北京，各處的奔走，他常住在張果中家裏，夏峯很與他出力，金日升撰的朱文學傳上說：『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勾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吳橋是范景文，清兵到北京第一個死節的——他湊款到了北京近郊地方，住在一個小

店裏，北方的風，非常的大，吹得已破的紙窗嗚嗚作響，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被風刮得忽明忽滅，祖文在似睡不睡的時光，聽見一縷的冤魂，悽悽的悲聲，從遠遠的奔來。祖文情知有變，及至到了北京，纔知吏部早被許顯純打死了。祖文扶著周吏部的靈柩，回到南方，不久朱祖文也就死去。但是他們雖然被屈死了，但他們的精神光彩是常照人的。（以上據明史，孫奇逢乙丙紀事，燕客具辛，詔獄慘言，朱祖文北行日譜等書，末一段故事是據北行日譜附朱祖文傳：「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少爲加以描寫，可以見當日慘淡的情形，並非是主於迷信的。）

四 崇禎朝之黨爭

到了毅宗卽位，時局大變。忠賢的黨羽都慄慄自危。投機份子，像楊所修，楊維垣等人，首參崔呈秀來探聽崇禎的意旨，崇禎趁著這個機會就罷了崔呈秀的官，並且宣魏忠賢崔呈秀的罪狀，把忠賢安插鳳陽，忠賢剛出了都門不遠，就在阜城店裏自縊了，由此我們可以知忠賢本身並沒有很大的本領，不過反對東林黨的黨人，全都擁護他罷了。

於是韓爌，劉一燝等皆復了原官，錢龍錫，李標，來宗道，劉鴻訓等都入了內閣，從了劉鴻訓的請，把附魏黨，楊維垣，楊所修等全都罷斥了，又成了清一色東林黨人的內閣。當時編修倪元璐首請毀三朝要典，他述說政局的變遷很詳，茲擇鈔其疏最要的地方於後：

『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時起事興議，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

之先，雖甚水火，不害燠簾，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辭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成而或憂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明通鑑卷八十一

自此銷毀了要典，在崇禎二年並命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公布魏黨的罪惡，詔定逆案。

毅宗剛卽了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鏟除了閹黨，他的手段不能不算是敏捷，但是閹黨的餘孽，仍然潛伏在中間，並沒有完全的除掉。因爲明代東林及三黨的爭持，根本有傳統的觀念，他可以流傳了幾代，還仍抱定他們黨裏的宗旨，是堅牢而不可破的。我們可以舉黃宗義汰存錄引的夏彝仲的話可以證明。他說：「三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公平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憲成）鄒（元標）諸賢，繼爲楊（漣）左（光斗），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沈（一貫），繼爲元（詩教）趙（興邦），繼爲崔（呈

秀（魏（忠賢）又繼爲馬（士英）阮（大鍼）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彝仲這種論調，最爲持平；本章不是討論東林及三黨的優劣，我們不去管他；但東林和三黨的傳統思想，真是偉大驚人，他們可以由萬曆到崇禎，一直鬧了五六十年，他們不但到崇禎時代，而且北都覆歿，偏安的弘光，和侷促一部分的永曆，他們的黨見，仍然可以在那裏鬧著。到了明亡了，一部分的無恥之徒，腆顏事奉新朝，他們仍然的互相傾詐，毫不知恥，我們一方面可以佩服他們的偉大，一方面又可以說他們太不知輕重了。

同時我們不能不歸咎於崇禎皇帝，他不是沒有聰明睿斷的精神，而沒有兼容並包的態度；有察人之明，而沒有用人的手段。他只養成了一種剛愎自用，猜忌無常的性格；他天天怕大臣植黨，而黨反在他猜忌之下養成了。一般骨鯁的老臣，自然是多得罪而去；一般無恥的下流，即可以趁著毅宗猜忌的脾氣，裝成謹愿自守，庸懦無能的樣子，來取媚於崇禎；而背著人的時候，卻賄賂公行，無所不爲；因此時局大壞，一敗而不可收拾。崇禎朝的朝政，和天啓朝實得其反，而他們的失敗是一樣的。由崇禎朝的政治，我們可以分作數個時期，崇禎朝初年（一六二八——一六三二）是溫體仁周延儒合作的時期；六年到十年（一六三三——一六三七）是溫體仁專政的時期；十年到十三年

(一六三七——一六四〇)是薛國觀當政的時期；十三年到十六年(一六四〇——一六四三)是周延儒再相的時期；十六年到十七年(一六四三——一六四四)是陳演魏藻德等專政的時期。崇禎一代雖然入閣的有五十個人，後人遂名之爲五十宰相，但實際當政的也不過這幾個人。他們這幾個人雖然有反對東林的，有與東林合作的，但對於政治都沒有什麼良好的結果，在毅宗的初年，以苛察爲明，未嘗沒有一點作爲，但到了一換再換之後，像魏藻德陳演一流的人物，他們庸愚得真是可笑，毅宗已經失去了用人把柄。時局就此不可收拾了。如今我們分條詳述於下：

(1) 崇禎初年政治和溫周合作的時期。當毅宗初年，他也知道會推和京察這兩件事，很可以發生黨爭的機會，所以他想出一種枚卜的辦法，這種辦法與孫丕揚的掣籤辦法差不多，以爲可以杜絕植黨這件事；但是實際上卻不這樣。因爲在崇禎剛卽位的時候，像韓爌，李標，錢龍錫，喬飛升，劉鴻訓和左都御史曹于汴，商定逆案。他們的辦法，不爲己甚；但一般魏黨不得志的人，仍然是恨他；因爲韓爌和曹于汴是山西人，所以一般反對派的人，目他爲西黨（見明史二百五十四曹于汴傳），所以在是年十月劉鴻訓不安於位，就罷了官。枚卜的方法，據明史卷二百五十一錢龍錫傳云：

「莊烈帝卽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禔，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

十人，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這一次的內閣，不久即行改組。然溫體仁和周延儒從中阻撓，極大的糾紛就行發生。原來這次的會推，閣臣裏邊的名單上，有吏部尚書成基命，及禮部侍郎錢謙益的名字，而沒有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他們很不滿意，就來告發錢謙益的祕密。錢謙益當時人都叫他作東林浪子，謙益人品的好壞，我們不去管他；但這次被溫周的告訐，實在是冤枉的。明通鑑卷八十一：

『體仁揣上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爲考官時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先是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同考官薦擬第二，謙益改置第四。千秋知爲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鬩，事傳京師，爲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上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驗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

忍見陛下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上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這一次的會推，錢謙益和溫體仁、周延儒皆未能入閣，仍然以韓爌主持內閣的大事。毅宗因為枚卜毫無結果，就連著兩年，沒有用枚卜和會推的方法。但到崇禎二年十二月，周延儒就做了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六月，溫體仁也入了閣，到了九月裏，延儒遂入首輔，這是溫周合作時期，遂爲東林黨的勁敵。

同時我們要知道明廷自瀋陽失守以後，清兵節節的進攻，明廷只知道鬧家務，已把心腹的外患置之度外。從熊廷弼被殺之後，所用的經略，如王在晉、王之臣等，皆是忠賢的私黨，更不知道防守的大計。在天啓末年，有大將弢略的，僅有孫承宗、袁崇煥等人，孫承宗之修復大凌河，袁崇煥之守寧遠，守錦州，他用西法的炮火來攻殺敵人，很有成績。奴爾哈赤就是中他的炮火，受傷而死的。崇煥不愧是一位勇將，所以當時錢龍錫很保舉他。毅宗在平臺召見崇煥，規畫了五年興復的大計劃。毅宗非常的高興，就命他爲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但崇煥到任不久，還沒有什麼偉著的功績，就把毛文龍殺了。文龍駐紮在朝鮮之西東江皮島地方，是明廷東邊的藩屏，文龍已死，清兵可以由海道，直取山東，崇煥這種辦法，是與王在晉主張聯絡插漢一樣的失計，崇煥殺了文龍不久，毅宗就中了清

廷的間諜把崇煥下了監獄，處了死刑。因為崇煥是錢龍錫薦的，所以那時一般羣小想把龍錫也置諸大辟。明史錢龍錫傳云：

『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尙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

龍錫是主持定逆案最力的人，趁著袁崇煥之獄來害龍錫，這是逆案中人的報復。及溫周上了臺，逆黨中人又用了別種方法來傾害東林了。

(2) 溫體仁專政的時期。溫體仁和周延儒同入了內閣，體仁頭一步的工夫就來排擠周延儒，明史卷三百零八周延儒傳云：

『體仁既並相，務爲柔佞，帝意漸嚮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尙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

體仁並且屢用這種陰謀手段來傾陷正人，袁崇煥錢龍錫之獄，體仁和周延儒王永光都是主

謀的人，將興大獄，梁廷棟不敢任事而止，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了。後來龍錫得了特赦出獄。明史卷三百零八溫體仁傳云：

「比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難。體仁則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爲助，延儒遂免歸。」

本來周延儒也有許多招賄納貨的地方，周氏下臺之後，體仁遂作了首輔。體仁所以能討毅宗喜歡的本領，就是因毅宗性情猜忌，體仁裝出一種樸忠的樣子，來試探毅宗的心理。明史本傳云：

「體仁荷帝殊寵，益伎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止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迹。」

體仁既然得了勢力，首先他想鏟除東林，培植逆黨，以作自己的爪牙，明史本傳云：

「時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林，會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言者大譁，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爲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

體仁想起用逆案中人，既然辦不成功，那末自有鏟除在朝的東林黨的領袖。我們知道崇禎朝東林黨的聞人，是姚希孟和文震孟。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偏，乃以冒籍武生事奪希孟官，使掌南院。體仁最恨的是文震孟，他因給事中許譽卿，訐奏賊焚皇陵的故事，說體仁「納賄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爲孤注」的話，被削了職。文震孟抗疏挽救譽卿，體仁復謂：「言官罷斥爲至榮，蓋以朝廷賞罰爲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順天府尹劉宗周也因與體仁不和斥爲民，體仁排擠震孟的方法，與排擠周延儒差不多，明史卷二百五十一文震孟傳云：

『震孟既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驥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疑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

東林的領袖被排去之後，體仁遂成了獨裁制的內閣，他的大政方針，最可以教人注意的，就是鄭鄮之獄，箝制復社。及張漢儒訐奏錢謙益之事。這都可以說是溫體仁的德政。

誣害鄭鄮杖母這件事，因爲鄭鄮是文震孟的好朋友，所以故意與震孟爲難，也可以說是與東林黨的人開玩笑。明史溫體仁傳云：

「震孟既去，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鄮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鄭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鄭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鄭甚，不俟左證，磔死。」

庶吉士黃道周是鄭鄮的朋友，他上的疏上有「臣不如鄭鄮」一語，因此遂免了官，當時鄭鄮杖母這件事，哄傳於一時，是很值得注意。那時候記鄭鄮杖母事的書很多，流傳下來的有扶輪信史，漁樵話，鄭鄮話，鄭鄮本末，放鄭小史，誣辱他的很多，惟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二有鄭崧陽先生墓表一篇，較爲質實，茲錄其原文於後：

「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

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注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暱，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說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話之法，訛爲朴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

至於箝制復社這件事，復社是東林的後身，很可以代表一時的輿論，惟其要箝制輿論，所以非破除復社不可，明史體仁傳云：

『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陸文聲訐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史馮元飏，不承風指，皆降謫之。』

復社這件事，本篇常有專章討論，所以在此處暫不細述。同時還有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近人所刊虞陽說苑裏面載有張漢儒的訐疏。明季紳士之橫，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四述之甚詳，的確是在社會風俗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草有明季奴變考，專討論這件事情，在此處也不詳細的敘說。

體仁的爲人，明史本傳上敘的很好。本傳上說：

「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躡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啓新劾黃景昉，皆奉體仁指，禮部尚書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忤帝旨，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願臣愚無知，但稟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稟擬多未中竅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自體仁輔政後，同官非病免物故，卽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尚書俸，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

又云：

「體仁雖前死（崇禎十年放歸，逾年卒。）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

在崇禎年間，溫體仁的內閣，時期最久，因爲體仁能迎合毅宗的意，所以毅宗很信用他。既至太

監曹化淳舉發了體仁的奸狀，毅宗方知體仁也結黨營私，奉旨放歸，體仁死了之後，毅宗仍然很惋惜他。所以一般投機分子，多效法體仁。王應熊本亦是周延儒的黨，但體仁得了勢，也就投在體仁的門下。張至發自崇禎八年入內閣，他也效法體仁所爲；但是他的才智遠不如體仁的機警，也未作首輔，所以影響不很大。到了體仁放歸，薛國觀入閣，他越發的陰險了。

(3) 薛國觀專政的時期。國觀所以能入閣的緣故，據明史卷二百五十三本傳上說他：「爲人陰鷲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遂超擢大用之。……國觀得志，一踵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我們知道崇禎十年以後，外患更迫切了，更加上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等蹂躪了好幾省，民困財乏，已達到了極點，在崇禎十一年間，楊嗣昌曾一度入閣，他勦賊的方法，唯一的就籌餉。他的籌餉的辦法有四種：第一是因糧；第二是溢地；第三是事例；第四是驛遞。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楊嗣昌傳上說：

『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

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

但是人民已窮到這步田地，那能够再行加派，所以楊嗣昌的計畫是失敗的。薛國觀當政的時期，惟一的大政方鍼就是助餉，這是沒有辦法當中想出來的辦法。但是助餉這件事也是失敗；並且得罪了皇親李國瑞，同時中了吳昌時的奸計，反把一條命送掉了。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本傳上說：

「帝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資，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殛，降神於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

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之，益疑……遂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陞彥（王陞彥，中書，國觀黨。）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命下陞彥詔獄，窮治。頃之，愷（袁愷，給事中。）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傅永淳，吏部尚書。）奕琛與焉……至十月，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棄市；而遣使逮國觀，國觀遷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

明代大臣被戮，除了胡維庸夏言外，這是在明代僅見的事情。

（4）周延儒再相的時期。自從溫體仁得了政，周延儒就失了勢力，回家閒居了。那時候東林的老前輩像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皆因得罪了時相去了官。內閣裏，可以說沒有一個正人君子。張溥在吳下結盟復社，很爲這一般正人君子不得其位的發牢騷，可巧吳昌時是周延儒的知己，又是張溥的好朋友，張溥就請昌時遊說周延儒說：

『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據明史）

延儒很以爲然。同時，吳昌時就爲他交通內侍，馮銓也很爲他幫忙。毅宗不見延儒也有好幾年，看見歷來的內閣，還不如延儒，很有起復延儒的意思。在薛國觀得罪以後，就起復了延儒的原官，崇禎十四年九月，就作了首輔。

延儒雖然投降了東林黨，但是與逆案的人，並沒有十分脫離關係。當延儒起復的時候，閒住在南京，好談兵說劍的阮大鍼，就想因周延儒爲他起復，周延儒的意思以他剛被東林黨所提拔起來，怎麼好意思再起復逆案中人。大鍼就說：「瑤草何如？」瑤草是馬士英別字，延儒當時應允了，他剛得了政，就教馬士英督師鳳陽，遂成了南明福王之立主的張本，南明的翻逆案等事，就中因於此了。（見錢秉鐙皖髯紀事）

延儒作了首相之後，他不能不敷衍東林，他初當政的時候，就上疏請召還言事遷謫諸臣，並說：「老成名德，不可輕棄。」一改以前所爲。於是就請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發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又把黃道周從謫所從新起用，這些全按著張溥所開的名單，計畫出來，但不幸延儒剛當了政，張溥已經死了。

延儒雖然引用了許多正人君子，但他本人的品行卻不很高明，攬權納賄，是所不能免的。他引用了一位董廷獻，在前門外開了一座珠寶店。是專為納賄的所在。同時吳昌時的為人更不高明；雖然是東林黨人，但為人倨傲，又好貪財，交通廠衛，把持政權，同朝的官吏，沒有不忌恨他的。因此就造了反對黨的嫉妒，造成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毅宗就下詔諭，切責言路。禮科給事中姜埰，恐怕毅宗為小人所包圍了。就上書切諫。他的大旨是：「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人皆闐然緘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疏入，毅宗非常的生氣，說：「二十四氣之中，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立下姜埰詔獄考訊。同時行人司副熊開元劾延儒納賄，觸帝怒，均廷杖下詔獄。毅宗的意思，本想命衛帥賂養性把他們兩人害死的。養性因為這件事很重大，祕密的訊問同官怎樣的辦法。同官說：「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害怕了，就沒有敢把他兩人害死。但他兩人雖然沒死，可是姜埰被杖傷勢很重，已經昏厥過去。他的弟弟姜垓口裏含著溺，纔把他灌醒。十七年二月，纔把姜埰釋放，謫戍宣州衛，不久，明朝滅了，姜埰受了這樣的虐待，但他並沒有忘了國恥，自己稱宣州老兵，以示不忘故國的意思。熊開元字魚山，他做過吳江的知縣。與復社很有關係，明亡，他當了和尚。

周吳這兩位的行爲，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後來就是東林黨的人物，對他也不滿了。但延儒也有可取的地方，就是罷除了廠衛緝事，可以免去了許多慘毒無人道的行爲，士大夫同情於他的很多；但一般廠衛的人，失去了飯碗，沒有不痛恨延儒的。那時候延儒的門生范志完督師討賊，逗留不進，被雷縉祚所劾，下志完於獄，縉祚說：「志完兩載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因此毅宗對於延儒，也起了懷疑，同時延儒又和同官陳演不對，因此陳演和錦衣的賂養性一塊兒，找延儒昌時的私事。不久，就發現了周吳貪贓的罪狀，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就把吳昌時棄市，周延儒賜自盡了。

（5）崇禎末期的政局。自周延儒得罪之後，陳演和魏藻德互相勾結著，就入了內閣。魏藻德是薛國觀的門生，這可以說薛派又佔了勢力。但這時候時局大壞，已經到了無有辦法的地步，雖毅宗以苛察爲明，但已顯出了手足無措的樣子。魏藻德唯一的辦法，就是勸百官助餉，但他們自己却一毛不拔。到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進了北京，藻德被自成擒住，教他輸款萬金，賊還嫌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陳演他很知趣，每天獻給劉宗敏銀子四萬兩，但終竟也遇害了。同時毅宗信用的大將，就是李建泰，建泰本來是個文人，與陳演同入閣的，他看見時局糟到這步田地，自請毀家討賊，毅宗看見有這等熱心的人，非常的高興，就命他督師，並且用古推轂禮御駕親送他出征。明史卷二

百五十三魏藻德傳上說得很可笑：

「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嚮止五百人，甫出邵，聞曲沃已破，家貲盡沒，驚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逃亡。至定興，城門閉不納，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鄉官張羅彥等並死之。建泰自刎不殊，爲賊將劉方亮所執，送賊所。賊旣敗，大清召爲內院大學士。」

這樣的督師，真可以算是兒戲。但這位督師，偏偏不死於賊人之手，後來到了清初，姜瓖在大同造反，他又與姜瓖合作，被清廷殺了。

我們知道崇禎的末年，不是沒有辦法，廷臣李明睿請毅宗南遷，陳新甲請與清廷議和，毅宗只有一定的方鍼，不是沒有緩衝的地步，但是毅宗已經早抱了死志，所以只成了大學士吳橋、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等十人殉難的美名。平心而論，毅宗自然是比宋代徽欽二宗好得多了！但是他們豈知道當明廷不守的時候，那時清太宗剛才死去，世祖福臨沖主卽位，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時候呢！

至於崇禎朝入閣辦事的大臣；俗稱所謂五十宰相，我們可依曹溶所作的崇禎五十宰相傳，所

附的宰相年表略爲更改一點，他是以年爲經，我們拿一個人作一個單位，較爲明瞭些，茲錄其表於後：

崇禎五十宰相表

人名	入閣年月	罷官年月	備考
黃立極		天啓七年丁卯十一月回里 崇禎二年己巳正月被察	由檢天啓七年卽位明年改元崇禎
來宗道	天啓七年十二月入閣辦事	崇禎元年六月馳驛回里 二年己巳議處	
楊景辰	同年入閣辦事	同上	
李標	天啓七年十二月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庚午回里	
周道登	同上	崇禎二年己巳致仕 五年壬申卒	
錢龍錫	同上	二年十月回里 三年庚午削籍	

劉鴻訓	同上	崇禎元年十二月革職	
施風來		崇禎元年戊辰以中極殿大學士爲太傅回里	
張瑞圖		同上年月爲太保俱馳驛回里二年議處	
韓爌	崇禎元年戊辰起復爲中極殿大學士	三年庚午回里	
李國櫓		崇禎元年五月回里 四年辛未卒	
成基命	二年己巳十月入閣	三年庚午回里	
孫承宗	二年己巳起復督師出鎮通州		
何如寵	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六年癸酉召不至	四年辛未回里 十四年卒	

錢象坤	同上	四年辛未回里	
周延儒	同上 十五年壬申進建極殿 十四年再召入京進中極殿 十五年壬午入殿 十六年八月徵入京校勘	六年癸酉馳驛回里 十六年癸未回里 是年十二月賜死	
溫體仁	三年庚午入閣辦事七月加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六年癸酉進建極殿 七年甲戌進中極殿	十年馳驛回里 十一年卒	
吳宗達	三年庚午入閣辦事七月加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七年進中極殿	八年十一月回里 九年卒	
鄭以偉	五年壬申入閣辦事	六年癸酉卒	
徐光啓	五年壬申進東閣大學士		

王應熊	六年癸酉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七年進文淵閣 十五年召入朝賜金帛還	八年乙亥馳驛回里	
何吾驪	同上 七年甲戌入文淵閣	八年十一月回里	
錢士升	六年癸酉入閣辦事	九年馳驛回里	
文震孟	八年乙亥刑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八年十一月回里 九年十一月卒	
張至發	八年乙亥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十四年辛巳再召入京不至	十一年戊寅回里	
孔貞運	九年丙子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同上	
黃士俊	同上 是年十一月進文淵閣	十年丁丑回里	

賀逢聖	同上 十四年再召入京 十五年入殿	十一年戊寅回里 十五年馳驛回里	
林 鈺	同年以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是年五月卒	
劉 宇 亮	十年丁丑陞吏部侍郎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進文淵閣改爲兵部尙書督察各鎮兵馬	十二年己卯回里	
傅 冠	十年丁丑禮部尙書入閣辦事 同上年月進文淵閣	十一年戊寅回里 清順治三年被執不屈死	
薛 國 觀	十年丁丑禮部侍郎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升尙書 十二年進文淵閣 十三年進武英殿	十三年庚辰閑住 十四年八月賜死	
程 國 祥	十一年戊寅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十二年己卯回里	

楊嗣昌	同上 十二年己卯八月督師	十四年辛巳卒於任	
方逢年	同上	十一年回里	
蔡國用	同上 十二年己卯進文淵閣 十三年進武英殿	十三年庚辰卒	
范復粹	十一年戊寅禮部侍郎入閣辦事 十二年進文淵閣	十四年辛巳回里	
姚明恭	十二年己卯俱爲禮部尙書 兼東閣大學士 十二年進文淵閣	十二年庚辰回里	
張四知	同上	十五年壬午馳驛回里	
魏炤乘	同上 十四年進文淵閣	同上	

謝 陞	十三年庚辰吏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十三年進建極殿 十五年入殿	十五年削籍
陳 演	十三年庚辰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十四年進文淵閣	十七年三月乞休京師陷被擄掠死
蔣 德璟	十五年壬午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十七年甲申二月致仕
黃 景昉	同上	
吳 甦	同上	十六年癸未遣戍
魏 藻德	十六年癸未五月以侍讀入閣辦事 十七年二月進文淵閣 總督河道屯練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被擄掠死
李 建泰	十六年以禮部右侍郎入閣辦事 十七年加太子太保督師	十七年三月被執

方岳貢	同上 十七年二月進文淵閣 總督河道屯練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被擄掠死	
丘瑜	十七年甲申正月以禮部尙書入閣辦事		
范景文	十七年甲申正月以工部尙書入閣辦事	十七年甲申三月京師陷死之	是年北都不守

就這五十個宰相看來，我們可分爲三個系統，第一是東林黨，像文震孟錢龍錫孫承宗范景文等人，可以當得沈重，皆不愧一時的正人。第二是周延儒的一派，像王應熊可以歸入此類，後來周派依附了東林，就與東林黨人混合了。第三是溫體仁一派，這派勢力最大，流傳很遠，像薛國觀是他的嫡傳。像陳演魏藻德是傳薛國觀的衣鉢，可以說是溫體仁的再傳弟子。崇禎一代的政治，都誤在他們幾個人的手裏，除了這三派以外，楊嗣昌比較有點作爲，其餘諸人，可以說碌碌無足數了。

五 南明三朝之黨爭

自崇禎殉國，北都不守之後，皇太子慈烺，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一般王孫貴冑，都紛紛南下。那時南方有勢力的人物，可以分爲兩派，一派是史可法，凡東林黨人都附和他；一派是馬士英，像阮大鍼等逆案中人都附和他；顯然的成了兩個大系統。當北都不守的消息傳來，南方自然紛擾不堪。史可法正督師勤王，他和姜曰廣呂大器都持立潞王常澂，馬士英卻聽了阮大鍼劉孔昭的話，主張立福王由崧，那時士英正督師鳳陽，因近水樓臺的緣故，就立了福王由崧，詔以明年春天改元弘光。故在他們兩派未合作以前，已分了鴻溝。

當福王即位之後，像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馬士英均作了東閣大學士，可以說是兩派混合的內閣，同時起用廢籍，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徐石麒爲右都御史，張慎言爲吏部尚書，黃道周爲吏部左侍郎，張國維爲兵部尚書，呂大器爲兵部侍郎，阮大鍼因爲被馬士英劉孔昭所擁護也起復了原官。但是這樣混合的內閣，意見既不相同，根本不能合作，不久，馬士英就攫得實權，把史可法排擠

到揚州去督師，當時就有「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的話。（見朱一是爲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原來在江北地方，設有四鎮，四鎮是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劉澤清等四人，分布在淮揚徐州睢州一帶，作江南的藩屏，高傑是一個麤暴的武夫，劉澤清等是馬士英的舊部，史可法初到了揚州，很費了一番工夫，首先克服了高傑，命高傑駐瓜揚，劉澤清駐淮安，劉良佐駐壽春，黃得功駐儀真，秩序纔慢慢的安定。

那時候，江南的士大夫，聽了北都失守，國家遭了這樣大的變故，像劉宗周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都召募義旅，來克復神京，及至福王在南京卽位，他們都起復官爵，但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所說的話，極爲痛切。但弘光自南京定都，數月以來，一矢不發，毫無動靜，兩派的人們只知道排除異己，勾引死黨，把興復的大計，早置在腦後，史可法很憤激的上疏說：

『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明通

可法雖然有這樣痛激的言論，但他們並沒有把他的話擱在心上。馬士英唯一的政策，就是起復阮大鍼，在弘光元年二月裏，大鍼就做了兵部尚書，同時吏部尚書張慎言要起復吳姓鄭三俊，被劉孔昭趙之龍所排擠，目吳姓等爲奸邪，張慎言就去了官。高弘圖姜曰廣與馬士英不對，也自行告退，馬士英指使了劉澤清參劾劉宗周，宗周也告退了。一般正人像黃道周陳子龍之流，皆被排擠而去。逆案中張捷楊維垣虞廷陛一流人，皆入了政府。錢謙益因爲恭維阮大鍼，也起復了原官，凡是當時不得意的人，現在皆有了勢力。

他們在國難時期，所辦的事情，就是興復了東廠緝事，重翻刻三朝要典，宣付史館，把霍維華等人，皆賜了諡。又因北都失守，投降李自成的人，定了六等的刑罰，更立了順案。順案的意思，是李自成的偽國號叫順，因爲與逆案相對，所以名作順案。順案裏面有周鍾項煜等人，周鍾是復社的領袖，他曾爲李自成草了登極的詔書，這順案的成立，完全是爲著報復。

在弘光帝由崧初立的時候，兩黨不是沒有合作的機會，但爲什麼兩黨的感情，壞到這步田地，平心而論，他們各有不是的地方，明通鑑附篇卷一下云：

「初高弘圖力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鍼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

「吾故人也，死醑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弘圖因患患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鍼宣言曰：「廣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益水火矣。」

由上節我們看來，逆黨實在有示好東林的意思，但東林實在相迫過甚了。又如阮大鍼與雷演祚本來很要好，朱一是爲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云：

『大鍼數謁雷僉事不報，一日攜酒過，雷踰牆避之，故置逆案几上，大鍼愧且駭。』

所謂君子不爲己甚，東林黨人這種辦法，實在教人太難堪了。因此：

『大鍼遂謀殺周雷，乘間潛告士英曰：「檢相君者史同謀也，周雷實主之，日夜謀不利於相君。」不擊南昌（姜曰廣）無以殺周雷，不殺周雷無以遏諸生之橫議，而東林禍君未有已也。士英心動，風奸人朱統鎭攻南昌姜相曰廣去，次周雷，又次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黃道周、楊廷麟、吳姓、劉宗周、周孝廉、茂才、楊廷樞、顧杲、吳夢笙、沈壽民、沈士柱、白夢鼎、夢鼐等七十二人皆不免，大指謂謀立疏藩，別圖擁戴，於是緹騎遍七郡，而周雷投獄刑部矣。』

所謂周雷之獄，周是周鑣，雷是雷演祚，全是東林黨人。明通鑑敘述極爲簡要，茲錄如下：

『初鑣以其伯父應秋，叔父維持，俱因媚閹列逆案，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阮大鍼居金陵，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揭公討之，以示鑣，鑣力任，大鍼以故恨鑣。會馬士英以逮治從逆之周鍾並及鑣，大鍼復羅致鑣，與演祚曾主立潞王，爲姜曰廣之私黨。于是朱統鑣疏劾曰廣，並及二人，而演祚前以劾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鑣等既下獄，大鍼憾不已，復修防亂揭之怨，逮捕復社諸生吳應箕、黃宗羲、陳貞慧、侯方域等，獄未成而南都難作。』

周雷二公遂成了黨爭中的犧牲者，是獄平復未久，就有南渡三疑案發生，所謂南渡三疑案，就是僧大悲之獄，和僞太子僞皇妃的故事。錢秉鐙藏山閣集卷六南渡三疑案云：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爲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癡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鍼、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謙益紹芳各具疏辯，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於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僞莫辨，而又有僞妃童氏之事……』

據徐鼎小腆紀年卷九謂：「……和從大鉞作正續蝗蝻錄，蠅蝻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從和者爲蠅爲蝻。」把東林復社的罪名，都加在大悲獄裏面，後來審問太子的結果，僞太子係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詐稱太子，乃把他下了監獄。童氏則弘光帝堅不承認是他的妃子，也把她下了監獄。童氏陳說：「失身之婦，無敢復生，非望上偶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歸死掖庭。」可是弘光帝始終不肯見他。我們想夫婦的恩愛，是人情所不能免的；弘光帝雖然薄情，何至負心如此！當時的人，就很起了懷疑。因爲我們以前說過那位福王被李自成作了福祿酒，福王的世子也早歿了，德昌郡王以序當立。由崧以前本不與士英認識，由崧南來，士英看見他有一棵福王的印，就把他認爲福王的世子，北都不守，就擁護他做了皇帝。所以這僞太子，僞童妃之獄發生以來，一般神經過敏的人，以爲弘光帝不承認童妃和太子，反倒不疑心童妃和太子，而對於弘光帝的本身反發生了疑惑。所以錢秉鐙說：「童氏但知德昌卽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這種傳說，一直到了明末遺老，像黃宗羲錢秉鐙皆主這樣的話，僅僅有李清的三垣筆記，他雖然反對馬阮，但於弘光帝卻還有相當敬意，討論還能持平，這是不可及的。

弘光帝的真僞，我們不去管他。但弘光朝的政治，真是鬧的一場糊塗。馬阮一流人物，攬權納賄，

只要有了錢，就可以做官。所以當時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的話。而弘光帝的爲人，又庸愚荒淫的可笑。明通鑑附篇卷一云：

「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奄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論者皆知其不可旦夕。而阮大鍼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櫟劇進之。歲將暮，兵報迭至，王一日在宮中愀然不樂，中官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云。」

這樣兒戲小朝廷中，忽然發現了僞太子事，人民更起了恐慌。黃得功極力上疏力爭以太子爲眞。那時左良玉坐鎮武昌，在長江的上流，率師東下，來清君之側，國內遂起了內訌。史可法那方面，早就不給餉了，清兵趁著這個機會率師南下，史可法一旅孤軍，那能抵抗，就在揚州殉了國。弘光帝於甲申三月在南京卽位，到元年五月裏清兵就到了南京，弘光帝跑到蕪湖被執，與僞太子囚在一塊，後來把弘光帝押到北京就被害了。明末遺老著有弘光北狩紀聞一書，可惜我沒有看見。同時明廷派到北方去議和的使臣左懋第，也被清廷所害。

清兵得了南京，死節的只有高倬，還有逆案中人張捷、楊維垣等，我們不能因爲他是逆案中人

就誹薄他。

在明代的末年，政府裏的人們，雖然這樣的庸懦，但是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氣節，卻是非常的激昂。他們眼看著國破家亡，他們不以為自己的力量薄弱，不去抵抗，清兵節節的前進，他們節節的困守，他們可以犧牲全家乃至全城的性命，來保存中華民族的精神，所以像嘉定的黃淳耀侯峒曾，江陰典史閻應元、陳明遇，他們可以拿一個小小的城池，與清兵抗敵好幾個月，清兵南下，勢如破竹，但江陰等處一兩個小小的城市，卻幾個月都攻不下來，由此我們知道不在兵力的多寡，只在人民團聚的精神。閻典史這樣人，看來似乎關係很小，但在我們中華民族史的光榮是很大的，同時高弘圖、流寓會稽也死了節，劉宗周在山陰，聽見南都失守，就餓死了，這都是一代中流砥柱，不可及的人物。

至於南都那些獻媚的宦子王鐸、錢謙益等都投降了清朝，成了新貴。那時馬士英因為南都失守，就牽著他的母親，假充皇太后，跑到方國安軍裏去，因此又生出來偽太妃一案，後來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阮大鍼從弘光跑到太平，看見弘光帝由蕪湖被清兵擒住，就逃奔浙東，後來投降到清兵某員勒博洛的帳下，因有馮銓的關係，命他作軍前內院，從征立功，但他的豪興又大發起來，談兵說劍，不減當年。他覺著咫尺功名，又可直上青雲了。藏山閣文存卷六皖事事實云：

「……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鉞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於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翅此矣。』」其中有黑內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鉞教以聲偶，令作詩，纔得押韻協律，卽拊掌擊節，贊賞其佳。黑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因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卽起執板頓足高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帳內劇談，聽者倦，旣寐有鼾聲，乃出遍歷諸帳，皆如是。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鉞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陳，復人人饜飫，蓋豫飭廚人以夜備矣。一日忽面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耿氏明金華知府）曰：「阮公面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暫駐衢州，俟我輩入關，取建寧後，遣人相迓何如？」獻忠以語大鉞，大鉞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強弓，鐵錚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又曰：「福建巡撫已在我掌握中，諸公爲此言，得毋有異志耶？」獻忠復諸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甚知東林復社，與渠有仇，因見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旣如

此疑，即請同進關可耳。」於是與大鉞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鉞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鉞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於汝後生；蓋示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而登，不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爲仙霞最高處。見大鉞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騎不應；馬上以鞭擊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

這位活寶，纔算是了結。

未幾，清兵到了杭州，潞王常潞投降了清朝。這時候明代的後裔唐王聿鍵卽位於福州，建元隆武。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他們都是明代的華胄，叔姪的關係，宜乎要和衷共濟了。但我們看來唐王的內部，武臣是鄭芝龍鄭鴻逵，芝龍的兒子鄭成功，那時他還年幼。文臣是黃道周蘇觀生張肯堂，文武根本不能相容，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黃道周傳云：

『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都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順治二年）進至婺源，爲清兵戰敗，被執。』

魯王所以能監國於紹興，幸虧是鄞縣的諸生董志寧、陸宇燾、毛聚奎等，當時號爲六狂生，與本地的紳士錢肅樂約好，在鄞縣起義，畫江而守，魯王纔能立國（據全祖望鮑埼亭集卷七錢公神道第二碑）。魯王監國紹興之後，就以張國維爲太傅督師，保守著錢塘江，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並爲右僉都御史，分防江上。總兵方國安自金華來，總兵王之仁自定海來，文臣沈宸荃、馮元龍，武臣黃斌卿、張名振皆起義師，援助魯王。當時浙江地面似乎很有起色；但經濟則極爲困難，就有分餉分地之議起。徐鼐小腆紀年卷十一云：

『……方（國安）王（之仁）兵旣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所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汝霖）孫（嘉績）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

以唐魯兩王的局勢來看，唐在福州，魯在紹興，惟其有魯王的監國，唐王纔可以居守。他們兩方應該互相借重的。但兩方因爲名分關係，又起了衝突。在本年十月裏，隆武命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受。錢肅樂、朱大典謂宜權稱皇太姪報命，大敵在前，未可先讐同姓，議大不合，後來卒從了

張國維的主見，國維遂上疏閩中曰：

『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並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爲難，一一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莫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

隆武帝看了這個疏，非常的不高興，唐魯遂成了水火。後來隆武帝的使者至浙東，魯總兵方國安縱兵奪其餉，留清源於軍中，且出檄數唐王罪，張國維說：「曲在我矣！」……（據明通鑑）不久，魯王的使臣陳謙到隆武那裏去，又被隆武殺了，陳謙是鄭芝龍的朋友，芝龍爲他營救，隆武帝不聽，因此芝龍與隆武帝意見不合，不久就投降到清朝。據董廷獻閩事紀略云：

『時東南民望漸屬魯藩，畫錢塘爲界，烽火相望，說者謂胡絨也而吳越矣。會中州侯若孩，攜家往贛，詢及世事，搖手蹙額，謂此時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處累卵之危，而修筆舌之怨，忘敷天之忿，而操同室之戈，吾其濟乎！時浙閩甌脫，自分彼此，官兩地者，各不自安。朱大典以一旅處兩大間，左右瞻顧，九江關外，聲援旣絕，錢塘兵力不支，時事難言之矣。』

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唐魯這樣的局勢，偏偏還要爭意氣，那能有長久的道理，所以在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清兵就由福州把隆武帝趕到汀州，隆武被擒遇害。魯王也保不住紹興，退守到舟山一帶，山堂水殿，作了他的行朝，整天的漂泊海島，拿舟楫作生涯，與海鷗落日爲伍了。

自唐魯二王失敗以後，江浙的地方，遂非明廷所有。在隆武二年七月（一六四六）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都入了關，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都奉表勸進，並以馬吉翔郭承昊等爲錦衣衛使。不久，卽皇帝位於肇慶，改元永曆。同時大學士蘇觀生奉隆武帝的兄弟聿錫監國於廣州，國號紹武，但不久就被降將李成棟所害，觀生自縊。那時廣東的鄉官張家玉陳子壯等起兵於東莞，聲氣很爲浩大，但不到幾個月，就被李成棟所敗。

不幸的命運，永曆帝自卽位於肇慶，爲清兵所迫，同時奔波於肇慶梧州全州各地，又爲強臣所把持。那時瞿式耜留守桂林，他勸永曆帝到桂林去，但同時強臣劉承胤，以兵入衛，就佔據了全州。那時馬吉翔郭承昊等與劉承胤通氣，承胤就請永曆封郭承昊爲伯爵，御史毛登壽劉湘客等都以爲不可，承胤就劫永曆帝到了武岡。在危急存亡之中，又起了內訌，瞿式耜在那裏獨守空城，桂林更是

危急了。清兵得到這個消息，就連忙的去打桂林，而且高雷廉三州已被清兵所據，幸虧守將焦璉極爲勇敢，算是把清兵打敗了。同時何騰蛟又克復了全州，江西的金聲桓也叛了清廷，歸順明朝，李成棟也把廣東歸順了永曆，永曆帝所以能支持十幾年，都是因爲打了幾次勝仗，和金聲桓李成棟歸順了的緣故。

於是瞿式耜就把永曆帝接到桂林，成了一個偏安的局勢。當時從難諸臣，各自矜功，裏邊的黨派分歧，黨爭的情勢又形發生。倪在田續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永曆黨禍云：

『上下尸素，而各自爲黨，嚴起恆、朱天麟、王化澄、堵胤錫、吳貞毓等從患難蔑降臣爲一黨；洪天擢、袁彭年、潘曾緯、毛毓祥、李綺於歸附凌朝士爲一黨；吳燦、劉湘客、陸世廉、馬光儀、丁時魁、蒙正發、金堡、李用楫、徐世儀、施召徵皆自諸路赴行在爲一黨；陳世傑、楊邦瀚、王應華、李貞高、賈明吳以連唐元楫皆廣東人官本州爲一黨。』

同時永曆朝的武臣，自劉承胤去後，李成棟歸附了明代，他的養子李元胤也做了吏部尙書，還有陳邦傳也手握兵權，他們兩個最有實力，劉湘客、金堡一輩，與李元胤極爲要好，朱天麟、吳貞毓又比附陳邦傳；因此朝臣就分成兩大派。續明史紀事本末云：

『已爲吳楚兩黨，吳黨以朱天麟、王化澄、吳貞毓、李用楫、張孝起、萬翔、程源、郭之琦主之，皆內援馬吉翔，外倚陳邦傅；楚黨以金堡、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主之。皆外聯瞿式耜，內恃李成棟。』

在這兩黨之中，要算金堡最有名節，他不顧忌一切，敢於發言。小腆紀年卷十六云：『給事中金堡劾陳邦傅十可斬，馬吉翔、龐天壽嚴起，王化澄並與焉。吉翔氣燄方張，至是頗懼，盡謝諸務；化澄起恆並疏乞休，由是堡直聲大振，諸輕剽喜事者，自元胤、彭年以下，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懽。……』因此遂爲敵黨所忌，目爲五虎。小腆紀年云：

『……當時有假山圖五虎號，假山圖者，繪假山一座，朝官數百人，有首戴者，肩負而手托者，仰望遠聽，指點而話言者，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疾走者，又謂之假虎丘，以袁彭年爲虎頭，時魁爲虎尾，正發爲虎喉，湘客爲虎皮，堡最可畏爲虎牙，堡與時魁等相繼攻起，恆吉翔、天壽無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危，賴吉翔左右之，令擬旨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之，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可解。……』

五虎的勢力，雖然囂張，但同時堵胤錫輩對於他們極不滿意，所以到永曆四年成棟被清兵所

害，李元胤鎮守肇慶，陳邦傳入衛全州，五虎派就失去了勢力。吳貞毓、郭之奇輩得了政權，欲修舊怨，就上疏說：『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永曆帝就把他五人治了罪，並且仿楊左之獄追賊的故事，把他們都追賊遣戍，對於金堡用刑尤慘，幾至折了股。小腆紀年卷十七云：

『都督張鳳鳴，受密旨，欲因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鞫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招賊數十萬。獄成，堡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賊。』

本來金堡極有鋒芒，不愧一個君子，所以瞿式耜上疏相救，同時嚴起恆是金堡的敵黨，他也竭力來挽救他，這在黨局最紛亂的時候，尙可以見到一點公平，起恆也不愧一個有識量的人了。

自此南明的形勢，更加墮敗，在永曆四年十二月，桂林不守，瞿式耜殉了節，李元胤被清兵所擒，陳邦傳也投降了清朝。那時候四川的張獻忠已死，他的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秀等都驍勇善戰，出沒於雲南、四川之間，苦於名義不正，不能號召羣衆，所以都投降了永曆。於是李定國破沅靖、武岡三州，旋下全州，入了桂林，直逼衡州，明廷的氣象很爲振作；但是李定國雖然幫助明廷，孫可望看見李定國勢力強了，就與李定國成了仇隙。可望目中本來是沒有永曆的，他最初的開釁，是勒

迫著永曆封他秦王，大學士嚴起恆楊畏知很反對封王的事情，可望就把他們殺了。把永曆劫到安隆，可望自己稱了王。起先待永曆還好，後來越發不像樣子。可望的銀米報冊上稱：『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即此一端，就可以知道永曆當時情形了。

那時從難的臣子僅留下了吳貞毓、張鐫和馬吉翔、龐天壽等兩派，吳貞毓等是幫著永曆帝的，馬吉翔輩就勾通了孫可望，想著教永曆帝禪位於可望。吳貞毓等看著永曆帝太受虐待了，就命林青陽祕密通信到南寧，教李定國來安隆勤王，但事辦的不祕密，被馬吉翔所發覺，可望就把吳貞毓、張鐫、鄭允元、林鍾、趙廣禹等十八人都正法了；因此後人就叫做十八先生之獄。那時黨中的份子，只賸了馬吉翔、龐天壽一派。永曆十年，李定國把孫可望打敗了，奉永曆帝到了雲南。吉翔等又投降到定國的門下，不久清廷派吳三桂來征討雲南，吳三桂把李定國打敗，永曆帝跑到緬甸。以前緬酋對他還好，後來緬酋的弟弟莽猛白弒兄自立，他對於永曆的態度大變，在永曆十五年七月裏，就出了呪水的事情。小腆紀年卷二十云：

『月之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辭不行，踰二日，緬使再至曰：「我王慮諸君立心不好，請飲呪水，令諸君得自便貿易，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邪？」沐天波欲辭焉。馬吉翔、李國泰曰：

「蠻俗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圍行帳，呼諸臣出，諸臣倉卒無寸兵可恃，又慮震驚宮闈，不得已相將並出，出則縛而駢殺之。」

永曆帝的從臣，只有鄧凱他因為有腳氣，沒有去，算是避免了這場禍，他作了一部書名作也是錄，記載呪水之事甚詳。自馬吉翔死後，明代的黨禍就算完結；而永曆帝也被緬酋所執，送到吳三桂那裏去。不久，被吳三桂所殺。南明的名將李定國也在交趾病死，白文選投降到清朝。只有鄭成功仍奉永曆的正朔，在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鄭成功和張煌言由福建沿海一帶率兵直上，佔據了鎮江等地，安徽池州蕪湖英霍山諸寨都響應了明朝；但是曇花一現，也歸於失敗了。

六 清初順治康熙間之黨爭

到了明廷覆亡之後，那一般縉紳先生們，都搖尾乞憐，入仕了新朝；而黨爭這件事，就因此發生。但是在清朝未入關以前，他們滿人裏面，也有黨爭的事情，像清太祖努兒哈赤死了之後，皇太極得立爲皇帝，他們內幕裏面，也有黨爭之事，據日人內藤虎著的清朝初期之繼嗣問題，論清初繼嗣甚詳，他的大旨謂蒙古之風俗，成吉思汗死後，其遺產分配，嫡妻孛兒帖之少子拖雷得遺產最多，而爲全版圖之主。太祖生子共十有六人，其最主要的，茲依其母係分配如下：

福金修甲氏

褚燕
代善

繼福金富察氏

莽古爾泰
德格類

孝慈高皇后葉赫納喇氏——皇太極（太宗）

大福金吳喇納喇氏

阿濟格（英親王）

多爾袞（睿親王）

多鐸（豫親王）

其中長子褚燕謀叛被殺。太祖在日，令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每月輪流互管國政。阿敏是太祖之弟速爾哈齊的兒子。但太祖很愛多爾袞，有立他爲嗣的意思，燃黎室記述卷二十七引日月錄云：

『或曰奴兒哈赤臨死，謂貴永介莽古爾泰曰，九王子當立而年幼，汝可攝位，後傳九王，貴永介以爲嫌避，遂立洪太氏（皇太極）云。』

又燃黎室記述引丙子錄云：

『丙寅五月，建州奴酋奴兒哈赤疽發背死，臨死命立世子貴榮（一作永，二王子）介。貴榮介讓位弘他時（一作弘太始）曰，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弘他時略不辭讓而立。』

太宗卽位之後，不久阿敏因放棄永平四城被誅。太宗和代善莽古爾泰共當國政，號三尊佛的制度。後來莽古爾泰因謀逆革貝勒尊號，代善聽了他兒子薩哈廉的話，知幾而退。太宗纔大權獨攬，

成了一代的帝業。後來太宗上崩，又起了繼嗣問題，但太宗手下的將官，都一致擁護太宗之子，所以多爾袞等就乘機擁護福臨作了皇帝。後來多爾袞之得罪與這個問題很有關係。這個問題，雖然不在我們研究範圍以內，但可以看見清初繼嗣糾紛的情形，和清初黨爭的發生。

我們研究清初的黨爭，第一要明白清初黨爭是由明代傳統而來的。第二我們要明白漢人的互相傾軋。我們要揭破這一般假道學的把戲，和清初士大夫的植黨，是怎麼一回事。輓近雖然發現了這樣不少的史料，但是仍然不能完備，此不過研究清初黨爭的發軔罷了。

在清初的黨爭，我們可分爲順治和康熙兩個時期，在順治時代，是南人與北人之爭；康熙時代，是南人與南人之爭。這種痕跡是很顯然的。

(1) 清順治間之黨爭 在清朝順治時代的黨爭，我爲什麼說他是南北人的互鬭呢？因爲清代定鼎的初年，漢人像范文程，金之俊，洪承疇都入了內閣。清廷用的是以漢人治漢人的方案，所以漢人很能得到權利。清史稿本紀五——順治的遺詔上說：

『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託，盡厥猷爲，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爲戒，委任漢官，卽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

弛，是朕之罪一也……』

這可見漢人能得到一部分的權勢情形。同時我們要明白清代內閣的官制，是依着明代而稍變更的，天聰年間清廷在關外的時候，內閣叫作內三院，是國史院，祕書院，弘文院，各置大學士一人，順治二年，以翰林院隸內三院。每院置漢大學士各二人，到康熙九年以後，改內三院爲內閣，滿漢大臣都可以入閣做大學士。

所以漢族的大臣，他們一方面勾結滿州的大臣，一方面厚植自己的黨羽，這樣植黨的情形很顯明的就是馮溥和陳名夏。馮溥是涿州人，陳名夏是溧陽人。馮溥是魏忠賢的逆黨，名夏是東林的後裔。馮溥所引用的人是北方魏黨的餘孽，名夏所引用的人，多係東林的子孫。我們知道東林和魏黨根本不能合作，並且有傳統的思想，因此他們兩人因東林和魏黨的關係，他們引用的人，就成南北二派；而「馮銓和陳名夏素相矛盾的話，載在順治的上諭，頗哄傳一時。」（清史稿本紀五）

『順治十三年三月癸卯諭云：「朝廷立賢無方，比來罷譴雖多南人，皆以事論斥，非有所左右也。諸臣毋歧方隅，無立門戶，毋挾忿肆誣，毋撫嫌苛訐，庶還蕩平之治。」』

貳臣傳卷七十九馮銓傳云：

「銓奏曰：『人有優於文，而無能無守者；有短於文，而有能有守者。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上是其言，仍授弘文院大學士。」

這可以見南北兩派分裂的情形，那一般南方的人，皆由陳名夏所引用而來的。貳臣傳卷七十

九馮銓傳云：

「十一年正月與大學士陳名夏同疏薦原任少詹事王崇簡，巡按御史郝洛，給事中向玉軒，中書宋徵璧，知縣李人龍，可擢任。前明翰林楊廷鑑，宋之繩，吳偉業，方拱乾，中書陳士本，知縣黃國琦，可補用。」

名夏本是社局中人物，早年曾入幾社，他曾著有五十大家之刻，在南中是矯矯的人材，所以他所引薦的陳之遴、宋徵璧、吳偉業皆是社局中的人物。偉業曾爲陳百史文集作序，稱引備至。因此那一般南方社局人物，在順治初年都得到了科名，飛皇騰達。到後來科場案，逆書獄發生，「江上之得免者，賴主盟者皆在朝列。」杜登春社事始末記之甚詳，這都與陳名夏輩很有關係。名夏和馮銓能得到政權，同是諂媚多爾袞；但他們意見既然不合，就互相傾軋。及多爾袞事敗，御史張煊就參名夏「結黨行私，銓選不公」，列舉有十大罪狀，有依附邪黨一款。那時吏部尙書譚泰獨袒名夏，以張煊

所劾諸款，皆赦前事，語多不實，煊坐誣論死。到順治十一年，大學士寧完我又參名夏結黨營私等罪狀，名夏獲罪處絞。馮銓就營連入了內閣，那時南人很受他的打擊，當時有『何人當國憐孤掌，有客還山畏老拳』的話，這可以見當時的情形了。

(2) 清康熙間之黨爭 玄燁卽位年纔八歲，福臨的遺詔，就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但康熙是很英明的人，到了康熙八年，就治了四輔臣的罪。自此以後，滿大臣入閣專權的人就分索額圖明珠兩派，他們互相植黨，把持政權，那一般無恥的漢人，像余國柱，李光地，徐乾學，熊賜履，高士奇等，全是出於明珠之門，李光地初事索額圖，後來也趨附明珠。同時還有噶禮之黨。清史稿列傳卷五十六云：

『明珠與索額圖互植黨相傾軋。索額圖生而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斥之，於朝士獨親李光地。明珠則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異己者，以陰謀陷之，與徐乾學等相結。索額圖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陰斥去，薦湯斌，傅皇太子卽以傾斌。』

那時滿人之中，除了索明兩黨外，還有爭立太子之事，原來玄燁共有三十五子，自太子胤初被廢之後，胤禩胤禪等都想爭立爲太子，全都招納賓客，厚植黨羽。胤禩胤禪胤禔胤祉爲一黨；胤禩胤

祥爲一黨。胤禩的門客有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等，胤祉的門客，有陳夢雷周昌言楊文言等，胤祉長於曆法，玄燁很稱贊他，康熙朝敕修之律曆淵源圖書集成，都出於胤祉門客之手。後來胤禩得立，把胤禩胤禔改名爲阿其那，塞思里，將自己的兄弟改名爲豬爲狗，不齒於人類，同時胤禩胤祉也削了爵，依附諸臣，也都治了罪（據清史稿列傳七）。

我們再說這一般依附滿人的士大夫，他們來諂媚滿洲的大臣，悅媚取容，也就罷了，而他們又要自己互相傾軋，暴露漢人的弱點，清玄燁是一個雄鷲之主，他看的很清楚的，反利用他們的傾軋，來刺取漢人的情勢。所以清聖祖說：『蠻子那有一個好人。』又說：『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據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三卷十四）亡國的士大夫竟汗顏無恥，到這步田地，真可爲之太息。因此我不憚煩，把李光地，徐乾學，熊賜履，高士奇等幾個表表的人物，道學的名家，將他們互相傾軋的現象，簡單的分析一下。並且這些材料，大半出於李光地的榕村語錄續集，可以說他是自招的口供，拿他來作黨爭的結束。茲先述李光地和陳夢雷互訐的歷史。

（1）李光地與陳夢雷互訐事件 光地字晉卿，安溪人。順治九年進士，他和陳夢雷是很好的朋友，耿精忠在福建反正，同降了精忠，李光地和陳夢雷蠟丸告密，光地身赴北都，夢雷仍留福建。他

們二人好像同作一種投機的事業。無論那方成功，他們都可以得到勝利。但蠟丸書寄到北京，光地僅寫了自己的名字。事平之後，光地得到聖祖的寵信，反把夢雷埋沒了。後來夢雷被逮，光地並沒有切實的救他。這件事當時傳說不一，自有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陳夢雷松鶴山房集發現後，兩下比較，他們的事實，纔可以得其究竟。茲先述清代傳記的傳說。清史稿卷四十九李光地傳云：

「陳夢雷者，侯官人。與光地同歲舉進士，同官編修，方家居，精忠作亂。光地使日烜潛移夢雷探消息，得虛實，約並具疏密陳破賊狀。光地獨上之。由是大受寵眷，及精忠敗，夢雷以附逆逮京師，下獄論斬。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夢雷得減死戍奉天。」

錢儀吉碑傳集陳壽祺撰陳夢雷傳云：

「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善，及難，光地亦在假，因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夢雷方干嚴譴，無以自明，引光地爲助，光地密疏救之，語載國史本傳。夢雷不知故，怨懟憤懣，牢愁哽咽，往往詭激，於文詞雖過其實，然志足悲也。」

在表面看起來，似乎都是夢雷的不是，其實光地不但埋沒了當時的事實，並且把歷史上的是非，也被他改變了。我們且看陳夢雷的敘述：松鶴山房集卷十三有與李厚菴絕交書，抵奉天與徐健

菴書，卷十九孺人李氏行述。均說這件事情。絕交書說的尤爲痛切。茲錄於后：

「昔甲寅之變，不孝遁迹僧寺，逆黨刃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鉞林立，喋屍踐血，不孝恬不爲動，見賊不跪，語不爲屈，以爲苟得全親，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將寘於刑，已復放歸。不孝卽削髮披緇，杜門旬日，逆賊分曹授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賊臣教以遍加網羅，防杜不測，遂脅以僞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辭其印札，不赴朝賀，瘠形托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有心所共嘆，不假不孝一二談也。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舉族北奔，非有關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顧乃翻然勃然忘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而不孝以素所欽仰之心，猶曲爲解諒，謂不過爲怯耳。故年叔初來，不孝卽毅然以大義相責，令速歸勸阻。又恐年叔不能堅辭，不足動聽，復遣使輔行；而年兄已高巾襃袖，投見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駭懣，投匕而起；然思隻手回天，孤立無輔，舉目異類，莫輸肺腑，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故嚴詞切責，怒髮上指，聲與淚俱。先慈恐不孝激烈難堪，遣人呼入。家嚴出以婉詞相諷，至自述老朽以布衣受封，已甘與兒輩闔門共斃，年兄亦爲改容。家嚴乃呼不孝出，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靡不備悉。不孝又

謂以皇上聰明神武，天道助順，諸逆行次第削平，矧小醜區區，運之股掌者哉。年兄猶以爲落落難合。及不孝引楊道聲與年兄抵足一夕，年兄既深服其才，且見其勝國衣冠之遺，猶有不屑與賊共事之意，始信前言。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離耿繼美以墮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不時之應。年兄遁跡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至尊南顧之憂。年兄猶慮既行之後，逆賊有意外之誅求，欲受一廣文以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若後有徵召，當堅以病辭。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爲保，年兄始慨任其事。臨行之日，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嗚呼，當此之時，不孝揚眉怒目，隕涕歔歔，天地爲之含愁，鬼神爲之動色；凡有血氣，聞之當無不扼腕酸心，捐軀赴義者，嗚呼！息壤在彼而忍忘之乎？年兄既行，耿鄭構兵，音耗莫通，不孝兩次遣人出關，終不得達，意年兄當已代陳天聽，而年兄猶豫卻顧。及至耿逆敗紐，聞招撫之令，始遣紀綱抵省，謂不孝能勸諭歸誠，乞與其名。噫嘻，不孝托病拒逆，何由進帷幄之言，年兄身在泉郡，何由預勸降之策，其爲術豈不疎乎？然不孝所喜者，年兄已乃

心王室，意在見功，事蔑不濟，而彼時耿逆猜忌方深，城柝嚴密，片紙隻字，不能相通。且紀綱頗稱解事，可宣心腹，因備告以耿逆勢未窮蹙，不肯歸誠。今幸耿繼美已被離間，出鎮浦城，內生疑端。海賊雖已連和，彼此未忘瑕釁，不若各散流言，使二逆相圖，以分兵勢。一面遣人由山路迎請大兵，道由杉關，一鼓可下。臨城不順，則內應在我。反覆叮嚀，兩日遣歸。蓋自張誥回後，不孝方幸年兄之克有成功，而不虞其萬一相負也。親王入境，年兄抵省相見，乃詭言謂爾時假道汀州，恐爲耿氏捉獲，則我可幸全，爾立齏粉矣。今幸同見天日，爾報國之事非一，吾當一一入告，爾俟吾奏聞之後，然後進都。又作詩相贈，不諱省中誓約之言，美不孝反周爲唐之功；不孝亦遂安心以待，豈疑有護短貪功之意乎！丁巳之秋，與年兄束裝赴闕，而年兄以聞訃歸。不孝見年兄方寸已亂，不復與商，遂以戊午之春，入都請罪。蓋亦自信，三年心迹，輿論共嗟，不必待人而白，初不料道路阻隔之先，京師之訛言百出也。及到，始知以陳昉姓名之故，誤指不孝曾爲僞學士，殊爲駭然；而銓部無據呈代題之例，吾鄉撫軍又易新任。於是遣人具呈歸家，蓋將以具疏可否請於撫軍，然後詣闕席藁。在都儼邸閉戶，公卿大臣未通一刺。一二師友通問，不孝一語不及年兄，今從前在都諸公歷歷可問耳。不孝家人歸時，值年兄以通道迎請將軍事聞。上重年兄從前請兵之勞，溫綸載錫，晉秩學士。親王亦信年兄

昔日之節，親屬子弟，皆借軍功，給札委官。昆從顯榮，僮僕焜耀，是不孝無功於國家，而所造於年兄者，豈鮮淺哉。夫酌清泉者，必惜其源；蔭巨枝者，必護其根。年兄當此清夜自省，宜如何報德也。乃功高不賞，但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時家嚴以撫軍在泉，遣使具呈請咨到京，而年兄竟留其呈詞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又恐同人別爲介紹，貽書巧說，阻其先容。不孝在都，半載不聞音耗，五千里遠道，徬徨南歸，嗚呼！年兄竟用心至此耶！

如今再看李光地的辯說，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云：

『陳則震（夢雷字）同年中最相善，予請告于十月回，陳臘月歸，予與相訂云：「福州荔支不足吃，明年五月可至吾泉吃荔支。」陳允諾。及滇將亂，耿王日日練兵，聲息甚惡。予遣人至省，寫一札與之，言耿精忠甚可慮，省城逼近，恐不可保。君可託諸荔支之約，至予邑同商保全之道。陳大言云：「此豎子焉敢有此！蓋輕耿也。不數日，遂變起，而陳已戴紗帽矣。」陳後以書招予云：「耿大不能置君于度外，恐不測，奈何？君可來同商。」予密札云：「一至不能還，奈何？」陳云：「君騎一驢子，似行客，至予家，語畢即去，誰知君者？」予如其言，至其家，無他語。予次日辭欲去。陳曰：「君安得去！一入城門，門卒即有報某某進城矣。」予曰：「奈何？」陳曰：「且見耿王再商。」不多時，耿精忠

卽諭其大臣傳予至衙前，問予何故反？予立答曰：「以予爲反，兵馬何在，反迹何據？且予信反，何故在此？」其大臣回復，耿言既不反，當留用。予急甚，回至陳處，知其意頗不善。後有家書至，言父病危在旦夕，予卽詣耿，見其少年傳宣哀懇以父病告，求暫省視卽還。傳宣入言，耿言此自大事，命伊暫歸速來。予卽出城，行兵間幾危。後予復進計於陳曰：「君陷于賊，非得已；但旣如此，須求自脫。如今耿雖與海賊暫和，然耿之不能遠出者，畏海上之乘其後也。如今本朝所恃者，海澄公（黃梧）耳，海澄公與海賊有父兄之仇，雖屈于兵力與海通，然一心歸向本朝。今海兵五萬攻之，此局壞，本朝無望全閩矣。君何不勸耿逆救海澄，與之協力敗滅海賊，耿無後患，可以進前，卽大勝海賊，賊勢阻亦無能爲。海澄公必歸心于耿，耿亦可由此恃海公澄而前進。君慫恿耿出征遠處，乃可思自脫。」陳不聽，且對予使張來言，吳逆之強，本朝天下四分五裂，京師多變，無復可望。張僕信其言，回卽辭予他往。先是隨余僕役者，皆去盡；惟張僕隨，至是亦去矣。後蠟丸進表自通，蒙有優旨。耿逆平，予至福州，陳反責予表上何不掛其名？予唯唯而已。予勸其攜家至予處居住，予尙能供饋之。且言閩亂正未已，可伺便爲君計，陳言本朝用兵如兒戲，焉能有機可乘。後亦隨予至安溪，適值泉州山賊起，陳卽歸，以爲安溪不可居也。後寧海將軍及予平山賊，將軍曰：若陳翰林在此，于敘功內開列，可以

除罪，而陳一時孟浪。到京師，將軍爲予上疏言供饋接應大兵，又蒙優旨。陳踴躍歸，求予言，且緩圖之。後庚申予同先慈入京。陳言必欲隨至京。予曰：「近姚總制重予言，有同年張雄者，亦曾事僞，予託之於姚，姚卽特疏敘其功，竟以部屬用。君來，吾命舍弟送君至姚處，懇切端託，必得當。吾見上再乘機言之于內，君事必濟。」陳回書不以爲然。予後行至衢州，見李武定詢予云：「君知貴鄉已平乎？」予曰：「有報乎？」曰：「有，姚總督已于某日破海賊，走歸臺灣矣。陳若在此，大有機會也。」陳屢不聽予言，堅欲上京，爲東海（徐乾學）所構，遂與予爲仇。言予不肯上章奏，所云面奏，皆詐耳。東海又復至予處，爲陳言。予曰：「予非憚章奏，恐無濟于事耳。」東海云：「君不必求其有濟，但上章奏，爲朋友之事畢矣。」予曰：「信若此乎？」東海曰：「然。」予云：「予作疏稿，恐有不盡心，君可爲我代作一稿。」徐卽成。予一字不移，寫上。上對北門云：「李某何爲饒舌。」不喜者久之……」

由這兩段自敘的供狀，夢雷倒可以看見他的肝膽，光地是處處說假話，處處可以看見光地的飾詞。姚啓聖既然信光地的話，光地爲什麼不保舉陳夢雷？陳李的是非，不問可以自明。這件事當時鬧的很大，就是康熙帝也知道了。後來夢雷遣戍到奉天去，有一次康熙帝到關外詔夢雷談話，榕村語錄卷九記的很詳細，茲鈔錄於下：

『……後來陳則震自關東回，曰楊道聲勸他不要鬧，他說我在鐵嶺，皇上放進帳房，屏左右曰：「汝屢次告李某，你今日在我前，有甚麼話，一總奏來。」我因說他欺君賣友事。上曰：「還有甚麼話？」我又說：「他如何害我，」如此兩三番。上作色曰：「你是箇罪人，如何見得我；你今日有話不說，自此後終無見我之日矣。」我因說皇上要奴才說甚麼話？上曰：「就是李某的話。」我說：「李某負奴才千般萬般，要說他負皇上却沒有，奴才怎敢妄說。」上色卽和仰屋以舌抵齒，作嘖嘖聲，已曰：汝出去罷……」

這是康熙帝有意挑撥，還是夢雷老實，不然夢雷與他說上幾句壞話，李光地也要擔一部份的罪名了。但光地實終沒有挽救夢雷，由光地自己的話可以證明。他說：

『皇上在永定河舟中，又提起這話云：「他要你一救，救他个完全纔快活。」予略奏曰：「他說臣別的都可不辨，惟有兩端：說臣要做耿精忠教官，爲何不做他的大官，就當一名兵，也是從逆；何苦既從逆，又要做个教官。他又說臣上蠟丸書，是他定的稿，實無此事。果然如此，臣亦負心，實無此事，臣卽爲朋友，也不敢捏造無影的事欺君父。」上往關東謁陵，又厲其辭色以問之，屢問而則震不過還是將那絕交書上的話回奏。」

光地上蠟丸書的事情，本來與夢雷合作，後來光地得意了，不但不救他，反下井投石，把他排擠出去。由上這段話，可以見光地根本沒有救夢雷的證據。因此夢雷就依附了徐乾學，松鶴山房集中有與徐乾學不少的信。在光地回籍的時候，乾學就因光地薦德格勒掌院庫私抹起居注事來參劾光地。幸光地在太皇太后的喪事，趕快奔喪到京，纔沒有把官參掉。榕村語錄裏面說的很詳細，可以參閱原書，茲不復舉。光地和乾學都是恭維明珠，語錄裏面稱明珠爲明公的地方很多，後來卻彼此傾軋，成了極大的仇隙。

光地當日很得康熙帝的信用，所以一般的大臣，都依附他，江南的士大夫出於他門下的很多，遂成了一部分的勢力。汪景祺西征隨筆云：

『宿遷徐用錫選館後，歸安溪相國之門，社鼠城狐，無所不至。乙未分校禮闈，恃安溪之勢，手握定，四總裁咸怡聲屏息，聽其所爲。榜發，士論大譁，安溪亦不能安其位。臺臣董之燧劾其苞苴關節，安溪力救之。董之白簡，雖非至公，然所言不可以人廢也。』

光地的聲名狼籍，品節惡劣。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稱「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又謂：「吾鄉陳大理心齋，嘗令漳浦，以爲

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暇。」謝山解說，雖不免言過其實，然也可見光地品行之不端了。

至陳夢雷纂修圖書集成一事，是夢雷由遼東釋歸，在誠親王胤祉門下所纂的，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四云：

「吾鄉相傳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遷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祕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全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跖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這是胤禩的上諭，時胤禩卽位，陷害諸弟，陳夢雷楊文有以黨附胤祉，故又重遭譴責。但圖書集

成，實非出於夢雷一人之手。顧惇量金東山（門詔）文集序云：

『聖祖朝，命大臣開館輯古今圖書集成，招試輦下諸生，見先生首列，獨纂經籍，書成凡五百卷，藏之冊府，登之琬琰，以垂萬世。』

恐怕纂修者尙不止陳夢雷金門詔等人。

胤禩諭中，所說的楊文有，就是陳夢雷李光地書中所記的楊道聲，道聲是夢雷最要好的朋友，松鶴山房集裏面他的評語很多。道聲長於曆算也客於胤祉的門下。清史稿列傳八云：

『聖祖邃律曆之學，命胤祉率庶吉士何國宗等輯律呂算法諸書，諭曰：「古曆規模甚好，但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曆書，規模宜存古，數目宜準今。」五十二年十一月書成奏上，命以律呂曆法算法三者合爲一書，名曰律曆淵源。」

據說律曆淵源一書，實出道聲之手。大亭山館叢書南蘭紀事詩小傳云：

楊道聲名文言（文有係文言之誤）武進人，父瑀字雪臣。子四人，承志偕隱，盡傳其學，而道聲爲最著。道聲幼有神悟，於學無所不窺，尤通曆算，長洲何焯用西法推尙書：「辰勿集房」不合。道聲以大衍授時二曆推之皆合，一時稱爲絕詣。少遊閩中，值耿藩亂起被羈，事平得出，聖祖夙知之，

嘗問於李光地，對曰：「杜門高蹈，李顥之流。」晚依徐尙書乾學最久，終隱於家。著有圖卦闡義，易俟，書象圖說，書象本要，握奇發微若干卷，南蘭紀事詩十五卷。

這篇把他從耿藩和客胤社事跡全都刪去，但可以看見他編律曆淵源的痕跡，我將來擬作李光地陳夢雷事蹟辨，此不過敘述其大概罷了。

(2) 熊賜履嚼簽子的事件 賜履字敬修，湖北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是一位道學家，他嘗說：「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他著有閑道錄，是一部有功世道之書，但這位聖人的門徒，卻做出嚼簽子不平庸的故事出來。嚼簽子這件事，清史稿列傳卷四十九云：「賜履改革簽欲諉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立德以語索額圖，事上聞。吏部議賜履票擬錯誤，欲諉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簽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奪官歸。」由此段看來，榕村語集說他嚼簽子的事，當不至於誣了。語錄續集卷十四云：

「予初入翰林時，孝感望甚重。就是嚼簽子事，天下都不信，還說是索公害他，沒有這事，使孝感不落東海套，竟不出其聲名，到後代了不得却被此再用出醜了。予問嚼簽子事，曰：那時三藩亂，中堂閣學時常錯批議罰俸。上都免曰：「他們心亂了，本無大事。」當時馮益都，李高陽，杜寶坻，與孝

感同在內閣。孝感偶然擬批錯了一件，被皇上檢出來問，孝感頗心動。次日五鼓，便先到閣，叫中書拏本來，又命中書退。看是自己錯的，見寶坻（杜立德）平素糊塗些，因將自己簽子嚼了，裁去寶坻別本一條批簽，易書此錯批于上。將寶坻不錯本，入自己數內，而自書其批。寶坻來，孝感迎謂之曰：「老先生昨又錯批了本了。」寶坻這日却又精明，即取本看，自己搖頭作色曰：「學生不曾見這本！」孝感曰：「老先生忘記了，非公而誰？」寶坻又審視曰：「昨日不曾見此，是何緣故！」厲聲呼中書林麟煊至前罵曰：「吾不曾見此本，都是汝等作弊，予將啓奏，先夾起你來審！」林大懼，跪白曰：「與中書不干，中書爲何作弊？」杜問曰：「爲何這一條簽獨短些？」林曰：「不知。」又問曰：「這一條是你的字麼？」曰：「不是。」曰：「別簽是你字麼？」曰：「是。」曰：「這必定有弊了。」索在旁知覺曰：「這容易，查昨日幾本，幾原簽，即可知是誰錯。」查少一原簽字問熊。熊忿然曰：「這樣難道是我作弊不成！」喧爭太甚。一學士覺羅麻沙出曰：「熊阿里哈達何苦如此？」某今夜在親戚家喪事守夜，過來的更早，在南坑上倒着，看見阿里哈達檢本，口內嚼了一簽子，如何賴得。熊語塞。索遂必欲啓奏，衆勸不止。索遂拉寶坻竟啓奏下吏部。那時北門爲冢宰（明珠）問口供，中堂都到。熊不出一語。曰：「公等如何落供，卽如何，某無可說。」索曰：「這本無大事，就是審賊犯，也畢

竟要他自己親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語。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吳三桂，耿精忠自己說出真情來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備至。因說：「罷了，就是如此罷了。」遂落職回……」

這件事在尋常人做來，倒還沒有什麼，不過聖人的門徒，做出嚼簽子的故事，的確有點不大名譽。清代理學家人格的破產，教後人很起了懷疑，未始不因於此。所以江藩的宋學淵源記記述清代的理學家，對於名公鉅卿，皆擯而不書，未始不因爲這些緣故罷！到了後來的理學家，反到爲虎作倀，成了皇帝護身符，程朱的本旨，豈是如此，理學的末路，糟到這樣，我真要爲理學叫屈了。

(3) 徐乾學起復熊賜履及傾害湯斌事 乾學字健菴，崑山人。順治間進士，是顧寧人的外甥，他們兄弟三人，均致通顯，尤以乾學，恭維了明珠，招權納賄，縱使豪奴，欺詐良民，告發乾學劣狀的奏疏，不下數十百件，現在故宮博物院已把這項奏疏漸次發表在文獻旬刊上。他的結黨的狀況，在此處已不必詳細的介紹；但他有兩件事載在榕村語錄上，是很可注意的。一件是起復熊賜履，一件是傾害湯斌，茲鈔之於下：

『……及予爲學士時，東海方開坊。一日皇上出門，東海來邀予曰：「明公平素來往否？」予

曰：「相認。」東海曰：「予今日欲同年兄一往謁，還有話說。」予曰：「予來時已往見過，今日又無事，不欲去。」又曰：「年兄爲人，不肖所深知者，假如有一毫不正之事，不正之言，如何敢拉年兄同行。明公亦是可與爲善之人，還有心胸，畢竟求同一往。」予被纏不已，遂同行。中途問渠何語。因告予曰：「熊老師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之之事，全是椒房（索額圖）害之，絕無影響。今日吾輩通是老師門生，非爲私情，乃是公議，求明公一言起之，所關不小，年兄其助我乎？」予默然。至明處相見，東海因言：自古進賢爲國，大臣之上功，果能進得一大賢，卽千古之美名歸之。因言熊如何人品，如何學問，天下蒼生，非此莫救。皇上已有要用的意思，求之之言，刺刺不休。明曰：「熊老師亦是小兒老師，學生豈不欲其復用；但向日嚼簽子事，是學生承問，也太做得醜些，上要用的話不確。」徐曰：「甚確。」明曰：「學生也曾提起。」上曰：「莫提起，提到這裏，連我還羞不過。」徐老師，汝是好人，報師恩自是厚道，他待你未必好。」徐曰：「待門生很好。」曰：「不確。他在我前說壞你了。」徐曰：「那有此，熊老師每常說門生學問第一。」曰：「何嘗不說你學問好；但別處不好奈何！」至此，徐亦色變而別。出門，東海見責曰：「年兄總一言不發，何也？」予曰：「予生平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皇上問，自當以實對，覺得向此老說何爲。」徐曰：「老師比別老師不同，此非私，乃公也。方纔

此老所說，上不欲用熊。又說熊在上前說壞小弟，皆沒影。而年兄始終不發一言，殊爲負老師矣。」
不怡而別……」

這一節可以見李光地的陰謀譎詐，高出徐乾學以上。高士奇也是以陰謀柔媚取悅於康熙帝的人物，所以他們在康熙朝都可以得寵的地方在此。

再論徐乾學傾害湯斌的故事。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五云：

『湯（斌）之入也，上意甚重之，北門（明珠）大治（余國治）知徐東海與之爲難。上意方向東海之學問，因以擋湯內召徐。湯爲大治同年，又外不甚露鋒稜如魏環溪，故二君欲借一用。徐恐出己上，遂必擠之下石，即發動海關事。值廷議，東海先語湯云：「今日之事，蘇州數百萬生靈，懸於老公祖，主此議者非老公祖而誰？」湯云：「某已進來，何力之有。」徐曰：「雖然，老公祖皇上倚重，又新在地方上來，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靈，敬以相屬。」及廷議，徐卻不言。梁真定（清標）天真爛熳，即發此論，湯老先生宜主此議。湯遂云：「與民爭利的事，豈有與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還好，若不得其人，四處巡攔，害民無窮。」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此一段言語，不過是閑論語。東海入南書房，即增飾此段話，入在皇上耳，謂湯言此事民甚勞苦。上召明公云：「湯某是

道學，如何亦兩口。彼進京時，予問以海關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說害民，備問他。」湯被傳問，在途，大治附耳云：「有人害年兄，到閣可只伸說，得其人便無害。」語。湯如其言以對。明公卽云：「我曉得了，是了，公請回。」時予正爲內閣學士也。明又將此語修飾回奏，上以爲是，大怒東海，着人切責云：「都是汝蘇州鄉紳，欲做買賣，恐添一關，於己不便，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不肯設此，而又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有此語。他說得其人便無害，元是天下何事不是不得其人便有害。」徐健菴絕不慌言：「湯如何賴得，九卿實共聞之，不然，可問梁清標；若此語是臣造的，難道他在蘇州出告示安慰百姓，上有鈐的印，也是臣造得不成？」上問云：「告示何在？」健菴云：「臣家就有。」上云：你明日帶告示來。明日果將此送進。上大怒云：「元來假道學是如此，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彼時滿洲詹事府是尹泰，上卽命尹泰傳旨責問：「你是大臣，你說海關不好，部議不准，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爭，我未必就把你問罪。古大臣不避斧鉞，爲民請命，何遽不言，卸過於我，而云：汝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將謂我無心愛民耶。」湯彼時還可解說，湯訥於言，只撻頭謝罪而已。此事由南書房轉奏，北門大治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治拏進，北門宛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懣不平，涕淚交流，一日一遍，去

安慰潛菴，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人將此獄歸之北門大治，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全無干。翁王不過見皇上怒，廷叱之，參劾之，以助上威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既死，健菴又激郭華野（琇）爲湯報仇，華野乃湯薦舉門生也。」

我很疑這件故事，與紅樓夢上王熙鳳之害死尤二姐很有關係。紅樓夢這部書，雖不必全有影射，但孤鴻斷影，曹雪芹必有所見聞，在無意之中，就把當日的實事，描寫出來了。

（4）高士奇傾害索額圖事 士奇字澹人，號江村，出身本來微賤，他流落北京，在報國寺廊下賣字餬口，被祖澤深看見他寫的一筆好字，就薦到索額圖某奴的門下作客。後來由某奴薦與索額圖，因索額圖纔得幸於康熙帝，後來祖澤深又拉攏士奇與徐乾學結合，士奇得了寵之後，反到把索額圖傾害了。祖澤深後爲荊南監司，與巡撫都御史張汧通同作弊，被參。康熙命于成龍查驗，成龍在康熙時比較清廉有氣節的人，徐乾學和高士奇因這件很受張汧的累，至此乃稍爲斂跡。汪景祺西征隨筆云：

『高文恪之與索額圖，固有德而無怨者也。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貲財，全家受禍，皆高爲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向不以禮，況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頤指氣使，以

奴視之。高方苦飢寒，得遇權相，拜跪惟謹，殊以爲榮。後高受知先帝，洊歷顯官，而見索猶長跪啓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尙稱爲高相公，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而思剗刃於其腹中。癸酉年高隨駕北上，時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往謁索於其家，索袒裸南向坐。高叩頭問起居，索切齒大罵，辱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顙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滿額。總兵曹曰瑋在京候補，先帝命索飲食之。高見索時，曹侍立簾外，思曰：「高知我見其情狀，必遷怒於我矣。」遽引疾歸。索有門客曰江黃者，紹興人，索之委任十倍於高。高雖攬重權，江視之蔑如也。其時儀同開府於高稱門生者，指不勝屈。而江僅以弟畜之，高不勝憤，遂欲殺江以除索，而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歸。方渡江，忽曰：「江老且至矣。」口中喃喃若與人晤對而謝過者。卽目不見一物，抵平湖不數日死。或曰：「大學士明旣與定計殺江以除索，然於高仇頗深，因餞而毒之。如俗之所謂慢藥者。」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珠傾索，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明王（鴻緒）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軒冕，烏知所謂禮義廉恥者哉？又有所謂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於張留侯、李鄴侯，葛衣芒屨，滿口皆喪身滅族之言，果得奇禍。江多髯偉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殺其軀者。徐委瑣齷齪，不類人形，而惟利是圖，又江所羞與同傳者。徐居碧山堂，士大夫相見必稱碧山先生，常

開筵召客以得與者爲榮。梁園小山未嘗不徵歌命酒於碧山堂上也。江徐橫時朝貴爭候其門，有因之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鶴沙蟲，君子與小人俱化，此時之墓木俱拱，數十年恩怨榮枯，不過留爲後人話柄而已。」

趙翼簪曝雜記卷二謂：「江村初入都，自肩襖被，進彰義門，後爲明相國家司閹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閹者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這與汪景祺所敘稍有不同處，但我看以汪說爲是，以上所述諸條不過舉一個大概。然就此數端，我們可以知道，滿洲大臣裏面有索額圖之黨，明珠之黨，漢族大臣裏面有李光地之黨，有徐乾學高士奇之黨，有熊賜履之黨。詞臣裏面，像潘耒，朱彝尊，尤侗，嚴蓀友等人，因人微言輕，就處處受人的排擠，當時高士奇，在南書房時，地位不過與朱竹垞不相上下，士奇便深銜竹垞，要趕他出去。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五云：

『一日（高）語予曰：「如此等輩，豈獨不可近君，連翰林如何做得。」予曰：「如此等人，做不得翰林，還有何人可做，次畊略輕些，至朱錫鬯還是老成人。」高往年還在監中考，爲吾所取，稱老師，是日便無復師生禮，忿然作色曰：「甚麼老成人，」將手鑪竟擲地大聲曰：「似此等還說他

是老成人，我斷不饒他。」……」

不久朱錫鬯便爲徐乾學劾他：「毫無所知，動不得筆，而人又輕躁，遂被斥去。」潘次暉也被徐乾學所參。這些掌故全載在李光地的榕村語錄續編本朝時事卷內，這本書一直沒有刻本，所以他們的公案，也沒人發覺。到清光緒季年，繆荃孫把他這本書節鈔在雲自在堪筆記裏面，掠爲己有。現在江安傅氏纔爲他刊刻，他們的公案可以明白於天下了。我們再述康熙時索額圖明珠兩黨：索額圖既爲高士奇所傾害，明珠也被僉都御史郭琇所劾，罷任候用。未幾郭琇又劾高士奇與王鴻緒表裏爲奸，植黨招搖，俱著休致回籍。在順治康熙間的御史要算是張烜和郭琇。張烜他參陳名夏，可是不幸他自己坐誣論死，郭琇他參明珠背公營私，上諭吏部有云：「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惟知互相結引，徇私傾陷，凡遇會議一二倡率於前，衆議附和於後，一意詭隨，廷議如此，國是何憑！」清史稿列傳五十六明珠本傳）不久，明珠就改爲內大臣，不復柄用，而這一般江南名士黨局餘裔，也都老死首丘，明季結黨的風氣，經康熙雍正兩朝的嚴禁，可說是告一段落。下面我們要研究的就是社。

七 復社始末上

結社這件事，本來是明代士大夫以文會友很清雅的故事。他們一方面學習時藝，來揣摩風氣；一方面來擇選很知己的朋友。所以侯方域壯悔堂集卷三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說：「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杜登春社事始末記：「楊維斗先生設帳于滄浪亭內，爲其子焯擇友會文。」求友的故事，見於記載很多。所以明季幾社的成立，他們只師生通家子弟，在一塊結合，外人是不能參加的。後來纔門戶開放，「社集之日，動輒千人。」不意一件讀書人的雅集，卻變成了一種社會上政治的運動。

那時候對於社事的集合，有「社盟」「社局」「坊社」等等的名稱。坊字的意義，不容說，就是書鋪，可見結社與書鋪很有關係。說起書坊來，到是很有趣的故事。原來他們要揣摩風氣，必須要熟讀八股文章，因此那應時的制藝必須要刻版，這種士子的八股文章，卻與書坊店裏作了一披好買賣，而一般操選政的作家，就成了書坊店裏的臺柱子。因此一般窮書生，也可以拿來作生活維持費。王

應奎柳南續筆卷二說：「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呂留良）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嘗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可云不脛而走矣。」但是他們並不讀什麼書，作什麼實學，每天不過高頭講章，批批八股，黃宗羲罵他爲：「時文批尾之世界」是毫不爲過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明代萬曆末年江西的艾南英陳際泰等人的八股選本風行一時，蘇杭的書坊店裏，可以由上江把他們請到蘇杭去選文章，可見評選文章之風，極一時之盛。那時候書坊店裏，應時的出版品，約有三種：第一是制藝，第二是時務書籍，第三是小說。制藝這一類之書，有社稿房書課藝，文選會議等等名稱，在萬曆天啓間操選政的名家，就是艾南英，陳際泰等一流人物；時務書籍代表的人物，是許重熙，馮夢龍等一流人物；小說的作家，就是蘭陵笑笑生，即空觀主人，馮夢龍等一流人物；他們遺留下的作品，除去制藝，我們另當別論外，在以下的兩類，我們可以知道的，時務書籍一類，就是許重熙的嘉靖以來五朝注略，金日升的頌天臚筆，佚名撰的玉鏡新譚，聖朝清政，馮夢龍的甲申紀事，中興偉略；小說書一類，就如馮夢龍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二拍（拍案驚奇，續拍案驚奇）。雖然代遠年湮，這一般當時的聞人，埋沒了不少；但是由現在遺留下的書裏面，我們還可以看見他們的痕跡。

譬如說罷，在崇禎的初年，剛除了逆黨，於是那一般書坊店裏老板就趕快來做罵魏忠賢的書。就有玉鏡新譚，皇明忠烈傳，頌天臚筆，這一類應時的作品出版。在天啓年間，遼事日急了，人人都要明白東夷的情形，所以就有程開祜的籌遼碩畫，陸雲龍撰遼海丹忠錄等書出版，我們可以拿玉鏡新譚作一個例子。他的封面上有一段告白很有趣，可以鈔下來，看一看：

逆璫勢灼滔天。忤之者立遭慘死。褫奪。媚之者忽致富貴。

今蒙

優卹。冀勁節剛。賜享千秋之美譽。附之者雖叨富貴寵榮。適戮尸籍產。猶晨露夕暉。遺萬禩之穢名。其得失如何。同塗共轍。誠然話柄。和璧殷譽。輯以世箴云爾。

大來堂

我們由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書坊店裏，作投機事業的情形了。

在這個烏煙瘴氣當中，艾老先生正在那裏操選政，最得意的時候，忽然來了張溥、張采和周鍾

等人，他們另打旗鼓，來奪他們的旗幟，把艾老先生的維舟再不敢東下，同時張溥等聚集了成千成萬的人，成了一個社會的運動，並且參與政治，把當朝的宰相薛國觀趕掉了。一般的人，都目復社作「小東林」，這是怎樣可以叫人驚訝的事情。所以我們在未說復社以前，不可不先述兩張的歷史。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云：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人。父太學生翊之，翊之兄輔之，以進士由兵垣歷官大司空，翊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爲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於翊之，溥灑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場蒲屨兒（指庶出的意思）何能爲。」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而曉，因病軀，時三吳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之省，獨與張采訂交。』

『采字受先，號南郭，以善戴氏學，有聲黌序。溥延爲館賓，讀書七錄齋。時婁文卑、靡，兩人有志振起之。溥矯枉過正，取法樊宗師，劉知幾，歲試乃躋。聞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之，三人一見，相得甚懽，辯難五晝夜，訂盟乃別。溥歸盡棄所學，更尙經史，試乃冠軍。溥矜重名，采尙節概，言論丰采，目光射人，相砥濯自礪。時魏璫敗，鹿城顧秉謙致仕家居，方秉鐸於婁中。溥與采率諸士驅之，檄文

膾炙人口。郡中五十餘人，斂貲爲誌鐫石，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兩人矣。」

天如的文集名七錄齋集，因爲他幼年讀書，每篇須鈔錄七遍，這可以見他勤苦的情形了。兩張的交情本來很深。張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張天如文云：

『憶弟友兄，始庚申歲，旣癸亥，延我七錄齋。逮丁卯，凡五年中，兄每辰出，夜分或遇子刻入，兩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時設疑難，必爾我暢懷歸於至理。金母從窗戶窺聽，每稱二子不但勤學，乃從未見情容，嬉色。嗟夫！兩人而同乳，亦可不媿友于也。……』

天如有刻苦自勵的精神，並且有兼容並包的態度，知畏堂集卷二西銘近集序：

『張子日高起，夜分後息，起卽坐書舍，擁卷丹黃，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暇給。又急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詢，無用剝啄，輒通坐恆滿。四方尺牘且咄咄酬應，而張子俯仰浩落，未嘗踰時廢翰墨。今閱茲集者，第見儀觀都美，愼靜爾雅，復按節度字，周情孔思，欣此良工敦誥，抑知皆得諸廣坐對客，談諧繁溷之下者乎。……』

天如是一個幹練人材，很有作領袖之修養，所以能把幾個讀書人辦的應社，變成了社會上羣衆的運動。

兩張的歷史既然明白了，如今我們再述應社和復社結合的變遷，應社的成立，時間是很早的，在萬曆末年，蘇州的拂水山房社，就是應社的起源。計東上吳祭酒書云：『應社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之本于小築，各二十餘年矣。』李延是南吳舊話錄云：

『范文若，字更生，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舉於鄉，美姿容，以風流自命，與常熟許士素，孫朝肅，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五人爲拂水山房社。而蹴蹴文壇，必推更生爲最。一日東南風大起，拂水岩如萬斛珍珠，從空拋撒，更生把酒揖之曰：始覺吾文負於此。』

近人朱倭撰明季南應社考說：『拂水山房倡於瞿純仁，其同社皆常熟人，繼之者許士素，孫朝肅亦常熟人。承其遺風，乃與上海范文若，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仍用舊址，相結爲社。此二十餘年中，拂水文社之見於記載者僅此九人。應社始於天啓甲子（四年一六二四）亦倡於常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楊彝字子常，常熟人，縣學生。附錄：「張受先（采）云：甲子冬與天如同過唐市，問子常廬，麟士（顧夢麟）館焉。遂定應社約，敘年子常居長。」』

天如少年時代，文學的藝術，本不見高明，他取法樊宗師劉知幾，那一類古典的文學，所以歲試

乃大蹟，而他所交的朋友，也不過邑中的大戶沈氏、吳氏罷了。（復社紀事。）後來看見金沙、周介生的文章，妙絕一時，他所以願意棄其所學，來學周介生的方法。歲試竟考取了第一名，於是天如與周介生合作，請匡社諸名士也加入了應社。復社紀略卷一云：

『先是，貴池 吳次尾、應箕，與吳門 徐君和、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周鍾）主盟。介生乃益擴而廣之，上江之徽寧池太，及淮陽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焉，因名其社爲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於是應社之名聞于天下。』

在明代，安徽一帶名作上江，江蘇一帶名作下江。那時安徽的南社也加入應社。洪亮吉、嘉慶、涇縣志文苑、萬應隆傳云：

『應隆字道吉，號三峯，少敏慧，負捷才，補諸生，與貴池 吳應箕，宣城 沈壽民，蕪湖 沈士柱等倡文會名南社，而與壽民交尤篤。張溥等倡復社于吳門，復率同邑諸才士，往會于虎丘，激揚聲氣，爲朝貴所忌。』

又鄭廷佐傳云：

「廷佐字明時，汝敏字魯若，兄弟六人，皆有才而能文，在南社中。」

萬應隆，沈壽民，吳應箕，沈士柱，皆是加入應社，因此可以知道南社是有一部分人與應社合作的。當應社初立，僅十有一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文社始于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耒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梅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

又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云：

「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

那時應社的勢力，逐漸的擴大，同社吳昌時以爲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想把應社推廣起來，於是就有廣應社之作。應字的意義。七錄齋集卷一廣應社序云：

「應之爲名，有龍德焉。予昔嘗一序其說，多恢愕怪宕，不可究詰之辭，及今視之，益雜而弗舉矣。乃來之，彥林，欲因其社而推大之，訖於四海，則將引意以自明，夫亦言其可信者焉。何則人之變？」

化，其理在天，窮達屈伸，移於朝暮，得則有吉祥之容，失則有沲若之涕，任性之未能，而寓言乎生命，此則其不可信者也。若夫立德以善有，弘衷而考義，擇然後履，履然後安，無競乎人稱，而秉恒以一，此則其可信者也。」

因此，應社的範圍既廣，就有南北之分。七錄齋集劉伯宗稿序：

『予之務察於應社也，與道吉，伯宗，眉生，崑銅，論之詳矣。寧儉於人之數，而無受其多；寧舒其時以得其所以爲人，而無傷於亟。故閱時而其人至焉，又閱時而其人至焉。大約江以南自予與介生，受先，維斗之數人者，無乎不良也；江以北自道吉，伯宗，眉生，崑銅之數人來者，無乎不良也。苟其一辭之可，凡數人者，無不與聞焉。以文及實，以實及文，皆以爲可……』

計東上吳祭酒書一說：「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張受先，西銘，介生，維斗。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婁東有應社十子，吳郡有應社十三子。」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一 沈耕巖墓誌云：「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到了後來，張溥，獲雋入都，在京師也有應社的結合，七錄齋集江北應社序云：

『予與楊子伯祥（廷麟）在京師，時從遊者數十輩，皆北方豪傑之士，何子印尼，時爲學官，

悉禮而致之，便朝夕治文字，譚經書，今年夏遇印尼於吳門，出選文一帙，皆燕中諸子之作，題曰正告，倪鴻寶先生之所命名也。……既而合故城萊陽商丘爲一家，兼以應社爲名，取余始事數子之約，期於白首，兄弟無閒言。』

由上看來，應社可分爲三部分，第一是江南的應社，第二是江北的應社，第三是河北的應社；因爲那些士大夫們，居官北方，差不多都有社集，象幾社中人物，在北京有燕臺十子社，艾南英在北京有都門廣因社，天如之在北京結應社，也和他們兩家是一樣的情形，要是僅分南北二類，還不能包括應社的完備。

以上我們把應社的大概情形敘述完了，但是後來應社改爲復社；這復社之興起與應社有什麼關係呢？原來應社與復社的感情，本不很好。計東上吳祭酒書云：

『……始庚午之冬，因魚山熊先生（熊開元）自崇明調宰我邑，最喜社事，孫孟樸乃與我婦翁（吳翀）及呂石香輩數人，始創復社，頗爲吳門楊維斗先生所不快。孟樸常懷刺謁楊先生，再往不得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蓋應社之興久矣，時天下但知應社耳。』

楊鳳苞秋室集卷五云：

「翻（吳翻）與同志孫淳等四人，叛爲復社，義取剝窮而復也。太倉張溥舉應社以合之。」我們可以知道孫淳和吳翻創立是復社，不是應社。但後來張天如竟把應社合併到復社裏，王應奎柳南隨筆：「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爲一。」後來復社的興起，很得了這兩位的力量。這樣化干戈爲玉帛，能够海涵一切，使天下人皆爲我效奔走，我們不能不佩服張天如氣度的偉大。

復次我們再說與復社反對的社盟。原來在應社未成立以前，江西的社事，本來很發達了，就是杭州讀書社也很有名氣。我們讀陳際泰的太乙山房集，艾南英的天慵子集，裏面記載江西和蜀中的社事很多，他們最有名的社集，就是豫章大社。在這兩部文集裏面所敘的社事，我們擇要鈔錄於下。太乙山房集卷四所記載：

豫章大社 序：「先是諸生中，有合豫章大社者，而嚴其人。每郡推一人爲祭酒，有佚入者比於盜地以下敵之罰，既而公所選士，大都皆其推爲祭酒之人，所脫者十纔二三耳。」

君子亭合社 序：「嘗憶南州大社，主是役者，爲雲將美叔仲延諸君子，而予與羅中魯葉當時與焉。爾時麻城李百藥以其文入社，稱兄弟，實非其手足也。百藥尊公孟白老師愛好人倫，實盡

物宗之責，社中兄弟半出其門，而社文傳播特甚。越十數年，而瑞芝亭社出，主是役者，爲茂先門人，蕪城沈崑桐，其尊人爲青嶼先生，有孟白老師之風焉。社文爲海內傳誦亦如之。自後寥寥未有是。今君子亭社，則西蜀雷榮子陳石柱二子之爲之也。」

豫章九子社

序：『楊伯祥爲主。』

新城大社

序：『憶予庚子之役，旣罷歸，因邀全人爲社，二十年間，先後颺去，如丘毛伯，游太

來，曾隆吉，祝文柔，管龍躍，傅旋履；而其最親厚者，爲艾千子，章大力，羅文止，獨二三人，與僕騎玉牛耳。』

禹門社

序：『介臨金之間，是諸雋之所走集也。其得名張順齋先生實爲之先后，社于是者

翔去，不可枚舉。中輟者數年，近乃復有……』按此社爲張天如周介生與陳大士所合辦。

合社

爲張采知臨川時所立。

偶社

序：『肝中之士畢集羊城，其中尤妙之材，是爲同人。臨場有作，作輒佳彙而刻之，題曰

偶社，明非有所主也。』按天儺子集亦有偶然序。

芳社

黎乾生所主辦。

在艾南英天慵子集裏面有：

平遠堂社 有社藝序。

瀛社 序：『吳山、佺煥璧、黃良治、虞鼎、喻立生、中立、陳子蜚、英、龔叔升、俊選、聶惠甫、僑、六君子。新舊課文若干首。』

國門廣因社 序：『戊辰、春、會稽、徐介眉、蘄州、顧重光、宜興、吳聖鄰，糾合四方之士，聚輦下者，訂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爲禮部第一人。庚午年未之試，舊社皆集，乃復尋盟而增之爲廣因社，於是中禮部試者復六人，而予罷歸，過濟上，則聖鄰行館寓也。聖鄰方裒集社稿，以紀盛事，而屬於予。』

陳艾兩部文集中，所記載的社事，在江西的社盟品類，有這樣的多，但他們的首領，不過是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等四人。他們這一派，我們可以叫作豫章派。在萬曆末年，和天啓初年，他們很可以創造一時風氣的。他們兩派接觸的機會，是張天如得中之後，來到北京，彼此見面的時候很多，所以在張天如的江北應社裏面題到楊伯祥，豫章九子社裏面也有楊伯祥，因知此艾千子立的國門廣因社，他們兩派在北京的時候是合作的。後來到艾千子、三吳選文，就與張天如復社起了衝

突；雖然，後來張采作了臨川知縣，融和兩派的感情，但有一部分江西的文社響應了復社，可是艾千子終始不與復社合作，因為他們兩派立場不同，主張也不一樣。艾千子的主張，是「其書一主曾歐程朱，其法一宗成弘。」而張天如卻是要「文必六經，詩必六朝的。」換句話說：艾千子是開今派，張天如是復古派。現在我們把他們兩家的主張稍微擇要鈔錄於下：

艾千子的主張，是：「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爲文者。」（房書刪定序）天傭子集卷五與周介生論文書云：

『夫文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卽間降而出入於韓歐蘇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因秦漢之嫡子嫡孫也。今也不然，爲辭章者不知古文爲何物，而獵弇州于鱗之古以爲足，不知此非古也；六朝之浮豔，而割裂補綴飾之以史漢之皮毛者也。爲制藝者，不知古文爲何物，而襲大士大力輕俊詭異之語以爲足，不知此非古也。晉魏之幽渺纖巧，當世以爲清譚爲佻慧者也；最陋則造爲一種似子非子，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沾沾然以爲真大士大力矣。弟舊歲於陳興公稿序，稍一言之，而同氣者頗相怪責，不知弟於此道，淺深甘苦備嘗之矣。夫文之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俊也，巧也，排也，此宜

有識者所共知矣：無怪兄之憫然憂之，而有哀集先輩大家之舉也。」

天傭子集與周介生張天如辯論文體的文章很多，此不過舉其大概。張天如論文之旨，卻沒有艾千子這樣的顯明。他常說：「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蓋其至也。」七錄齋集卷二房稿表經序云：

『今則經文忽彰，而聖人作焉，治氣之感，證効不惑，顧念向時之言有其預者，未嘗不相對以怡也。然而人之爲言，命意在彼，則盡于彼，命意在此，則盡于此。以今日而言經，所謂在此者也。言經而底于爲人，所謂盡此者也。試以經質之于人，觀乎字形，不離三才，則知其無邪矣。觀其擬言，不踰五倫，則知其近人矣。故予嘗謂使今日有武健之子，日取五經，摹而書之，左右周接，無非鉅人之名，大雅之字，趨而之善也疾焉。矧相漸于意，尤有神明者哉。然則爲之若是其易，而人與文俱難之何也？蓋其始病于作法之異，而其既危于疑人之甚，則言有不能入者焉。抑知善無不可爲，經無不可學，即人之好名者，而實其所用，慕君子而從之，初而事其話言，久之而其行是焉，又久之而性情無非是焉。若夫學者之通經，繇奇以反平，因辭以達本，其道亦猶是也……』

自從李東陽王弼前七子，後七子等人主張復古，弄成似子非子，非漢晉非魏晉，一般似通不

通的文章出來，真有改革的必要；所以艾千子主張由歐曾以取法成弘，把文章弄得清清楚楚的，不用支離的文句，和瑣碎的典故，他的主張本來很不錯的。但張天如他卻主張祖述六經，來矯正時弊。他這個主張，我們到很懷疑，所謂尊經復古者，是不是學聖人的品行，要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要效法六經的字句，拿他這種主張，與王李七子文必漢魏，詩必六朝，比較，卻是同樣不識時代性，同一樣的失敗。所以我們一翻開七錄齋集裏面的標題，像房稿霜蠶，房稿香却敵，房稿文始經，這種摹倣六經讖緯，似通不通的文字，比王李七子還要可笑。而天如的手筆，在摹倣古文當中，挾雜些八股的文調，到還不如艾千子的文章，清通可喜呢！但天如很有政治的手腕，他有周鍾張采爲他社裏選文章；有孫淳吳鬪爲他社裏效奔走。所以「陳臥子在七錄齋中，與艾千子肆論朱王異同，以手批千子頰。」（據社事始末）而艾千子的好朋友陳際泰，也作依附之論。他說：「吾友千子憂其然，因以成弘之所爲爲救，而矯枉既過，謗書盈篋，嗟夫！使不善用之，數傳之後而失其本，卽成弘之所流，獨無弊也哉。」（太乙山房集）因此東南的社集，全歸到復社，社局的勢力，遂成了張家的天下！

那時應社的課藝是宗尙六經，所以就有五經應社之選，七錄齋集卷二五經微文序云：

『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託，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雲子則主易；振振然白其意於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

平心而論，天如的文章，雖然不脫八股習氣，但他整理舊籍，如所鈔漢魏百三家集等類，也有相當的偉蹟。

應社和復社合併的情形，我們已經明白了，復次：我們再討論復社的組織，大概是在一個大社之內，有許多小組組織，對外是用復社的名義，對內是各不相謀的。那種拉攏各社，會集成復社的功夫，孫淳吳翀之力爲多。陳去病五石脂云：

『孟樸名淳，吾邑之田義村人也，（其地今隸震澤）地與吳淞月港相近，晚歲居南潯，白梅館居，詩集名因之，少爲嘉興府學生，復社之盛，先生實爲媒介，故當時有孫舖司之目。又時有爲孟樸口號云：「案頭一部漢書，袖中一封薦書，逢人便說我哩天如天如。」其風趣可想矣。』

又張鑑冬青館甲集卷六書復社姓氏錄後云：

『扶九（吳翀）居吳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孟樸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實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樸之行，閱歲羣彥胥會於吳郡……』

那時復社的集會各社全到復社裏來，是一件很偉大的舉動，記載這件事情共有數家，一、陸世儀復社紀略；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三、佚名撰研堂見聞雜記；四、王應奎柳南隨筆，陸朱兩家較有異同，其他兩家是傳鈔陸朱之說而來的。現在把陸朱兩家的記載鈔在下面：

（一）陸氏之說，復社紀略卷一云：

『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爲一。』

（二）朱氏之說，靜志居詩話云：

『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于時孟樸里居，結吳翮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席社，昆陽社，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于復社。』

張溥七錄齋集裏面有洛如社，雲簪社的序，這些社集，雖不能個個的考出，但他們招集的力量是很大的。同時天如又把這幾個社以區域的分類，來徵各處的文章，以通各處的聲氣，七錄齋集國

表四選序云：

『國表之文凡更四選，其名不易，雖從天下之觀，以志舊日，示不忘也。往者始事之秋，予與介生約四方之文，各本其師，因其處。於是介生維斗子常麟士勒卣主吳；彥林來之主越；眉生崑銅伯宗次尾道吉主江以上；大士文止士業大力主豫章；曦侯主楚；昌基道掌仲謀主閩；澄風主齊魯之間；凡以文至者，必書生平，先鄉黨而次州邑，考聲覈實，不謀而同，是以人無濫登，文無妄予。』

這是復社組織的方法，至於復社的規程，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云：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旣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有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于是，哀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爲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是役也，孟樸渡淮，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于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亟；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

復社大會，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尹山大會，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云：「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爲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致邑館……于是爲尹山大會，茗雪之間，名彥畢至……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置者。」

第二次是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金陵大會。復社紀略卷二云：

「崇禎庚午鄉試，諸賓興者咸集，天如又爲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爲江西姜居之曰廣，榜發，解元楊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

第三次崇禎五年（一六三二）虎丘大會。這時張天如已會了進士，假歸太倉，在虎丘開復社大會，刊國表社集行世。復社紀略卷二云：

「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丘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

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觀者甚衆，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復社的同志，本來僅集合太倉等七郡的人物，後來由江南而蔓延到江西，福建，湖廣，貴州，山東，山西各省，吳應箕編復社姓氏錄二卷，其孫吳銘道又爲續錄一卷，著錄復社同志共二千二十五人，那真可以說是秀才造反了。

那時候復社的同志，像張溥，吳偉業，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等，都成了進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來拉攏復社，培植自己的勢力，凡是士子，只要進了復社，就有得中的希望。那時一般讀書人呼天如爲西張先生，呼張采爲南張先生，誰也不敢稱呼他們的名字；而兩張拉攏士子，圖得科名，又有公薦，獨薦，轉薦等等的名詞，這與後來通關節，及科場獄之發生，很有關係，我們不可以不注意。復社紀略卷二云：

「溥亦以闕里自擬，於是好事者，指社長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伸爲四配。門人呂雲孚，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羣，許國杰，穆雲桂，胡周鼎爲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搏，張連，張泳，張哲，先張，濬，張應京爲十常侍。又有依託門下，效奔走展財幣者。若黃，若曹，若

陳若趙若陶，則名五狗。而溥獎進門弟子，亦不遺餘力，每歲科兩試，有公薦，有轉薦，有獨薦。公薦者，某案領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觀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則門弟子某公弟，甚至某公孫，某公壻，某公甥，更次則門牆某等，天如門下某等，受先門下某等。轉薦者，江西學臣王應華視薦牘發時，案撫州三學，諸生鼓譟，生員黜革，應華奪官，後學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別徑，開通京師權要，專札投遞。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學憲，牒文直書，「仰甘學潤當堂開拆」，一名爲公文，實私牘也。獨薦者，公薦雖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專劄，爾時有張浦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劄投進，督學倪元珙發三卷於蘇松道馮元颺，達社長另換謄進，仍列高等，是大妨賢路。局外者復值歲科試，輒私擬等第名數，及榜發，十不失一，所以爲弟子者，爭欲入社；爲父兄者，亦莫不樂其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儁有文，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竄于其中矣。」

復社既然握了極大的黜陟之權，所以一般士子士大夫都想與復社聯合，而那一般够不上與復社聯合的，就竭力造謠與復社作對；然而復社的領袖，又借著民衆的勢力，來把持政權，膨脹社中的勢力。因此復社本來是士子讀書會文的地方，後來反變成勢利的場所。

像吳偉業得中會元，本來是受時相的提拔，後來就遭了薛國觀的忌。幸虧崇禎帝看中了吳偉業的卷子，所以未有鬧出科場案出來。但復社的領袖就懷恨在心。所以張天如受意吳偉業參溫體仁結黨援私；偉業因立朝未久，不敢妄動，只有上疏改參蔡奕琛了。那時復社的旗幟漸漸的鮮明，凡是東林的後裔都援助復社，凡是逆黨的餘孽，都與復社作對；而那一般與復社有私憾的人，或爲社局所擯的人，都趁火打劫，與復社爲難了。所以求入復社而不得的陸文聲，及與張天如作對的周之夔，都起來告許復社。據杜登春社事始末謂：「時辛未同年周之夔者心竊非之，又以國表二集，選渠文一首，誣無褒稱，遂奮身作難，以復社爲欲傾覆宗社，以天如爲名號比天。」又有奸人託名徐懷丹作討復社十大罪的檄文，來彰復社的罪惡。楊彝復社事實云：

『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伸復社十大罪者。大約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

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琛，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

由以上諸事看來，復社那樣的黨同伐異，實在有取咎之點。所以像溫體仁的兄弟，溫育仁，作了一部綠牡丹傳奇，描寫選家選文的醜態，雖然言過其實，然而也有相當的理由。艾千子與聞子別書說：

『若僅使衣曲體，與後生附會，今日介生，明日天如，言萊陽則曰東海大觀，言豫章則曰吾社兄弟。其父即剽竊真腐，置之不問。如此則天何貴生子將，如此則同聲倡和，與市井狎邪，屠沽博塞，其道雖殊，其心則一……』

這封信寫的很痛快。各處反對復社的空氣，既然這樣的惡劣，於是天如他不能不由社會上的活躍而變為積極的政治運動。那時當國的是薛國觀。因此他不能不窺伺國觀的破綻，來倒薛國觀的政權，重組織東林黨的內閣。於是就用了吳昌時的陰謀，打倒了薛國觀的內閣，周延儒就借著與復社拉攏的關係，從新上臺。杜登春社事始末云：

『門下或有私附楊薛以圖顯榮者，以故西銘得以逍遙林下，批讀經史爲千秋事業，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尙以黨魁目之也。彼爲小人者，卽無吹求之端，而竊竊自疑，非起復宜與終是孤立之局。與錢蒙叟項水心徐勿齋馬素修諸先生謀于虎丘之石佛寺，遣幹僕王成貽七札入選君吳來之先生昌時邸中。吳先生者，一時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輦轂番子，密布內外，線索難通。王成以七札熟讀，一字一割，雜敗絮中，至吳帳爲蓑衣袂法，得達羣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詳確，時是辛巳二月事。』

崇禎果然得到辭國觀的賊證，就把國觀治之罪，在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就入了內閣。延儒未入閣以前，天如就替他開了一個名單，像黃道周、劉宗周等人，都列在單內，儘先任用。所以周廷儒入了閣，把一般東林黨人，都委任了重要地位，但是延儒本來是與東林反對的，他現在爲東林所擁護，他不能用東林黨人。逆黨的名流阮大鍼，想找一個位置就被他拒絕了。大鍼既不能如願，就推薦馬士英，延儒終於聽大鍼的話把馬士英作了鳳陽總督。後來擁立福王，起復阮大鍼，重定逆案，殺戮復社名流，都中了這小小的因果。時事的循環，怎知道有這樣的快！可惜延儒四月裏入了閣，張天如五月裏就暴病身亡，以後的事，不及見了。

那時天如雖死，但南郭先生張采尙健在，他立刻上疏爲復社洗刷。張采知畏堂集卷一具陳復社本末疏云：

『……惟復社一案，責張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謹齋沐陳之。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時文，凡選鄉會中式文曰程墨，選進士文曰房書，選舉人文曰行卷，其諸生徵文彙選曰社藁，從來已久。若復社之起，臣已爲縣令，不預書生事。張溥時猶未第，故選社文，以臣向同硯席，代臣作序。及溥成進士，而臣已病廢矣。豈意臣里中奸人，私隙中傷，有復社一款，下蘇松提學。前學臣倪元珙曾經具覆，奉旨再察。既學臣元璋以丁憂去，張鳳翮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方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竊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于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臣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搆。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卽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

八 復社始末下

復社的勢力，既然這樣的膨脹，那時逆黨的人物，也想立社與復社對抗，因此阮大鍼就在安徽懷寧地方，立了中江社，大鍼本來有號召的能力，他的同社人物，雖不可考；但復社的名流，錢秉鐙曾入過中江社，南海鄺露也稱過他的門人，就像爲大鍼詠懷堂集作序的葉燠，也是很有文彩。除此數人之外，我們知道的還有潘次魯方聖羽等人。

當錢秉鐙少年時代，他本入了里中的石屋寺文社。秉鐙少子攜錄撰田間府君年譜云：

『戊辰里中石屋寺爲文社，是年，府君始得與，每文出，中表方聖羽見之曰：「石屋一會，獨有此子，同社大怪之，已而名漸起。姑父方伯穎每會覽府君文，必嘆爲不及。」』

後來纔入中江文社，年譜云：

『壬申，是年邑中舉中江文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府君與三伯與焉。首事潘次魯，方聖羽也。次魯爲閩黨汝楨子，聖羽則皖髯門人。皖髯陰爲之主，以薦達名流，餌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門。皖髯』

與余家世戚門內人素不以爲嫌，府君鄉居，不習朝事，漫從之入社。會方密之吳遊回，與府君言曰：「吳下事與朝局表裏，先辨氣類，凡閹黨皆在所擯，吾輩奈何奉爲盟主？曷早自異諸？因私結教子課文，其中江社期，謝不至，諸公既知有異心矣。其冬，彙試生童俱集，大鉞治酒，大會社友，獨不報君。既試畢，府君往謁其封君柱麓翁。」翁語曰：「子爲誰薦？」府君曰：「未有。」翁曰：「小兒云：方仁植（孔炤）已薦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府君第一，大鉞居爲己功。」秉鐙因方密之勸解，纔脫離了中江社的關係，鄺露也叛了本師，與復社一流人物接近，阮大鉞本來想借着結社的勢力，來大肆活動；但是終究敵不過復社的勢力，社裏的同志紛紛四散，中江社就無形的解散了。

那時崇禎初立，剛定了逆案，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想望著承平。我們上章所說的東林被難楊左諸君子的孤兒，全都長大了，都到金陵來趕考，還有那些豪華的公子，和復社的名士，都聚集在金陵。當時的形勢，表面上，似乎看著承平，但清兵刻刻的直入，流寇蹂躪了上江，內地鬧的已經不像樣子，那一般紳士都跑到金陵來避難，阮大鉞也來到金陵。錢秉鐙皖髯事實云：

『會流寇逼皖，大鉞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惟

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

我們述說東林被難的諸孤罷，當逆案初定的時候，周順昌的兒子周茂蘭，兩次刺血，手書貼黃，申訴他父親的冤枉。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濂，也刺血上疏。黃尊素的長子黃宗義，當對簿的時候，拿錐刺逆賊許顯純的股，這是何等激昂慷慨呀！當崇禎九年，他們都到金陵來應南京的鄉試，於是魏學濂發起在桃葉渡大會同難兄弟。那時如臯冒襄，最有才華，少年好事，他很替東林的後裔幫忙。桃葉渡的大會，辟疆是提倡最有力的人物。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節公次子子一，餘姚黃忠端公子太沖，以拔貢入南雍，同上下江諸孤，以廕送監者，俱應南京鄉試。當日忤璫諸公，雖死于逆閹，同朝各有陰仇嫁禍者，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崇禎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書者至再，痛述父兄死于懷寧，懷寧始以城旦入欽定逆案，時流氛逼上江，安池諸紳皆流寓南京。懷寧在南京，氣燄反熾，子一癸癸就試。傳懷寧欲甘心焉。金壇孝廉楊儼公（良弼）賃寓馬祿街，以身翼子一避之。適余與陳則梁，張公亮，呂霖生，劉漁仲四兄，刑牲顧樓。則梁兄曰：「吾郡魏子一，忠孝才人，吾弟不可不交。」覓儼公寓以余言實之。蓋當日送逮吳門，則梁兄身在魏周兩公間。余卽往訪儼公，出箕踞傲睨。詢客何爲者？余曰：訪兄及子一，吾兄

則梁氏命之來。儼公一笑，呼子一與相見，秀挺清奇，不可一世。余曰：兩兄何爲者？舊京何地，應制何事，懷寧卽剛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轉逼，櫻之立却者。我因四方同人至，止出百餘金，質桃葉河房前後廳堂樓閣凡九，食客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來余寓，懷寧斂迹矣。兩君是余言，猶鰓慮懷寧挾恨中傷，場畢果亡恙也。於是子一於觀濤日，大會江陰繆文貞公子采室，李忠毅公子遜之，吳縣周忠介公子子潔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顧裕愍公子玉書，吳江周忠毅公子長生，餘姚黃忠端公子太冲，無錫高忠憲公孫永清，于余寓館。則梁兄方密之與余各長歌紀事。子一出血書孝經共展觀。後做大癡畫于扇，題贈云：「辟疆遠性風疏，逸情雲上，吾黨中喜而不比，曜而思正者，不得儔儷之矣。丙子觀濤日，不肖學濂欲大會同難兄弟，同人皆咋舌，無所稅止。辟疆置酒高會，價陰寓亭，因卽席畫層峯數朵贈之。謂我澹峻，有類于其人也。」繆采室以詩贈，且述洪武初，我兩家始祖爲兄弟，各變姓；一隱江陰，一隱如皋，今得相見，合是兄弟一拜聯譜，餘有以詩贈者，以書法留數行者。則梁兄長歌結句云：「只恨楊家少一人，」蓋應山楊忠烈公子在楚不至。一時同人咸大快。余此舉而懷寧飲恨矣。」

我們題到冒襄，他是明季四公子之一。那明季四公子，就是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

歸德侯朝宗方域，和如皋冒辟疆襄，他們都是名父之子。又都早年入了復社。侯朝宗的風流倜儻，侑酒必以紅裙，冒辟疆的慷慨好士，桃葉渡大會諸孤，是何等的豪舉。侯朝宗和李香君戀愛故事，冒辟疆和董小宛旖旎風光，孔尚任譜的桃花扇，和冒辟疆自作的影梅庵憶語，這都是極膾炙人口的文章，早傳遍於人寰了。還有那沈壽民，沈士柱，吳偉業，一般的名士，和李香君，卞玉京，顧橫波，一般北里的佳人，那是怎樣的足使人流戀呢！余懷板橋雜記上說得好：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鼙擊鼓，踢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那時阮圓海正潛居金陵，也立了一個社名叫羣社，想藉此招攬名流（見詠懷堂外集甲部卷二），但士子們都裹足不前；只有貴州馬士英常到他那裏去，因爲士英也是矢志流落白門的人，因

此他們兩人，來往的很密切。

說起阮圓海和馬瑤草（士英字），都是有才華的人，馬瑤草的詩如：「深機相接處，一葉落僧前。」和徐俟齋詩的序，都很有見道之語。阮圓海的春燈謎，燕子箋也是極有名的傳奇，他的詠懷的詩，是師法陶杜，出語自然。他本與侯朝宗有世代交誼，他很想借著自己的才華，與復社拉攏。所以他不惜千方百計，想找出自己的出路。所以大鍼第一步的手段，就想示好於侯朝宗，不惜千金，來撮合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戀史。侯方域壯悔堂集卷五李姬傳云：

「……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

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所謂王將軍，恐怕就是桃花扇中的楊龍友。這件事破裂以後，他又想借著他的歌曲，來要好於復社的名士。

陳維崧冒辟疆壽序云：

「……維崧猶憶戊寅己卯（九年十年）間，而懷寧有黨魁居留都云：時先人與冒先生來金陵，飾車騎，通賓客。尤喜與桐城嘉善諸孤兒游；游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爲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

又吳偉業梅村文集卷三十六冒辟疆五十壽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疆辟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數執政。裁量

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生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璫兒嫗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

那時阮大鍼雖然這樣取媚於復社，但復社的名流，以爲有這樣一個逆案中的禍首，在南京談兵說劍，招搖過市，還要與逆黨暗通聲氣，成什麼樣子。假若時候久了，恐怕遺禍無窮，那更沒法辦了。所以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黃宗羲沈壽民這一般復社的名士，就想作一篇宣布阮大鍼罪狀的文章——留都防亂公揭——來驅逐阮大鍼出境，因此就推吳應箕起草。陳貞慧書事七則防亂公揭本末云：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遊，實上下其手。陰持其咽喉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以爲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慙。」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籍，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

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囊，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臥子極歎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衆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揣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啓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刻骨……」

當時宣布防亂公揭署名的人，共議推東林子弟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黃宗羲，列次銜，以後以次列復社和幾社的名士。全祖望鮐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

『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馮銓）冠帶，陽羨（周延儒）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鉞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錢謙益）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鉞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公（太沖）居首，其餘

以次列名，大鉞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塞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

不久，留都防亂公揭就宣布出來，茲將原文披露於后：

「爲捐軀捋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庶不遺餘孽，撞鐘伐鼓，以答昇平事。杲等伏見皇上御極以來，躬戡黨兇，親定逆案，則凡身在案中，幸寬鉞鉞者，宜閉門不通水火，庶幾腰領苟全足矣。矧爾來四方多故，聖明宵旰於上，諸百職惕勵於下，猶未卽覩治平，而乃有幸亂樂禍，圖度非常，造立語言，招求黨類，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搖通都耳目，如逆黨阮大鉞者可駭也。大鉞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後，愈肆兇惡，增設爪牙，而又每驕語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至有司信爲實然，凡大鉞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以至地方激變，有殺了阮大鉞，安慶始得寧之謠。意謂大鉞此時亦可稍懼禍矣。乃逃往南京，其惡愈甚，其餒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惑，卽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

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餽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大鉞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見皇上明斷超絕千古，以張捷薦呂純如而敗，唐世濟薦霍維華而敗，於是三窟俱窮，五技莫展；則益陽爲撒潑，陰設兇謀，其譁張變幻，至有不可究詰者；姑以所聞數端證之，謂大鉞尙可一日容於聖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書偶斷，大鉞遂爲飛語播揚，使人心惶惑搖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狹邪行私，幸國家有難以爲愉快，此其意欲何爲也？且皇上何如主也，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鉞以聖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術士，妄談星象，推測祿命，此其意欲何爲也？杲等卽伏在草莽，竊見皇上手挽魁柄，在旁無敢爲煬灶叢神之奸者，而大鉞每欺人曰：「涿州能通內也。在中在外，吾兩人無不朝發夕聞。」其所以劫持啗喝，欲使人畏而從之者，皆此類。至其所作傳奇，無不誹謗聖明，譏刺當世。如牟尼合以馬小二通內，春燈謎指父子兄弟爲錯，中爲隱謗。有娘娘濟，君子灘，末詆欽案，有饒他清算，到底糊塗，甚至假口□□爲「呪喝天關，隴住山河，飲馬曲江波，鼾睡朝玄閣」等語，此其意抑又何爲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鉞於大臣之被罪獲釋者，輒攘爲己功，至於巡方之有薦劾，提學之有升黜，無不以爲線索在己，呼吸立應。卽如乙亥廬江之變，知縣吳光龍縱飲宛監生家，賊遂乘隙破城，殺數十萬生靈，光龍奉旨處分。大

鉞得其銀六千兩，致書淮撫，巧爲脫卸，只擬杖罪，廬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德何知縣兩袖清風，鄉紳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鉞使徐監生索銀二千兩於當事開薦。何知縣窮無以應，大鉞遂暗屬當事列參褫職，致令朝廷功罪淆亂，而南國之吏治日偷。至於挾騙居民，萬金之家，不盡不止，其賊私數十萬，通國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枚舉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人，日聚無賴，招納亡命，晝夜賭博，目今闖獻作亂，萬一伏間於內，釀禍蕭牆，天下事將未可知，此不可不急爲預防也。跡大鉞之陰險叵測，猖狂無忌，罄竹莫窮；舉此數端，而人臣之不軌無過是矣。當事者視爲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爲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爲國患必矣。夫孔子大聖人也，聞人必誅，恐其亂治，況阮迹之行事，具作亂之志，負堅詭之才，惑世誣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鉅卿，豈無懷忠報國，志在防亂以折衷於春秋之義者乎！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若使大鉞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鑕，輕投魑魅。卽不然而大鉞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於聖世哉！謹以公揭布聞，伏維戮力同心是幸。」

大凡一般青年人的心理，他不知道什麼是利害，他不知什麼是恩惠。他心裏潔白無私，只知道

世界上有「公理」不知道有藏奸營私的事情。他能代表民衆的輿論，成了一時的清議。惟其世界上的人類，他怕清議的責備，所以不敢爲惡；社會的秩序，也因此維持能上軌道，不至於毫無顧忌。所以顧炎武他很主張清議，他常說：「清議亡，而干戈起矣。」復社名士，驅逐阮大鉞這件事，無論他們辦的是否太過，但他們不顧利害，不戀小惠，這樣純潔無僞的舉動，是值得佩服的。所以他們身無寸戈，用清議兩個字，就把阮大鉞趕跑到南門外的牛首，再不敢出頭露面了。陳貞慧書事七則云：

「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悲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恥者，亦裹足與絕。』鉞氣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林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身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

那時復社的同志和東林的諸孤，集合起來，共舉了國門廣業之社，黃宗羲南雷文傳卷一陳定生墓誌銘云：

「崇禎己卯（一六三九）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崑山張爾

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爲笑樂。」

他們的社集，自崇禎己卯（十二年一六三九）以後，一直到弘光初立，還是在那裏舉行。吳翌鳳鐙窗叢錄卷一云：

「……南都新立，有秀水姚泚北若者，英年樂於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句隊末有演此者，故北若詩云：「柳岸花溪澹汴天，恣攜紅襖放鐙船，梨園弟子覘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他們在金陵的集會，真是集一時之盛，不意弘光卽位不久，馬阮就當了政，重修舊怨，周鑣雷演祚都被大鉞所害。據吳翌鳳鐙窗叢錄卷一：適有王鼎寶，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鉞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次，以爲防禦。」想把復社的名流一網打盡。已詳於崇禎朝之黨爭章，那時候陳貞慧捕入錦衣衛，僅免於死，侯方域幾爲所擒，沈士柱吳次尾都偷偷的跑了。黃宗羲跑到餘姚起兵，黃竹浦，沈壽民老死金華山中，冒襄回到如臯水

繪園歸隱，從此復社的名流都風流雲散了。

由上我們看來，張溥等在尹山虎丘三次的大會，是復社的本根，侯方域吳應箕在金陵的草防亂公揭是復社的分局。因天如死了之後，復社裏沒有相當的領袖，所以有復社分局的局面出來。復社從崇禎六年戊辰周鍾選應社十三子之文，一直到侯吳等人的出走，相持了十六七年，這復社的集會就算中止，於是社事的集合，由大組織而又變爲小組織的運動，這樣洋洋大觀，幾千人的運動，是不可得見了。

九 幾社始末

當應社成立的時候，吳昌時要把應社推廣起來，聲勢非訖於四海不止。因此復社聲勢雖然彌漫，但造忌也不少。幾社的成立，就是鑒於復社的前車，不專事務外，所以幾社的聲勢沒有復社這樣大，但流傳的時代比復社久。

幾社創辦的共有六個人，號爲幾社六子，那六個人，是夏允彝，杜麐徵，周立勳，徐孚遠，彭賓，陳子龍，那時創辦幾社的，還有李雯，因爲他後來投降到清廷，所以杜登春社事始末，沒有把李雯列入。松江的文會本來很盛，在幾社未立之前，就有張鼎，李洩雲，莫天洪等辦的曇花五子之會。後來莫洪的兒子寅廣，儼臯，和杜麐趾。有小曇花之約。不久麐趾與夏允彝纔有幾社之約。杜登春社事始末云：

『先君與彝仲謀曰：「我兩人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爲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遂敦請文會，並與講明聲應氣求大法旨情誼感孚，比親兄弟。時先祖延燕又先生于館，席授諸叔古學頗才穎，凡得五人，同筆硯爲快。臥子先生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

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

又李延是南吳舊話錄云：

「幾社非師生不同社，或指爲此朋黨之漸，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國，陳臥子聞而怒。夏考功曰：「吾輩以師生有水乳之合，將來立身必能各見淵源；然其所言譬如挾一良方，雖極苦，何得不虛懷樂受。」臥子曰：「兄言是，」乃邀爲上客。」

這可見幾社取友甚嚴，非師生子弟不准入社，與復社之大開門戶，有所不同的地方。後來幾社的成立，彭賓的力量爲多。幾社的社址，就借了彭賓所居披雲門外春藻堂，爲開會的地方。華亭縣志云：

「賓字燕又，明崇禎三年舉人，國朝選授汝寧府推官，謁長官不持手版，遂免歸。賓爲幾社六子之一。初賓祖汝讓，當隆萬時居郡金沙灘，有春藻堂，與同人結文會。明季陳夏主盟風雅。賓與其兄彥昭，卜居披雲門外濯錦巷，仍移舊額署之，是爲幾社諸君子高會處。」

那時，邑中盛鄰汝家，很喜歡延攬賓客。李延是南吳舊話錄云：

「盛鄰汝家道豐腴，家有園池，又擗疊絲竹之屬，事事副之。社中倚爲顧廚，故四方咸曰：「眼

不見顧家全盛園（顧氏園，在郡東郊，悉做仙山樓閣，其名甲于天下，啓禎時已漸廢。）只得嘗盛家一夕餐，十箇遊客九繫船。」

不久六子之中像夏允彝、杜麐，都以貢舉入京，約在京師的朋友，就立了個燕臺十子之盟。社事始末云：

『是時婁東張天如先生溥，金沙周介生先生鍾，並以明經貢入國學，而先君子登辛酉賢書，夏彝仲先生允彝，亦以戊午鄉薦偕遊燕市，獲締蘭交，目擊醜類猖狂，絕緒衰息，慨然深結，計樹百年，于是乎先君子（麐）與都門王敬哉先生崇簡，倡燕臺十子之盟，漸至二十餘人。』

同時在會的有張采，楊維斗，羅萬藻，艾南英，宋徵璧等人，可見他們在京各社是合作的。後來復社與江西艾千子派分道揚鑣，幾社的人物始終與復社合作，並且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但幾社的宗旨，根本與復社不同。社事始末云：

『天如介生有復社國表之刻，復者，興復絕學之義也；先君子與彝仲有幾社六子會義之刻，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兩社對峙，皆起於己巳（崇禎七年一六二九）之歲……婁東金沙兩公之意，主于廣大，欲我之聲教，不訖于四裔不止。先君與會稽先生之意，主於

簡嚴，維恐漢宋禍苗，以我身視之，故不欲並稱復社，自立一名。盡取友會文之實事，幾字之義，于是寓焉。」

在崇禎初年，幾社雖然與復社合作，但是復社對外，幾社對內。復社整天的在外邊開會活動，幾社的同志，卻閉戶埋首讀書。復社開了三次大會，風頭真是出够了；但是張天如已死，復社就嗣響終絕，而幾社的文會卻繁盛起來。楊鍾羲雪橋詩話云：

『雲間幾社，李舒章（雯）與陳臥子承復社而起，要以復王李之學，共七十三人，王珩石爲首，青浦邵景悅、梅芬繼之，與張處中、徐桓鑒、王勝受業於臥子，時稱四子。少受知於知府方岳貢歲科舉試第一，問業者甚衆，同時入學至十七人。王卻非、司空日藻、張蓼匪、布政安茂，皆出其門，與方密之、陸講山、陸鯤庭，皆訂文字交。當陳夏壬申文選後，幾社日擴，多至百人。』

那時，幾社的同志，日漸衆多，所選的制藝，除宋存標、幾社壬申文選之外，還有幾社會義初集，幾社壬申文選是仿昭明文選體彙，刻幾社六子之文，每人六十首；幾社會義人數比較多了。我們知道的有宋徵輿、張安茂、徐致遠、張密、張寬等人。所以杜登春說：「幾社會義初集擴至百人。」當時共推徐孚遠、閻公爲操選政的領袖，幾社會義一直刻到五集，仍由閻公操持選政，但幾社由極盛而漸變

成分裂之勢，就分成求社景風兩派。社事始末云：

『甲戌乙亥陳夏下第，專事出文辭，文會各自爲伍，彙于闡公先生案前，聽其月旦，至丙子刻二集，戊寅刻三集，己卯刻四集，人材輩出……至庚辰辛巳間，刻五集，猶是闡公先生主之，而求社景風兩路分馳，似有不能歸一之勢，然社刻總于一部內，幾社朝夕課藝者，惟余長兄輩十餘人，另爲一集。闡公先生所云正統是也。壬午，闡公上北雍，以六集之刻，委于子服操之。于是談公敍，張子固，唐歐治兄弟，錢荀一有求社會義之刻，以王玠右名世二公評選之。李原煥，趙人孩，張子美，湯公瑾，有幾社景風初集之刻，仍託闡公名評選，幾社數子之文，悉登于景風。』

未幾，徐闡公獲雋北上，不預幾社操選政的事情，那時幾社的派別，更形分離，在崇禎十五年間（一六四二），景風社分成雅似堂一派，求社分成贈言社一派；在幾社的朋友，更分成了無數的小組織，如震雉社，昭能社，野腴樓，小題東華集，西南得朋會等的名稱。社事始末云：

『壬午榜發，得雋者，皆求社之人，景風無不在孫山外者。幸而闡公先生雋於北榜，幾社稍有生色，然駸駸乎求社與幾社，有並立之勢矣。壬午之冬，周宿來先生茂源，與陶子冰修懔，蔣子馭閔，凌階，蔡子山銘峴，吳子日千騏，計子子山安，後名南陽，集西郊諸子爲一會，有雅似堂之刻，此景風

之分枝也。彭燕又先生率其徒顧子震雉鏞，即改名大申，號見山者，舉贈言社，亦有初集之刻，似乎求社之分枝，而實幾社之別派。震雉欲登東海之堂而不得，歸于燕，又集二十餘人爲一會，與幾社諸子之文會相等。其中人才實有可觀，如王子伊人，即今農山先生，章子武，謀颺高，沈子劬，六朝棟，盧子文，子元昌，後名駱，前何子婉，珠竹，宋子武，賓演，後名泳，唐子同，保字少伯，陸子射，石廣，皆其選也。何我抑率其徒有昭能社之刻，盛隣汝先生率其徒爲野腴樓小題之刻，王玠右先生率其徒韓子友一范，閔子山紆峻，有小題東華集之刻；癸未之春，余與夏子存，古完淳，有西南得朋之會；爲幾社諸公後起之局。諸社文會，悉來敦請，皆謝絕不與。至閻公先生下第歸，命我等數童子應赴求社之招，一爲求社諸公專力勤學，精工舉業，宜親之，以爲模楷；一爲求社局面似有分門，以子弟從之，則渾化無異同之迹也。此語明告景風，雅似贈言東華諸公，以余數人不赴召之故，不獨余數人知之耳。」

那時和景風最有勢力，而求社的人物，比較用功，獲雋的很多。因此大家都推重求社。不久北都失守，弘光在南京立國，那時馬阮當政，東林的後裔，和復社的名流，全受了無限的打擊。但夏彝仲丁憂家居，陳臥子請告終養，所以沒有預白馬之禍。社中的文會，和選刻，仍沒有停。那時松江的社局，幾

社是社中的正統，求社，景風等社是他們的別枝。他們統請徐孚遠操選政，但選到會義第七集徐闇公就請徐元貞、麗沖來代理。他們雖然在那裏粉飾承平，那知道待了不多日子，南明的小朝廷，就被清兵消滅，清兵節節的直下，江南不久歸入清廷版圖。夏允彝和陳子龍就在松江與吳勝兆聯合起義，被清兵所擒，都殉了節。那些復社幾社的名士，如吳應箕、顧杲、吳易等人，皆以起義作了爲國而死的犧牲者，其餘的像熊開元方以智、錢秉鐙也作了和尚，徐孚遠跑到外面，作興復的工作。他們會文的事情，一變而爲革命的豪舉，這是何等令人欽佩呀！這些老先生們被清兵殺的殺，逃得逃，所剩下的僅有幾個幾社的後進了。

到了順治乙酉丙戌以後，江南初定，清廷南北二闌，已經開科取士，來牢籠一般讀書的人。所以幾社的名士，張九微、宋徵輿、宋實穎、宋德宜、宋德宏、鄒祇謨、董以寧等都出來應試，那時由宋實穎既庭，杜登春君遷，還有徐乾學、徐原文等在蘇州發起滄浪會，聯合吳郡和松江的兩郡人物，提倡風雅，但不久兩郡的士子，漸漸的起了意見。於是在順治六年己丑的冬天，滄浪亭一局，就變成慎交同聲兩社。原來松江和吳郡的社事，國變以前，是以松江爲主，國變以後，滄浪會中人物，雖然全是徐闇公、楊維斗的高足，但社中的勢力，已轉變到吳郡。不久吳中又分成兩派，就是慎交和同聲，而松江又立

原社；慢慢的就與吳中分馳了。沈彤震澤志云：「慎交社創于郡中宋既庭實穎，而吾邑之在社者，則吳弘人兄弟爲之冠。」因此慎交社，後人多以爲吳兆騫所主辦。陳去病五石脂云：

『漢槎（吳兆騫）長兄弘人名兆寬，次兄聞夏名兆夏，才望尤夙著，嘗結慎交社於里中。四方名士，咸翕然應之，而吳門宋既庭實穎，汪苕文琬，涑水侯研德玄泓，記原玄汭，武功敬士，西陵陸麗京，同邑計改亭東顧茂倫，有孝趙山子雲，尤爲一時之選。當慎交社極盛之際，苕文嘗來吳江。一日，漢槎與之出東郭門，徘徊垂虹橋，忽顧視苕文，引袁淑對謝莊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其放誕如此。』

同聲社是章在茲葉方靄所主辦。沈彤震澤志云：

『時崑山葉文敏方靄先倡同聲社，吾邑周求卓爰訪董方南閭附之。遂各立門戶，相爲水火，垂二十年而後已，其始事蓋在甲午乙未間（順治十一十二年一六五四——一六五五）也。』

杜登春社事始末明說是在順治六年（一六四九）乙丑之冬，沈氏所說，甲午乙未間的話是錯的。不過他們兩社雖然在一郡，感情本不相睦，所以社事也日趨分離。那時社中諸子彭雲客瓏，宋既庭實穎，尤西堂侗等，就想化除私人的意見，聯合兩郡的人士，推而廣之，共舉十郡大社，或又名作

七郡大社，或九郡大社。顧師軾、吳梅村年譜引毛奇齡、駱明府墓誌云：

『駱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嘗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萊山 毛牲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南湖。太倉 吳偉業，長洲 宋德宜、實穎，吳縣 沈世英，彭蠡 尤侗，華亭 徐致遠，吳江 計東，宜興 黃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 徐乾學，嘉興 朱茂暉、彝尊，嘉善 曹爾堪，德清 章金牧、金范，杭州 陸圻，越三日乃定去。』

吳偉業也是提倡十郡大社的一個人，那時他正應召入都，道出虎丘，就與同聲慎交兩社的士子解和，在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合七郡的才人，和兩社的同志，藉著春禊社飲的時候，在虎丘開大會，並且梅村的辦法很好，請他兩社每日各主席一次，庶不致起了衝突。程穆衡、梅村詩箋云：

『癸巳春社，幾郡人士至者幾千人，第一日慎交社爲主，慎交社三宋爲主，右之德宜、疇三、德宏，既庭實穎、佐之者，尤展成、侗、彭雲、客璠也。次一日同聲社爲主，同聲社主之者，章素文在茲，佐之者，趙明遠、炳、沈韓、倬、世奕、錢宮聲、仲諧、王其倬、長發、太倉 如王維、夏昊、郁計、登禾、周子俶、肇，則聯絡兩社者，凡以繼張西銘、虎丘大會。壬夏雜抄：癸巳春，同聲慎交兩社各治具虎阜，申訂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先一日慎交爲主，次日同聲爲主。

又會日，以大船二十餘，橫亘中流，每舟置數十席，中列優倡，明燭如繁星。伶人數部，聲歌競發，達旦而止。散時如奔雷瀉泉，遠望山上，似天際明星，晶瑩圍繞。諸君各誓於關帝前，示彼此不相侵畔。」

又王隨菴撰自訂年譜云：

『十年上巳，吳中兩社並興，慎交則廣平兄弟執牛耳，同聲則素文韓倬諸公爲之領袖，大會於虎丘，奉梅村先生爲宗主。梅翁賦禊飲社集四首，同人傳誦。次日，復有兩社合盟之舉，山塘畫舫鱗集，冠蓋如雲，亦一時盛舉，拔其尤者集半塘寺訂盟。四月，復會於鴛湖，從中傳達者研德子、俶兩人，專爲和合之局。是秋九月，梅翁應召入都，實非本願，而士論多竊議之，未能諒其心也。』

當十郡大社的成立，幾社六子彭賓的兒子彭師度，也加入了十郡大社，很露頭角。

華亭縣志人物云：

『子師度，字古晉，號省廬，年十五，與虎丘千英之會，卽席成虎丘夜晏序。吳祭酒偉業，謂與吳兆騫、陳維崧爲江左三鳳云。』

但杜登春社事始末云：

「余以九月杪南歸，不及與虎丘之會，雲間社局武宣孝力冰修古晉交主之，尙無歧途也。古晉子虎丘歸，自稱舊人子弟舉大社，網羅一郡之人，亦大會于須友堂中。刑牲執耳，不論鄉市胥隸，苟識之，無罔不握手，敍弟昆，登壇坫矣。許子孝修以庶常丁艱里居，慨然憤告予曰：「社局混淆，爲世所笑，古晉命我舉第二集，其去取之操在我，莫若乘機一救正，非原社諸公舉其事，我不犯大難也。」」

由上數段看來，自順治十年大社在虎丘開會以後，彭古晉又在松江舉大社，吳中社盟的勢力，又蔓延到松江來。但是當順治庚寅辛卯兩年間，同聲勢力最蓬勃的時候，松江已經與吳中分馳，杜登春與張淵懿施授樟等十人就約松江的人士，上紹西南得朋之會，共立了原社，刻原社初集盛行於世，以與吳中相抵抗。後來大社的成立，有吳梅村等人的主持，因此大家都無異議。到了彭古晉回到松江重舉大社，這松江人士怎能相容，因此就遭了杜登春一派的忌妒，由許孝修操選政的關係，就把彭古晉的大社一夕銷散，松江人士全歸到原社裏來了。這十郡大社本來是敷衍的局面，不能如復社有統制的能力。大社雖然消亡，但慎交、同聲仍然存在，但不能相容，真如沈氏所說：「相爲水火垂二十年。」慎交社到康熙十年（一七一〇）庚寅還有社集的舉動。蘇州府志錄云：

『康熙庚寅，吳屆遠輯復大集于傳清堂，同學陳穎長、銳霜、赤鍰、徐武恭、元顯、李露楨、寅、沈丹、珊鳳、城，計希深默，李道武、繩善，與穎長、門人、張損持、尚瑗霜、赤嗣、君起、雷沂、震暨、霑，左右壇坫。時則吳門、婁東、玉峯、虞山、雲間及浙之武林、海昌、茗山、樵里、武源、浯水、當湖、魏塘、桐川，莫不聲氣相通，論文莫逆。三十年來，此事不講，而文風已不振矣。』

我們再述原社成立以後的情形，原社的同人，在南北闡之中，得中的頗多，很得到一部分的勢力，主持壇坫的是宋直方、李喬齋等人，門戶很嚴，那時率真社想加入原社，但被他們拒絕了。原社的文選共刻了二集，後來林古度、陸冰修起來，又重立社局，於是原社又分爲恆社。

但是到了順治十五年（一六五九）以後，江南時局，業已大定，清廷就想出種種方法來箝制人民的行動，這種殘苛行爲的發生，與明代的制度很有關係，是很可以注意的幾件事。我們述幾社的源流，不能不附帶着說明：例如明代紳士的貪橫，他們可以侵佔人民的田產，可以抗糧不納租稅，所以江南的租稅，一天比一天的減少，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裏面記載很詳。因此在順治間就有奏銷案出來，所以一般士子，只要拖欠了錢糧，就可以把公名革掉，當日有「探花不值半文錢」之說。復次明代的人士，很重科舉，到了清初，故意的示好於民衆，教他們來投考。那時明代的社局，互通風氣，

有公薦，獨薦，轉薦之說，明代通關節的事情，不知有發現了多少次。上章已經說過，清初乍復科舉，明季的陋習是不能免掉的，清廷借著通關節的事情，來大施其淫威。孟森心史叢刊科場案云：「至清代乃與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於是就有順治丁酉南北闈科場案的發生。還有順治十七年，鄭成功和張煌言的率師北伐，水師一直到了鎮江，安徽和州池州無爲蕪湖等，全都響應。幸虧梁化鳳把鄭成功打敗，成功退回舟山，就佔據臺灣。明季遺民聽見鄭成功有這樣的偉舉，都在內地響應，歡迎鄭成功北上，於是就有通海案和東南沿海遷界案的發生。這是清初慘酷的事情，通海這件事，最顯著的，在江蘇有金壇九案。在浙東有祁氏之獄，詳見第十一浙中諸社章。那些明季的遺民，抗清的固然殺戮無遺了；就是當順民的，也被清廷的剝削，拿著人命連草芥都不如，這是怎樣可慘的事呀！

可憐幾社的後裔，彼此分立門戶，大社既然連絡慎交同聲二社；原社的人們，把大社破壞了，而大社之首領，又更立恆社，與原社相報復。他們社局的朋友剛中了舉，進了學，那知不日就成了階下之囚，和刀下之鬼呢？那時社中諸子社務正忙的時候，想不到，奏銷案和科場案發生，被累的不下好幾百人。社事始末云：「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百輩，社局于此索然，幾幾乎熄矣。」社中最有名

的人物吳兆騫漢槎就罹了科場之獄，充軍到寧古塔。幸虧顧梁汾，納蘭容若徐乾學的解救，纔生賦刀環。這件事，在孟森心史叢刊卷一科場案和吳漢槎秋笈集卷八戊午二月十日寄顧舍人書記得很詳細，此處恕不另舉了。不過在他們朋友們患難當中，據杜登春云：「一年之中，爲檻車謀行李，爲複壁謀衣食者無虛日，苟非同社交遊，安能敦古道，竭深情，如親骨肉也哉。」這還可以見同志的義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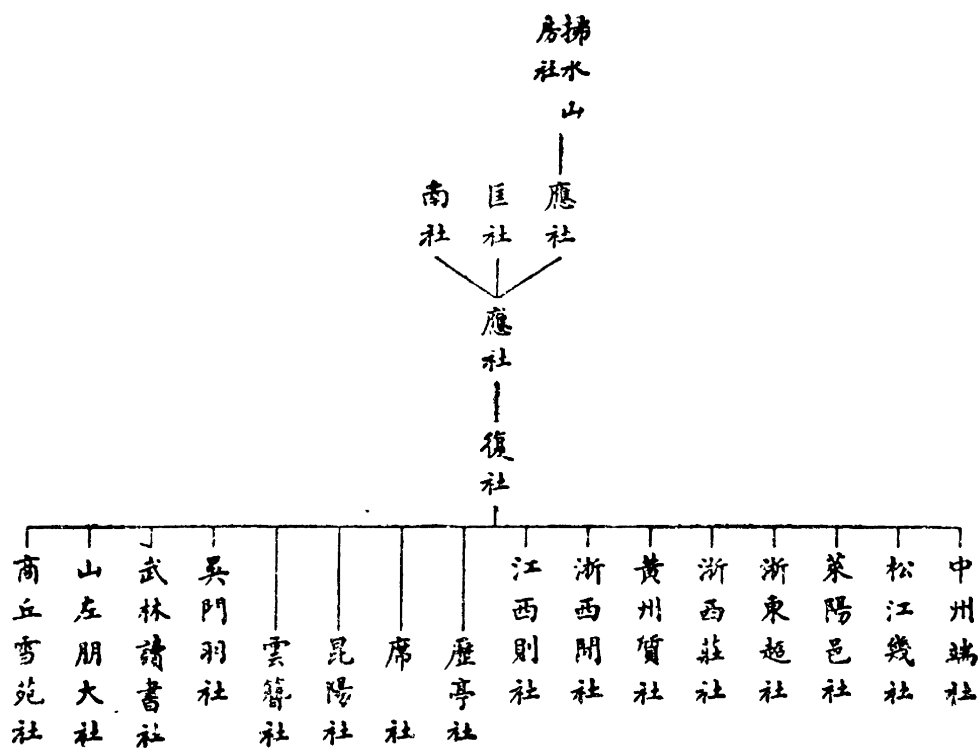
那時社局的人物，因爲有些同志，都已仕新朝，所以有人護庇，還不至於都干了厲禁。社事始末云：「兩社同朝數輩，文章聲教，實爲海內亘古所未觀。同社之在里門者，各借以爲樹植之基，競舉大盟會，標榜招搖，傾動江表。江上之得免者，賴主盟皆在朝列。」自通海等案發生以後，吳梅村正丁憂家居，他還是持融和慎交同聲兩局的態度，請他們閉戶讀書，不要講海南故事。因此「屏息偷生，無及於難。」但是還遭杭人陸燮，借江上之事，告偉業是復社餘黨，想傾覆社稷。但這事幸未發作，從中和解，就算了事。到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一）就有禁社盟的事件發生。在松江的社事，雖然原社又分爲春藻堂——春藻堂原是幾社最初集會的地方——春藻之外又有大雅堂之會，但實際也不過「燭火螢光」罷了。

我們還記得幾社的領袖徐孚遠，自弘光北狩之後，他從魯監國漂泊海島。永曆時，命孚遠作左都御史，隨金湯入覲，失道越南。又跑到臺灣，鄭成功待他很好。那時明末的遺民跑到臺灣的很多。他就約了鄞縣陳士東等人立了海外幾社，同時還有沈光文，也在臺灣結社。另詳在浙中諸社條（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九，及楊鍾義雪橋詩話）。那時吳兆騫充軍到寧古塔，在荒寒不毛之地，他也立了七人之會。寄顧舍人書云：「乙巳以授徒自給，其夏張坦公先生，集秣陵姚琢之，苕中錢虞仲，方叔丹季兄弟，吾邑錢德維，及鄙人爲七子之會，分題角韻，凡三集。窮愁中，亦饒有佳況，其後以戍役分攜，此會隨罷。」這可以與函可和尙在瀋陽的冰天詩社相媲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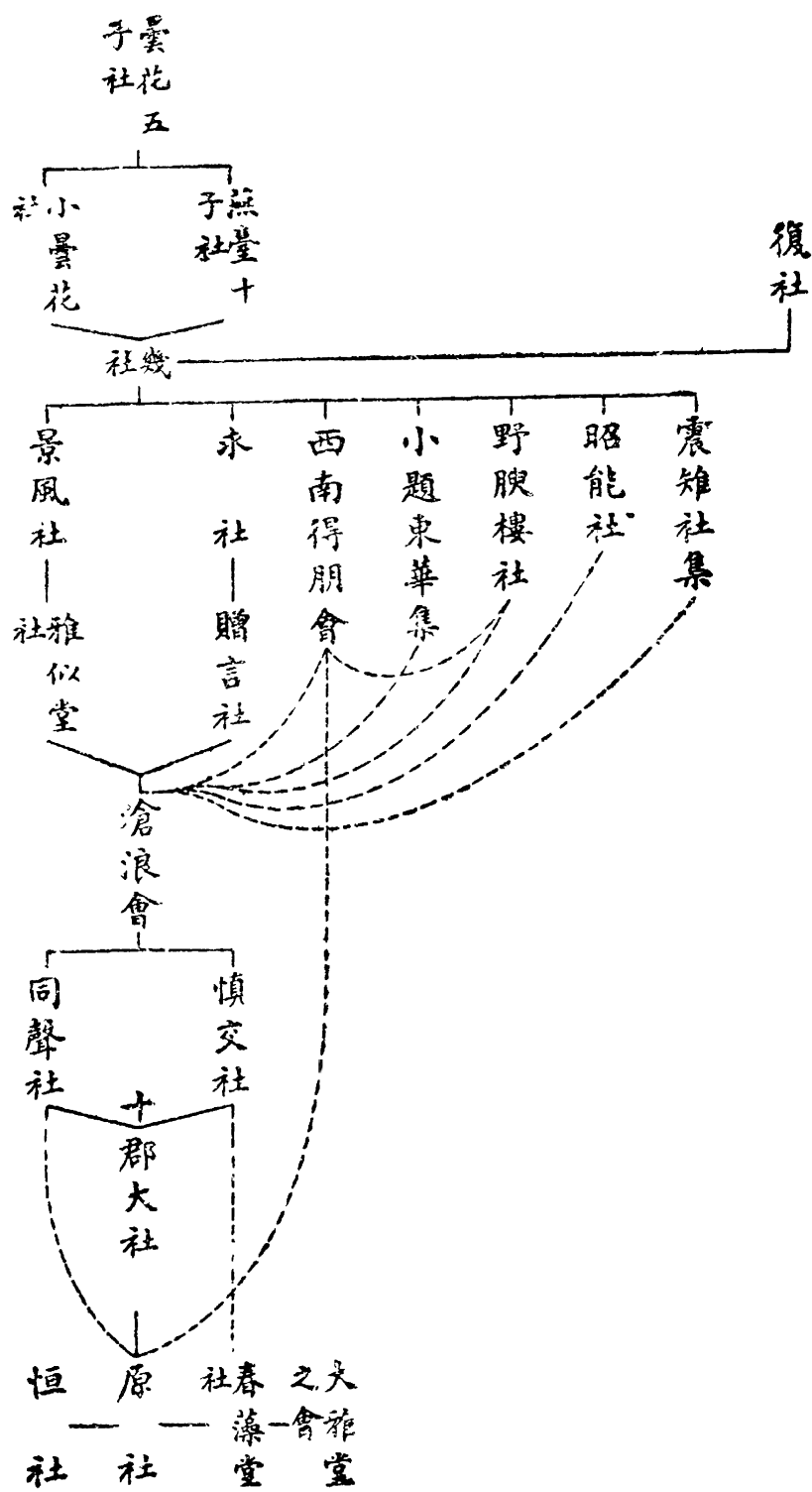
幾社自崇禎之初到康熙初年，凡四五十年，始終其事的就是顧修南和杜登春。到了康熙初年，春藻堂的社集，顧修南和杜登春還親自蒞社指示一切，杜登春告戒社中同人的平生言，雖遭當時之忌，其文必有可觀，可惜原書已不傳了。他著有社事始末，記得很詳細，我在此章內，大半以杜氏之言爲根據。但由杜氏的書，我們可以知道，幾社流傳雖久，但他們派別不能不分裂，分裂最顯然的地方，就是在崇禎末年求社和景風之分；順治年間，慎交和同聲之分。就以杜君所記而論，也有不公允的地方。十郡大社本來是合慎交同聲兩局，杜君偏偏對於這個舉動不以爲然。所以他就借著彭古

晉，來大肆誹薄；但杜君主的原社，又何嘗愜人意呢，所以後來原社又有恒社的分立。其實分來分去，有什麼結果，也不過白雲蒼狗，供後人談助罷了。復社同志普遍了東南各省，但爲時較短；幾社地域雖小，卻歷時很長：可以說一個是縱的，一個是橫的。茲把他們兩社源流系統，列表於下：

復社源流系統表



復社



十 大江南北諸社

楊鳳苞 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云：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

我看不但在大江以南，就是大河以北，也有結社的舉動。第一，我先述大河以北的社局，像山東掖縣貢生趙士喆倡山左大社，以應復社。楊宗義 雪橋詩話卷一：

『……士喆字伯濬，倡山左大社，以應復社，嘗削稿，縱談天下事，思上之朝，見陳啓新用事，恥之不果。甲申後，避兵登州之枳椒山，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有東山詩外石室談詩，鄉人私謚文潛先生。董樵字樵，又字亦樵，一名鷲，字樵谷，萊陽縣學生……』

雪橋詩話又云：

『彭餓夫之燦，其峽山人名通，與上谷張秉曜結北丘社，嘗聯句云：「浩然歸去事如何，不伺

邯鄲惹睡魔，生死總同秋色老，北邙山畔月明多。」吐棄世故，絕炊不以爲意。」

又如顧炎武到陝西訪青門七子，張穆顧亭林年譜引王山史（弘撰）山志云：

『青門七子，皆宗室之賢，而篤於學者也。各有詩文集，卓然成家。余所及與之游者，子斗翁（名誼，秦愍王九世孫）而已。亂後數往省之……嘗與顧亭林言及，亭林入青門，特訪其家。時翁已歿，見伯嘗（名存杠，明亡，易姓名楊謙，字伯常）索翁著作，讀之，因爲之序。今伯嘗亦歿，其子孫冒楊氏，蓋從翁之母姓也。』

青門七子是明季宗室，聚於雁塔底下，互相唱和，這顯然有結社的痕跡。此外像雞澤三君（申彥盟、殷岳等）萊州姜垓、姜埰，濟寧鄭與僑等，他們一定也有結社的事情，不過山東河北等處入清廷的版圖較早，人民受新朝的箝固，行動不能自由；二來北方的記載和方志等書，敘述得不很詳細，所以結社等事，就寂然無聞了。

復次，在明代的社盟除了文社以外，還有一類，似團練保甲的性質，像孫奇逢之結茅雙峯，湯斌等撰孫夏峯年譜卷上：

『容城東南數里名雙峯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興文學，干戈擾攘之時。有禮樂絃

誦之風。

並且與同志立了科條，有嚴同心，戒勝氣，備器具，肅行，止儲米豆，六事，這全是爲保護地方而設的。又有一類的社是專爲理學家讀書講習之所，像孫夏峯在河南百泉立的十老社；應譙謙立的狷社；凡此兩端都與復社幾社等結社的性質不同，此處暫且不去敘述。

第二、我們要注意的，是東越和三吳的社局，自從復社與幾社興起以後，社盟運動可以爲兩個趨勢：一派的是同志們看見國已經亡了，家已經破了，他由激昂的胸懷，而變爲放浪江湖，寄情詩酒，頹廢的舉動，——這一派可名爲頹廢派。——又有一派他覺着雖然國破家亡，我們還是要不顧生死的照樣幹去，——這一派可名爲激進派。拿各社的形勢來看，三吳的社局可歸入頹廢一派，東越和粵中的社盟可歸激進一派。在清代嚴酷政治之下，激進一派，自然是殺戮無遺，自不必說了；就是放浪詩酒的頹廢派，也被清廷弄得焦頭爛額，這又是何等的慘酷的事情！

現在討論大江南南北的社局，我們可以略爲知道一點系統的，共有三個，一、雪苑社，二、驚隱詩社，三、望社。茲分別敘述於下：

雪苑社是商丘侯方域、賈開宗所主辦的，入社的共有四人，爲吳伯裔、吳伯胤、徐作霖、劉伯愚，他們都很有才氣，當時江左諸名士，目爲吳侯徐劉。雪苑社創辦於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侯方域 壯悔堂文集卷五徐作霖張渭傳云：

『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

後來方域到了南京，參與復社，加入了留都防亂公揭。弘光立，馬阮當政，他跑到揚州去依史可法。南都破，河南已歸入清廷版圖。那時徐作霖、吳伯裔、伯胤、劉伯愚，在崇禎十五年，商丘被匪所破，早已殉難（劉德昌修商丘縣志）。朝宗由揚州回到家中，舉目荒涼，故友已不存在，幸喜賈開宗自遠方回來，就與賈開宗、徐作肅及其姪世琛，重修雪苑文社，後來加入了徐隣唐、宋犖等二人，就名作雪苑六子。

壯悔堂遺稿雪苑六子社序云：

『吾向者雪苑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簪，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苑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

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栗，揮鋤田野，雪苑之社，虛無人焉。嗚乎！雪苑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歔歔，言及雪苑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苑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既夷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苑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隣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日雪苑四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苑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肇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雪苑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苑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不幸朝宗早歿，雪苑社也就解散了。

二 驚隱詩社

驚隱詩社又名逃之盟，是幾社而外，松江最大的詩社，社創辦於順治庚寅（一六五〇）主盟

的爲葉桓奏，吳炎等人。吳炎後來羅了莊氏史案之禍，因此驚隱詩社，遂爲世人所注目。秋室集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云：

『……甬上僻處海濱，多其鄉之遺老，閒參一二寓公，松陵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驚隱詩社，又爲吳社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中之領袖也。家唐湖北渚之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歲於五月五日祀三閭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徵士，同社麋至，咸紀以詩，今攷入社名流，見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茗上則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全完城陳雁宕（忱）禾中則顏雪臞（俊彥）朱載揚（臨）鍾琴俠（俞）武林則戴曼公（笠）玉峯則歸元恭（莊）顏寧人（炎武），梁谿則錢礎日（肅潤），吳門則陳皇士（濟生）程杓石（櫟）施又王（誣），同邑則吳匡廬（珂）東籬（宗潛）南邨（宗漢）西山（宗泌）芳時（宗沛）赤溟（炎）北窗（案）曜庚（在瑜）融司（南杓）石城（嘉楠）顧茂倫樵水（樵）戴耘野（笠）潘力田（檀章）葉開期（世侗）周闇昭（燦）機高（爾興）其凝（撫辰）安節（安）朱長儒（鶴齡）不遠（明德）鈕晦復（明倫）蓀如（榮）王兆敏（錫闡）雲頑（初）沈建芳（永馨）彥博（泌）李北山（恆受）錢鐘銘（重）金寧武（甌）彥登（廷璋）公覲（始）

垣（耳詔）（成）顏子京（祁）鍾賓王（嶽立）跡其始于庚寅終于甲辰。（順治七年至康熙三年，一六五〇——一六六四）諸君子各敦蠱上履二之節，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于五湖三泖之間，亦月泉吟社之流亞也。後之續遺民錄者，必有取于斯也夫。桓奏名繼武，自號五帶散人，集凡四卷，假閱于沙淞陳氏。」

神州國光社排印本吳赤溟集附有驚隱詩社名單，與秋室集所記大致相同。又陳去病吳節士傳云：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蘭溪人也。諱炎字赤溟，又字晦如，號婉庵，以遭逢鼎革，繫心故國，不忍背弃，故更號赤民。少承家學，爲歸安諸生，有聲於時。未幾國變，乃遜蹟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則與其伯叔昆季爲逃之盟於溪上，一時吳越間高蹈能文之士，聞聲相應，而來者得數十百人，蓋彬彬乎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遺風焉。』

附註云：

『按先生之父，兄弟九人，國變後皆改名隱遁，旋返故國，結驚隱詩社，卽逃之盟是也。沈彤震澤縣志云：「迹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松輿遯跡林泉，優遊文酒，甬中

六袍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輟。」

我們題到吳赤溟之罹莊氏史獄，不可不先述莊氏史案的原委，原來明天啓間，湖州李國禎，作了一部明史概又名明書，內容有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均係天啓時所刻。論贊稱朱史氏，其餘未刻的有列朝諸臣傳，開國遜國諸臣二列傳。已刻的版心上皆雕有「清美堂」三字，那時湖州莊廷鑑得到朱氏未刻的稿子，請了許多名人，替他編輯，改名爲明書輯略。所請編纂的人，秋室集卷五記莊廷鑑史案本末云：

『……書成而廷鑑死，胤城痛傷之，爲乞故禮部主事李令哲撰敘，列吳越名士十八人爲參閱。十八人者，歸安 茅元銘，吳之銘，吳之鎔，令哲子初燾，元銘子次萊，烏程 吳楚，唐元樓，嚴雲起，蔣麟徵，章全祐，全祐子一口，吳江 張雋，董二酉，吳炎，潘耒，章仁和陸圻，海寧 查繼佐，范驤也。順治十七年冬刊成（一六六〇）頗行于世……』

那時吳赤民 潘力田雖然應了莊氏之約，並且他們兩人又共同著了一部明史記和今樂府，潘耒 章今樂府序云：

「今予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不此之任，將以誰俟乎？因相與定爲目，凡得記十八，書十二，表十，

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爲明史記，而又相與疏軼事，及赫赫耳目，足感慨後人者，各得數十事。潘子爲題，予爲解，予爲題，潘子爲解。損之又損，以至於百，爲今樂府，而饒歌騎次雅頌不在焉。已之冬成十三，午之春成十七，三閱月而余百章悉成。」

後來烏程令吳之榮以勒詐不遂，首先告訐，案發之後，除了查繼佐、范驥、陸圻，以事前自請檢舉，未及於難。是獄從順治辛丑發生，至康熙癸卯判決（一六六一——一六六三），把全書編纂人和編纂人的昆弟子女年十五以上者，全都斬決，妻女配瀋陽披甲爲奴，株連了不下一二百人，是最慘酷的一件案子，不幸驚隱詩社的領袖，也罹了這場浩劫。吳赤溟集附平望志云：

『吳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樛，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永曆十七年），同以南潯莊氏史獄株連，逮繫虎林軍營，是歲五月五日，吳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藉，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有火字者，卽我尸也。聞者莫不流涕。後力田弟未，官翰林時，嘗白炎冤於朝，始得昭雪。』

像吳潘之流，他本沒有抗清急激的活動，但因爲修史的事情也遭了奇禍，在清初社盟的結局，驚隱詩社要算最慘的了。當時除了莊氏史獄之外，同時株連的還有閔聲嶺雲集詩獄、南雷文約卷。

二閔君墓誌銘云：「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校姓氏，有微人范希曾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後來閔聲得獲釋放，這也是不幸中之幸了。

三 望社

淮上的社局要首推望社，是淮上的詩人閔牛叟修齡，靳茶坡應昇所主辦的。李元庚望社姓氏攷云：

「靳應昇字璧星，一字二娛，號茶坡，又號茶坡樵子。明歲貢生，有捷才，爲詩壇宿望，播遷後風雅如線，結望社以勵同人，淮安詩復盛，後學能詩者半出其門，繼往開來，有功於詩教，不可泯也。與飲牛叟虞山逸民同刻秋心詩，與化李小有長科序之，先生世居新城，戊子以後，故居爲牛馬洩勃之場，卜居河北，不避風雨，詩益高古，著有渡河集，邱曙戒等副梓行之。序云：「先生怨尤不形於色，愁嘆不見於聲，與物無忤，絕口不及理亂。惟虞山再彭賤兄弟望社諸子，益相砥礪，飲酒賦詩，與之往還而已。」又有焚餘草鼠餘草等詩，邑志文苑有傳，子宏疏字不器，諸生後改名窳，亦以詩酒自娛，姪宏遠字夢菴，諸生著有偶草一卷。」

又云：

『閻修齡字再彭，號容菴，別號飲牛叟，大參礪楚先生子，崇禎乙亥諸生，明末落籍，遯蹟白馬湖濱，名其居曰一蒲菴。同時如李楷杜濬傅山王猷定魏禧閻爾梅輩，過淮皆下榻焉。時人稱盛。又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爲世外交，朝夕行吟，結望社相倡和。其詩高潔無煙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紅鷗亭詞行世。郡邑志皆有傳。魏叔子稱其平生慎檢，特以詩名。趙飴山稱其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王山史稱其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爲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舊刻有兌閣遺徽，悼丁孺人而作；又有青溪怨，感青姬而作。詞語悽婉，一時和者如雲，後皆散佚。先生家世鹽筴，獨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品誠不可及已。』

望社的集會，本不爲世所注意，人知道的很少。見於載記裏面，僅茶餘客話一條。阮癸生茶餘客話云：

『陳碧涵先生，爲望社名諸生，專精三禮之學。淮士治禮經者多從之游。與階六黃門爲兄弟行，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按碧涵先生名美典，順治戊戌進士，官山東沂水。』

可見這社裏面以三禮注疏之學爲尙的，因此開出來閻若璩考古一派。後來李元庚得詩苑天

聽集首有校勘姓氏一卷，凡數百人，末列望社姓氏計三十人，李氏爲摛輯成望社姓氏考。載國粹學報第七十一期，及小方壺齋叢書，他列的人名，有李挺秀，黃申，靳應聲，郭爲珙，張璵若，沃起龍，卞爲鯨，胡從中，嵇宗孟，陳台孫，張鎮世，沃起鳳，潘取臨，程涑，張養重，閻修齡，張新標，楊方，陸求可，徐轉迅，陳穀駿，程淞，馬駿，趙朗，李孫偉，張新棟，倪之煌，邱象升，邱象隨，閻若璩等人。我很疑心的那時萬年少壽祺，也在淮上，爲什麼沒有把他列入？末附李鍾駿跋云：

『吾淮張靳諸老，與同志立望社，名幾與吳中埒，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亦祇里中人士，風雨晨夕，飲酒賦詩，各行其抑鬱不平之氣，以追古之作者，非有裁量人物，譏刺得失，故不致如婁東之貽禍。』

大概社中人物，放情詩酒，不談國事。雖然無赫赫之名，也沒有遭了奇禍，因此望社也就湮沒無聞了。

十一 浙中諸社附閩中諸社

浙中的社局，我們可分爲浙西浙東兩派。浙西杭州等處，還承著三吳的餘鉢，詩酒吟詠，或從事禪悅，不脫三吳頹唐的風氣；浙東寧波一帶的社局，氣象慷慨，勇於敢爲，與浙西的風氣便不同了。其他浙中諸處，和福建臺灣一帶，也有結社之事，不過範圍很小，因此把他們都綜合在一塊，附在後面。如今先述浙西諸社。

一 浙西諸社

杭州社局的成立，本來很早。計東吳祭酒書云：「應社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之本於小築，各二十餘年矣。時西泠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銘先生至京師，始與嚴子岸定交，最懽。」黃宗義南雷文案外卷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云：「因念昔日交游之爲選家者，吳門則張天如，楊維斗，許孟宏，江上則吳次尾，劉宗伯，武林前則嚴印持，聞子將，後則張天生，金沙則周介生，江右則艾千子，張爾公，閩則余廣之，陳道掌，一時爲天下所宗。」這可見武林的讀書

社，本與復社并駕齊驅的，後來纔參加了復社虎丘的大會。當讀書社之初立，本于嚴氏之小築社。當時餘杭嚴氏兄弟共有三人，長名調御字印持，次名武順字訥公，季名敕字無敕，都是很有才學，當時名作餘杭三嚴。他們兄弟三人，互相師友，立了一個小築社，嘉慶餘杭縣志武順傳云：

『兄弟自相師友，力追正始，擇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

那時外人也許加入，因此聞子將也加入了小築社。後來同里張秀初江道闇等又辦了一個讀書社，聞氏和三嚴就與讀書社合併，同加入復社。後來同里陸圻，繼讀書社又辦了登樓社。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杭州先有讀書社，偶自聞孝廉子將，張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餘杭三嚴，後乃入復社，而登樓社又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

讀書社的集會，黃宗羲撰鄭玄子述說得最詳細，茲把他的原文鈔錄於後。南雷文定四集卷二鄭玄子先生述云：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力學，江道闇浩之潔淨，虞大赤宗政仲皞宗瑤之孝友，馮儼公悰之深沈，鄭

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啓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胥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來，以爲嗚嚙。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鬨聲沸水，蕩舟露服，則又鬨然而笑。三峯開堂淨慈，一默爲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詆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揎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皜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皆往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邂逅秀初道閭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

又南雷文約卷二張仁庵墓誌銘云：

「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皞，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餐，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浙東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仙。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贊，非一閨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庵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僚，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寧。」

這可見讀書社會盛極於一時。他雖然不能像復社傳播這樣廣；但至少可與吳中慎交社相伯仲。近人朱倓女士著明季杭州讀書社考，定讀書社的社員共有二十四人，一聞啓祥，附弟啓楨，二張元，三馮延年，附子融，四嚴調御，五嚴武順，六嚴敕，附子津，七嚴渡，八嚴沅，附弟渤，九張岐然，十張芬，十一虞宗政，十二虞宗瑤，十三丁奇遇，十四馮懌，十五馮洽，十六江浩，十七江道信，十八顧有斐，十九卓八月，二十鄒質士，二十一鄒叔夏，二十二鄒鉉，外縣的像浙東的陸文虎，萬履安，江上沈壽民，梅朗三

等，皆行入社，就是黃宗義也一度參加。他常說：「余固社中人也。」不過黃宗義對於讀書社不很滿意，他說：「經生之學，不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爲何物。」（高古處墓志）他這些話很中當日社事的弊病。他又說：「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所網羅。」（陳夔獻墓誌）朱氏遂說入釋氏者，僅江道開、張秀初二人，非必全被釋氏所羅網。我看明季的遺老類放一派逃禪的頗多。這也不必爲讀書社諸君諱。朱氏又說黃宗義把小築社的首領錯認爲聞子將，其實明季的社局，並不是一個人所創辦，所以像慎交社本三宋所主辦。而蘇州府志誤爲吳兆寬，與黃宗義把三嚴所辦的小築社誤爲聞子將是同一樣的錯誤。這是明季文人的積習，只要作者與社中的朋友，那個最好，就說那個人辦的好了。

據朱倬說：小築社起於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左右，天啓（一六二七）始改爲讀書社。崇禎二五年（一六二九）纔加入了復社，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復社大會於虎丘，杭州登樓社諸子皆與其會，這時讀書社就改爲登樓社了，這些話是很對的。登樓社爲陸圻朱一是諸人所主辦，全祖望鮑琦亭集卷二十六陸麗京先生事略云：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

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先生與查繼佐、范驥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

朱一是字近修，海寧人，著有爲可堂集，集中有濮溪社集序和臨雲社集序，濮溪和臨雲皆是里中的社集，臨雲創於順治壬辰（一六五二）集邑中精妙凡十餘子，近修皆身與其役。後來又與陸麗京結登樓社，登樓社的人物，可以知道的僅此兩三個人。想他們結社未久，就遭了國變，因此社事也就中輟。南雷文案卷三，查逸遠墓誌銘，述杭州社事的變遷很詳細，可以見杭州社事的淵源，茲錄於后。查逸遠墓誌銘云：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繼讀書而起者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逮桑榆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子將印持、儼公、道闇、鯤庭，已登鬼錄；秀初去爲浮屠；麗京隱於醫肆；近修出而索遊，其餘亦零落略盡。一時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燁然若神人之少年，蔑視老生。不容託末契于其間。邂逅而得汪魏

美，徐蘭生，陸冰修，查逸修，湖山慘淡，天似傷我之孤零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海昌，猶幸與冰修逸遠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堤，指點夏蓋石鼓，在蒼茫間。歲丁巳，冰修入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交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矣。」

當時讀書社的領袖，江道闇，鄭玄子出了家，虞大赤虞仲皞故去以後，高克臨與鄒孝直劉雪符重結礪祿社。南雷文定卷二，高古處墓表云：

「府君諱克臨，字敬可，號古處……遷仁和……初道闇剃染爲僧，玄子變姓名去，大赤仲皞亦齋志以歿，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把茅河渚，與鄒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礪祿社，逍遙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君衝寒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休，不知所語云何也。山中盜起，移居北墅，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著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

這可以說是讀書社的支派了。浙東的社集除了杭州以外，海昌有觀社，是范文白驤和朱一是所主辦的。查東山年譜引海昌藝文志云：

「初海昌文社最盛，觀社十二子實主東南壇坫，今無能舉其姓名者矣。因借錄之。葛定遠辰嬰，葛定象大儀，葛定辰愛三，朱嘉徵岷，左朱昇方庵，朱一是近修，朱永康石盤，范驤文白，袁秣丹六，查詩繼二南，梁次辰天署，張華書乘。」

朱一是爲可堂集謝友招入社書云：

「僕小時讀書，甫脫口，粗曉拈管，卽從中能文十一人游，日月省試講評津津，厥後稍輟，僕乃肇啓觀社，始七人，繼十有六人，廣二十有六人，其後汜濫抑未已。」

那時龍山徐邈思沈聞大也有曉社之選。他們兩社意見本不相合，當查繼佐少年時候本與同里許效翁祝天孫，沈聞大，徐邈思，查毅齋，許楚白，許元昊，查魯生，許川翁，創爲月課，號十二翁，自爲風氣，與他社不同。到了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查繼佐自吳歸，欲平兩社意見，乃合兩社諸公之文，合歸于一，名曰旦社，他爲兩社選的文章，名之曰戒，他以爲凡與復社的人以多選爲榮，并且加以請託，繼佐痛戒此病，故名之曰戒。（據查東山年譜）繼佐字伊璜，國變後，取其名字偏旁，更名左尹非人，遭了莊氏獄案以後，他曾自己另纂明史名作罪惟錄，并有記魯監國的魯春秋等書，繼佐本來別具文學特長，所以他辦的社，也別樹一格了。

其他在嘉興硤石鎮有萍社。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云：

『沈眉生稱退山與羣從光繡蟄庵昭繡讓水爲錢氏三逸。蟄庵居嘉興之硤中，有萍社一集，山陰王遂東，天台陳木叔莅其盟。海寧則周璇青羊，郭濬彥深，查繼佐，方舟，吳維修，余常，邵鼎予，大嘉興李明嶽青來，王翊介人，王庭言遠，鄭雪舫濯師，秀水則陸鈿章公，蔣之翹楚穉，崇德則周九巖公飭，鄞則錢忠介肅樂，及蟄庵，與張石渠布衣嘉興並豫焉。沁水則張都督道濬深之，莆田則劉復公來；吳中則浮屠大晴枯雪，浮屠林璧竹悠；凡十九人。亂後出山者，獨言遠，亦禾中掌故也。石渠隱于醫，行蹤不出硤中，藥籠所入，取給朝夕，兼工繪事。有陶庵集，萍社諸公詩，多不載於竹垞選中。』

在平湖有忘機吟社，雪橋詩語卷三云：

『龍湫山人李潛夫（確）作忘機吟社，往來皆布衣有聲者。乍浦宋爾恒名減，明季諸生入社號覺非，嘗讀書陳山，有萬松臺讀易圖，潛夫爲之記。平湖錢澣薌有詩云：「石澗飛泉響翠岑，松臺遺趾久消沈，誅茅曾下高人榻，挂壁空思太古琴。離黍秋風懷故國，亂山名月見天心，卜居終負湖湘志，老去彌增感慨吟……」』

浙西的社事，名目繁多，鮑琦亭集外編卷十一錢蟄菴徵君述云：「硤中有澹鳴社，萍社，彝社；吳

中有遙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錢光緒）皆預焉。」這可見社名雖然有這樣多，但社中的人物彼此可以參加的。所以朱近修在杭州與陸圻辦了登樓社；他自己在海昌辦了觀社，一個人參與了好幾個社局，這是明季很普通的現象了。

二 浙東諸社

社事之在浙東，甬上爲勝，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句餘土音序：「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尙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沔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像李文胤辦的鑒湖社，黃宗義南雷文約卷一李杲堂墓誌云：

『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時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資。』

這不過普通的文會罷了，沒有甚麼參加社會的運動，我們暫且不去敘述他。我們先要知道的是浙東的學風和士氣，自從劉宗周倡證仁書院，提倡實踐之學，於是他的門人黃宗義更發揮而廣大之。宗義字太沖，餘姚人，是清初的大儒，當他少年時代，他的朋友陸文虎，萬履安和他兄弟黃宗炎都是一時的英材，很能提倡一時的風氣，所以餘姚，鄞縣，慈谿一般的人士，都受黃氏弟兄的影響。當

崇禎初年，逆黨初平，天下尙未大亂，吳中的社事，煞是鬧熱；但是東越的地方，空氣仍然不甚開通，因此陸文虎、萬履安和太沖兄弟願意把甬上人士，與吳中復社連合。南雷文約卷一云：「詩壇文社，三吳與淞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那時鄞縣諸生華夏、王家勤也在鄞縣倡立社盟。所以不久，他們都加入了復社，與大江以南的社事相應和。崇禎間東林諸孤南都開成立大會，和驅逐阮大鍼的防亂公揭都有黃宗義諸人的名字，因此東越的風氣，就慢慢的開通起來，而慈谿的社事尤爲發達。南雷文約卷一劉瑞當墓誌云：

『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簞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與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

太沖與陸文虎、萬履安尤爲要好，南雷文案卷四祭萬悔菴文云：

『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媼羹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

但是雖說好友云亡，而時局也就大變了。再想朋友團聚，醉酒徵歌，豈有那種機會！不久，南都失守，潞王常淪在杭州監國，不到三天，就投降了清廷，清兵眼看著就要渡錢塘江，甌越重地，旦夕不保，那些士大夫們，都是要「簞筩壺漿以迎王師」，三五個讀書的人，只有關起大門來，在那裏悲歎咨嗟，但是也沒有辦法，咳！現在有辦法了，你們猜有辦法的是誰，就是幾個書獃子。

那時鄞縣城裏，幾箇社盟的同志，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燾，毛聚奎等人，平素好高談闊論，當時的人，名作六狂生。他們聽見了清兵要渡錢塘江的話，見著時局糟到這步田地，我們實在義不容辭，非起義抗清不可。他們知道城內的紳士錢肅樂也是個好事之徒。那時肅樂正臥病在家，他們跑到他家裏去，告訴他要起義的話，肅樂聽了這些話，非常的感動，馬上就答應了他們。第二天就於城隍廟裏開會，不到一忽兒的工夫，老百姓聚集了不下好幾千人，老百姓都大聲疾呼說：

「何不就不就奉錢公起事！何不就不就奉錢公起事！」

老百姓這樣的叫著。一擁而進，就把錢公擁到巡按衙門的大堂上，請他起事。畢竟錢公就約會了方國安、王之仁等等的軍隊，封鎖了錢塘江，就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當時名作劃江之役。全祖望鮑琦亭集卷七錢公神道第二碑銘云：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卽令之葵知府事，以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燾，毛公聚奎和之。徧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卽所云六狂生者也。……宇燾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謹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綬視師。」

那時黃宗義宗炎，和慈谿馮京第等，也在黃竹浦起義，他們練的軍隊非常勇敢，名作世忠營。這事的發生，是在乙酉的冬天，但是到丙戌的六月裏，江上的兵就潰了，魯王漂泊海島，浙東不被清兵所下的，只有翁洲彈丸之地。（以上據小腆紀傳）那時浙東的士大夫以至軍民人等都倦懷故國，依巖結寨，義兵四起，由寧波，紹興，以至台州處州，山寨不知結了多少義兵，那時山寨的義兵以張煌

言，李長祥，大蘭寨主王翊，最爲強盛。結埼亭外集卷四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云：

『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至于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王翊）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

山寨的勢力，既然這樣的強盛，錢肅樂就趁著這個機會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駐閩的軍隊到浙東告急，鄞縣的華夏，王家勤，屠獻宸等借著山寨和翁州黃斌卿的勢力，請他們來攻鄞，他們可以當內應，但是辦事不密，爲奸人謝三賓所告訴，把他們都下了監獄，當時稱爲翻城之役，名他們爲五君子。

這時清廷，看著浙江的義師，實在的利害，就用招撫的方法，恩威并用，一般無恥的人，就投降了清朝，山寨的義兵頓去了勢力。黃宗義的世忠營，被清兵所破。宗炎和馮京第都被清兵所擒，幸虧高斗魁想出了計策，纔在法場上把宗炎救出來，宗炎的世忠營，就歸到王翊的軍隊裏去了。不久，王翊

也爲清兵所執，被害。那時六狂生中健在的只有陸宇燝了。他看見蓋世的英雄，爲清兵所殺，他心中極爲難過，他把王翊的頭盜出來，每年的寒食，悄悄的取出王公的頭來，把酒祭奠，這是怎樣痛快的事呵！董沛鄞縣志人物十五云：

『翊敗梟首甬之城闕，宇燝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頭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中。問其人曰：吾漁人毛明山也。曾以卒伍事王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宇燝相與流涕，詣江漢計之，漢者錢肅樂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雜沓，漢紅笠握刀，登城遊戲，至梟懸所，問守卒者頭爲誰？卒以翊對。漢佯怒曰：「嘻！吾怨家也。」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宇燝已預立城下，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黃宗義撰墓志）宇燝得首藏書櫃中，襲之以錦。（全祖望撰王翊墓碑）每年寒食，密出其首，以一卮祭之。（全撰葦翁墓誌）越十二年，而家人無知者。（南天痕）迨宇燝以海上事起，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因棄之。既去，家人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宇燝弟宇燦哭曰：此王侍郎之首也。乃束蒲爲身，葬之城北馬公橋下。（王翊墓碑）那時山寨的義師，風雲四散，魯王也失去了勢力，投奔了鄭成功，浙東一土，已無可爲力之地，回想昔桴鼓相應，與復社成社相倡和亦不可復得，那些明季的志士，只有在荒江老屋之中，遇見幾個

同志結起一個詩社，作楚囚對吟；或者作點秘密工作，以冀興復於萬一，還有些頹放的人，就作了和尚。像明季遺民周唯一，他曾一度到剡源當和尚，去了頭髮，作了一箇髮冢，他作一箇銘非常的好，他說：

『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惟鳥石依依，可無弔客。』（南雷文約卷一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這是何等的淒涼呀！我們再敘述那一般志士，像黃宗羲本是最勇敢的人，魯王覆滅以後，連遭名捕，他的兄弟黃宗炎死而復生，他的最好朋友萬履安，陸文虎也都早早故去，他只有跑到語溪慈谿甬上重新講學。他在甬上最久，對於甬上的感情，特別的好，所以他在甬上立了證人書院，萬履安的兒子斯大，斯弟都從他讀書，甬上的人物從他讀書的很多，成了一時風氣。後來他的學生陳夔獻、陳錫嘏等創立了講經會。南雷文約卷一 陳夔獻墓誌銘云：

『丁未戊申（康熙六七年）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又陳錫嘏墓誌銘云：

『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

閔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

那些六狂生，五君子之流，像華夏王家勤在崇禎年間本來從事社盟，與復社成社相應，國變後就奔走國事，不預社盟。及至事無可爲，或者投老窮荒，或者新自獄出，在于悵無聊之中，只得立起了詩社，在鄞上最著名的，共有四個：就是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鮎埼亭集外編卷六湖上社老董先生墓版文云：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遯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字燦，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丘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臯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字泰，杲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端卿倪先生爰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字燦，曉山董先生劍鏐，天益葉先

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喬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鉞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尙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

除了那四社之外，林時躍辦的南湖九子，又名梓鄉耆會，預選很嚴，所以只有九個人。其他還有鶴山七子之會。董沛鄞縣志人物十四云：

『林時躍字遐舉，號荔堂，雅負志節，受業于劉宗周，又受學于黃道周，歸而與華夏王家勤爲講社，所稱鶴山七子者也。』

毛聚奎在庚寅辛卯間，與吳于蕃，管道復，汪伯徵，倪端木，邗上周雪山爲社，見鮎埼亭集卷二十。七毛戶部傳，可惜他的社名，已不可得見了。

余生生雖然是甬上的寓公，但他最好事，余氏有借鑑樓，他們常在那裏社集；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余生生借鑑樓記云：

『鄞之西湖，以賀祕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入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

之世家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僦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間樂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正菴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箋往復，朝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曰，四明余裔，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尤困，以其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啓是樓而居之，嘗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于淒風寒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

湖上諸社以外，還有全美閣的棄繻社，結埼亭外編卷八族祖葦翁先生墓誌云：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國難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劍鏐；周氏則尙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燾，字燦；李氏則尙書康先孫振璣，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棧，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

寓，亦願入社。謝昌元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棧以部曹爲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宇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禍自降其節。己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屏履，則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間，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宇燭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

諸君不要以爲明季志士，僅僅楚囚對吟，就算了事，他們一遇見機會，仍將還是想恢復神京。我拿山陰祁班孫通海案作一箇例子，山陰祁氏淡生堂是浙東藏書的名家，陳繼儒撰祁承璩淡生堂集序說：「公初有合轍社而通經學；有讀史社而通史學。」我們雖然找不到他們結社的事情，但他們那樣激昂慷慨，和甬上諸子是同應當注意的。鮚埼亭集卷十四祁六公子墓碣銘云：

『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復壁大隧，莫能詰也。

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爲毫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溪娃以薦之；又發淡生堂王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茗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賄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寧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盡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我因此間者汝也！』……」

這可見他們祕密工作的情形了。

三 附閩中諸社

閩中的社事，黃宗義云：「閩則余賡之陳道掌，余陳所辦的社雖然不可攷，但閩中社局，可分福

州漳州兩派，福州的社事有曹學佺所創的石倉園社和閩風樓社。徐鼐小腆記傳卷二十六云：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官南京戶部郎中，以誣闕得罪，崇禎初起廣西副使，不赴，著書。所居石倉園中，結社談讌，著有十二代詩選，石倉全集，閩人士以爲歸。』

其時閩中還有八郡文社，小腆記傳卷十七云：

『林逢經字守一，逢平字守衡，閩之長樂人，兄弟切劘，相師友，以文雄一時。逢經性剛急，或面摘人過，逢平性沖和，閩中建文社，八郡人士悉集西湖之荷亭，二林領袖之。從逢平問難者數十人，從逢經十餘人而已……』

漳州的社事，首推鄭亦鄒主辦的南屏文社，亦鄒著有明季遂志錄，已失傳了。陳壽祺東越儒林後傳云：

『鄭亦鄒字居仲，漳州海澄人，順治十三年舉人，澹于仕進，未幾，乞假歸，結廬白雲之麓，爲南屏文社，學者自遠至。』

重纂福建通志云：

『郡中文社之盛，有南屏，世罕知之，南屏者，鄭白麓亦鄒居石溪時所主倡也，與會常三百餘

人。鄭鶴齋溥有詩憶石溪簡廬正則云：「憶昔南屏會風雨，白麓先生實鼓舞，一時雲集三百人，燁燁英資動眉宇。文風振起八代衰，簡約清華與奇古。」

同時漳州還有元雲詩社，結社於紫芝山麓，同社的蔣孟育王志遠林茂桂等數人。其他還有陳价夫辦的芝山詩社，陳學海辦的三山吟社，這都與社會沒有什麼關係，我所以不詳舉了。

不過明季士大夫，他看見國是淪亡，只有臺灣鄭氏，還打著明代的旗號，他們都跑到臺灣去，求一線的生機，所以徐孚遠在臺灣有海外幾社。還有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鄞縣人，同與畫江之役，後來跑到臺灣作客三十多年，看見鄭氏三世的盛衰，清康熙間姚啓聖得了臺灣，光文尚住在臺灣，啓聖請他回鄞，但光文終久沒有投降清朝，他在臺灣結有福臺新詠社。鮎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僕傳云：

「閩督姚啓聖招，公辭之，啓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弈丹，吳淞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于諸羅，葬于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

十二 粵中諸社

廣東地方雖然僻遠，但是文化極爲倡明，在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等人，以文章聲氣，與江南復社相應和。在廣東的社事，我們知道的，有陳子壯的南園詩社，屈大均的西園詩社，黃登、探梅詩社，和僧函昰的淨社，僧函可在瀋陽結的冰天詩社。

一 南園詩社

廣東南海地方，本來就有南園詩社，崇禎間陳子壯重爲修復，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南海人，萬曆己未進士，是明末極有名的文人。崇禎九年以與時相溫體仁不合，得罪回家，就與黎遂球等重修南園社。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附陳文忠公行狀云：

「公既歸，闢雲淙別墅于城北白雲山中，寄情詩酒，復修南園舊社。一時諸名流，區啓圖、名懷瑞、曾息庵、名道唯、高見庵、名寶明、黃石傭、名聖年、黎洞石、名邦城、謝雪航、名長文、蘇裕宗、名興裔、梁紀石、名佑達、區叔永、名懷年、黎美周、名遂球，及公季弟名子升，共十二人，稱南園後勁，各有詩集行

世。遂球番禺人，執贄門下，師事唯謹，公亦雅愛重之，師弟二人，往往於月夕花朝，談及時事，輒歔歔流涕，人莫知之也。」

黎美周和陳子升，都很有文名，美周賦的黃牡丹詩，嘗爲時人所稱頌。那時南園詩社的文名四溢，加入詩社的很多。因此南園十二子的人名記載也不一樣；而南海羊城等處素來是繁華之地，所以集會的時候，非常的熱鬧，會日必以歌妓侑酒，這種風味，是不減於白下的社盟，粵東遺民錄卷二云：

『崇禎己卯（歐）主遇與陳子壯，子升，兄弟及從兄必元，區懷瑞，懷年兄弟，黎遂球，黎邦城，黃聖年，黃季恆，徐棻，僧通岸等十二人，修復南園舊社，期不常會。會日有歌妓侑酒，後吳越江浙閩中諸名流亦來入社，遂極時彥之盛。』

他們社集，雖然繁盛，但是不久，南北二都相繼失守，在永曆元年丁亥，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在廣東九江鄉起兵，與永曆帝相接應。但是被李成棟所敗，都殉了難。南園詩社，就無形停頓，三位烈士之中，只餘下了子壯的兄弟子升，和邦彥之子恭尹。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子，順德人，邦彥被難時候，恭尹剛十七歲，由父友湛粹，把恭尹藏在複壁裏，纔免於難。恭尹少有文名，頗有恢復之志，既至永曆帝

被難，他看事無可爲，回到順德，與何絳，何衡，梁璉，陶璜同游，時稱北田五子。（見粵東遺民傳）後來朱彝尊，王士禛，趙執信先後游粵，俱與訂交，世以其詩與梁佩蘭，屈大均并稱嶺南三大家，恭尹聲望甚高，雖是降志辱身，一般的人士尙能原諒他的苦衷，自恭尹死後，南園的遺風，也就絕響了。

二 西園詩社及其他諸社

西園詩社爲屈大均王邦畿所主辦，粵東遺民傳卷一云：

『屈大均原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己丑父歿，削髮爲僧，事函是于雷峯，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名所居曰死菴，復取永曆錢一枚，以黃絲繫之，貯以黃錦，佩肘間，以示不忘。時亂後多蜚語，因與同里諸子爲西園詩社。』

大均金堡均爲清廷所最忌的人，清乾隆間還有發掘南京雨花臺大均衣冠冢案，詳清代文字獄檔。其他粵中的社事，如黃登，番禺人，晚開黃村探梅詩社，延梁佩蘭主衡社詩。陳虬起番禺人，少從蕭奕輔，梁祐達，黎邦城，區懷年等結社于芳草精舍，感傷時事，抑鬱之氣，時露于唱和間。楊晉字子書，號二雪，香山人，諸生，與黎遂球，張家玉，梁朝鐘結詩社于白雲山寺，稱嶺南四子。（以上均見粵東遺民傳）這些事均可備粵中的掌故。

三 淨社及冰天詩社

我們要注意的，是函是和函可，他們雖然是粵中兩個和尚，但的確是粵中的兩個怪傑。函是字麗中，一字天然，番禺人，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師，年二十，中崇禎癸酉舉人，甲戌會進士回來，就厭棄了世俗，從黃巖道獨削髮，釋名函是。說起來道獨也是南海最有名的和尚，他二十九歲時候入博山參無異禪師，得其傳爲曹洞三十二傳法嗣。函是到道獨那裏去，道獨就與他偈說：

『風旛一領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

函是領受了他的大法，就在歸宗寺當了和尚，那時博羅人韓宗駮也頂禮道獨爲師，入這山下髮；更名函可，因此函是函可就成了最要好的師兄弟。

函是少年時候，和番禺大和尚二嚴，俗姓名李雲龍與雲龍的兒子李雲子，給淨社於天關，後來雲子也從了函是當和尚，法名今从。

函是雖作了和尚，但他并不忘心國事，對於明末的遺老，和死節之士，他尤爲特別注意，粵東遺民傳云：「……函是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以故從之游者，每于死生去就多受其益。」他對於故國的興亡，未嘗不惓惓於懷，所以像張家玉陳邦彥的死節，他都作詩哀悼他們。因此那一般的

名流像屈大均、陸圻等都投到他的門下充當弟子，那時永曆朝的名臣金堡，以直節聞於一時，他被陳邦傳排擠之後，廷杖幾乎折斷了脛骨，他也跑到函是門下，皈依空門。函是偏偏不留他，後來叫他當了一名火夫，受盡了折磨，化除了他的躁氣，纔傳給大法。這是在明季歷史上最有趣的故事。粵東遺民傳云：

「久之，及廣州再破，桂王西奔。後戎政尙書西安劉遠生，商丘伯祥侯性，都憲公安袁彭年，憲副泉州何運亮輩，皆參禮函是，或乞賜法名爲居士；而給練仁和金堡，以直節箸，自謫清浪衛，時已爲僧，及禮函是，易名今釋，爲之滌器廚下，隆冬龜手不廢服勤。後創丹霞名利，復迎函是爲主法，函是遂付堡大法爲第三法嗣。大學士鄧州李永茂之弟儀部充茂既捨其丹霞舊宅爲寺，復祝髮禮函是，名今地。中丞西安劉湘客亦事函是。薙髮於雷峯，號思圓。當時遺臣流寓粵東者，多依函是，以雷峯爲質的。南豐湯來賀理學家也，先在粵海總制時，心慕函是，後再來粵訪之芥庵，問儒佛異同之旨。杭州陸圻東南名宿也，出家十餘載，初名法龍，字誰庵，及入粵謁函是於丹霞，函是爲易名今竟，字與安，使掌書記，其爲人傾服如此。初函是以盛年孝廉出家，人頗怪之。及時移鼎沸，搢紳遺老，多出其門，乃始服其先見……」

函是歷主了福州長慶，廬山歸宗，及海幢，丹霞，芥庵，華首，諸刹。他的弟子，全是今字排行，再傳弟子，用古字排行。皈依函是的很多，我把最有名的幾個高徒簡單列表於下：

函是嗣法表

釋名	別字	俗名	籍貫
今 吼	說 作	王 邦 俊	番 禺
今 種	一 靈	屈 大 均	番 禺
今 釋	性 因	金 堡	仁 和
今 地		李 充 茂	鄧 州
今 竟	與 安	陸 圻	杭 州
今 音	梵 音	曾 起 霖	番 禺
今 沼	鐵 機	曾 暉	番 禺
今 葉	開 五 居士	王 瑯	番 禺

古	若	若	蓮	瑯	子	鎮	番	禺
今	楸	鄴	門	謝		楸	同	上
今	無			萬	氏	子	同	上
今	回	更	涉	王	鴻	暹	東	莞
今	覲	石	鑑	楊	大	進	新	會
今	如	眞	佛	黃	尙	源	新	會
今	从	淨	起	李	雲	子	番	禺
今	摩	訶	衍	曾	琮	起莘子	番	禺
今	忤	高	齋	袁	彭	年	公	安

金堡既得了大法，主持丹霞，他仍不忘懷故國。堡著有徧行堂集，記載勝國的史事很多。大凡明季的遺老的著述，都有內集和外集的分別：內集是記載不相干的事情；他們把憤慨的文章都記載在外集裏面。金堡的徧行堂集，如今我們看見的，全是用藏經式的板心來刻，用心已經很深遠了，但

不幸到乾隆四十年，就有金堡所著徧行堂集獄案發生。葉廷誼鵬陂漁話卷二附記徧行堂集事云：

「吾鄉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廚，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啓視，僧不能阻。啓廚得一冊，皆謗本朝語，則明臣金堡謫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慫恿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

此條未免說得過甚，清乾隆間僅燬其書版，寺仍存在。清代文字獄檔記其事甚詳。

我們再說到函可，函可字祖心，號剩人，博羅人，韓日續之子。他自經甲申以後，來到金陵，未幾弘光北狩，他看見很不平，作一部私史，詆謗清朝，就被清兵擒住，送到北京，可以說清初最早的文字獄。函可到了北京，因減死得遣戍瀋陽，他在瀋陽與遣戍的流人左懋泰等結了一個冰天詩社。粵東遺民傳云：

「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聞福王立，乙酉以請藏經金陵，居江寧顧夢游樓上，值國再變，親見諸死事臣，紀爲私史，城邏發焉。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絕而復甦者屢。但曰某一自爲，夾木

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觀者皆驚顧咋指，歎爲有道。旋囚於滿婦張氏，張頂禮之。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日纘門下士也，以避嫌不爲定獄，遂械送京師。張告曰：「師不擇于字，故禍至此，師生無論好字醜字，毋更著筆。」函可爲悚然，然不能改也。至京下刑部獄，得減戍瀋陽。無何函可弟宗麟宗驪宗驪以抗節死。叔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亢以起義戰敗死，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宗驪婦以不食，宗驪婦以飲刃皆死。其僕從婢媵亦多從死者。函可每得家書卽流涕被面，痛定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首。如云：「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云：「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氣。」其痛傷人倫之變，故國之亡，雖居世外，每以渙忍苟全，不得死于國家，見諸公地下爲憾。時譴謫諸臣，若萊陽左懋秦，霑化李呈祥，壽光魏琯，定州郝浴，泰興季開生，及李龍衰，陳心簡輩，始以義節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爲法交。函可因招諸人爲冰天詩社，凡三十三人，自稱榼捶和尚，其稱北里先生者卽懋秦也。」

那時函是聽見函可在瀋陽，就派他徒弟今無到瀋陽，通問消息。粵東遺民傳云：

『先是函是開法嶺南，諸遺老多從難度。聞函可住瀋陽，因遣其徒今無通問，而函可所度弟子，今育，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等皆江南人，由是兩家弟子分處南北。』

彰了。
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在遭戍之中，仍是不忘故國，這可與吳漢槎在寧古塔結的詩社，相得益

十三 餘論

我們看浙東，福建，廣東諸社，都與江南復社互通聲氣，可以知道科舉的勢力，他能吸引全國的人士，作一致運動；其初他們並沒有想到拿結社的事來作政治和革命事業，得了這樣偉大的結果；但到後來就不免有「黨同伐異，純盜虛聲」的流弊發生出來。因此當時人士，就有感覺不滿的意思，黃宗羲說：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儔，鄴儔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南雷文約卷一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苟能分句讀，習字義就可以入社，這入社不是太容易了麼？朱一是他批評黨社的壞處說得更爲痛快，爲可堂集謝友人招入社書云：

「蓋野之立社，卽朝之樹黨也，足下不睹東林之害乎？萬曆中一二大君子研講道術，標立崖

畔，爰別異同。其後同同相扶，異異交擊，有好惡而無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矯激，人用偏私。始則正人開端，繼乃邪正參引，後且邪人蔽匿，而百不一正焉。卽正人不爲邪用者，幾何矣。道術流而意氣，意氣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貨賂，狐城鼠社，蔓引茹連，罔止行私，萬端一例。遂致事體盡壞，國勢淩夷，局改時移，垣墮石破，害深河北之賊，罪浮東海之波。僕每觀世務，溯禍源，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先朝君子也。吾鄉有高識者，謂僕曰：「中國之大，億兆之衆，獨無一物。」僕駭詰之曰：「人心耳。」爲之發矇。嗚呼！先朝一二大君子，講學明道，其流乃至於無心，豈止老莊變而申韓，荀卿之禍，沿爲李斯相暴秦哉。今日之事，尤多駭異，朝之黨，援社爲重；下之社，丐黨爲榮。官人儒生，忘年釋分，口言聲氣，刺列社盟。公卿及處士連交，有司與部民接袂，橫議朝政，要譽貴人，誼譁競逐，逝波無砥，顛倒淪亂，蹶張滋甚。不惟漢衰黨錮，召亂黃巾；降至唐季清流，禍投白馬，談之變色，聽乃寒心。僕躬在橫流，鑒晰極弊，移風易尚，志有未能，推波助瀾，義所不出。足下以出塵之上才，樹特立之矯節，古堪尙友，歸有餘師；亦何必置酒張筵，鳩羣合類，囂囂譏諂，而復謂之求益哉。」

這結社已經到了崩潰的時期，縱然清廷不禁止他，他們裏面也要起了變化。後來社盟的結局，由公開而漸趨於祕密，那更遭清廷的注目，因此在順治九年，由禮部題奏，立條約八款，頒刻學宮，更

立新臥碑，內第八款云：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佚名撰松下雜鈔卷二）

到了順治十七年，由禮科給事中楊雍建的啓奏，就有禁社盟的事情發生。楊雍建黃門奏疏卷上嚴禁社盟疏云：

『禮科右給事中楊雍建謹題爲嚴禁社盟陋習，以破朋黨之根事。臣聞朋黨之害，每始於草野而漸中於朝寧，蓋在野既多類聚之私，而服官必有黨援之弊。如明季仕途，分立門戶，意見橫生。其時社事孔熾，士子若狂，如復社之類，凡一盟會動輒數千人，標榜爲高，無不通名當事；而縉紳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廣樹聲援。朝野之間，人皆自爲：於是排擠報復之端起，而國事遂不可問矣。我皇上鑒前之弊，特諭臣子當砥礪品行，奉法盡職，不可因事疑揣，致開黨與之漸。如明末羣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大哉王言，所以擴公忠之益，塞比私之路，大小臣工，孰敢不洗滌肺腸，恪修職業，以仰副睿懷者。臣竊以爲拔本塞源之道，在于嚴禁社盟；苟社盟之陋習未除，則黨與未可得而化也。臣聞社盟之習，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爲尤甚。蓋其念始于好名，而其實因之植黨：

於是家稱社長，人號盟翁；質鬼神以定交，假詩文而要譽。刻姓氏則盈千累百，訂宴會則浹日連旬。大抵涉筆成文，便爭誇乎壇坫；其或片言未合，思構釁於戈矛；彼此之見既分，朋比之念愈切；相習成風，漸不可長。又有不肖之徒，飾其虛聲，結交有司，把持衙門，關說公事，此士風所以日壞，而人心由之不正也。臣見福按李時茂惡棍結黨立社，地方受害難堪。一疏內稱福州會闈有社黨，各分門戶，如至德、北林、西藍等社，其社首陳子佳等結衆歛金，橫行城市，尋非啓釁，攘臂爭雄，列款特參，奉旨著該撫行提嚴究追擬。凡此惡習，皆始於儒生，而流及市井小人，尤而效之者也。臣伏讀欽飭學政全書有云：「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制罪。」煌煌功令，非不明肅；但恐學臣視爲故套，士子積習難更，若不力行嚴禁，何以防漸杜微。請敕該部再爲申嚴行該學道，實心奉行，約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來，亦不許仍用社盟字樣，違者治罪。倘學臣奉行不力，聽科道糾參，二併處治，則陋習除而朋黨之根立破。朝廷大公主正之意，于此見矣。」

疏上以後，就奉到順治十七年正月十五日題。二月十三日奉旨云：

「士習不端，結訂社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爲可惡，著嚴行禁止。以後再有這等

的各該學臣卽行革職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這些話，全是對著當日的社局，針針而發，因此社盟這件事，就漸漸的斂跡。社盟的稱號，也慢慢的自己改變了。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二云：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雖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舂。」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

這社盟在表面似乎是被禁止，而實際上，仍有結社的痕跡存在。於是順治以後的社局就發生了三種變化：

(一) 由結社而變爲依巖結寨的故事。如浙江洞主的義兵，皖鄂爲岩主的義兵，東南海瀝島主的義兵。在湖北有斬黃四十八的義旅，在安徽有英霍的結寨，如浙東大嵐洞主王翊義旅甫平，到康熙四十七年又有大嵐再變，託明思宗皇子興戎（以上均據王傑心斬黃四十八岩記事。）明季遺民這樣倔強不羣的態度，與後來太平天國的興起很有關係。

(二) 由結社而變爲秘密結會。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第十二章謂：「鄭氏在臺灣不忘故主，

仍奉永曆年號，而陳永華尤爲苦心孤詣，創立秘密團體天地會於臺灣，四出傳播，反清復明思想。天地會又名洪門會。陶成章教會源流考云：「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爲名，指天爲父，指地爲母，故名天地會，始倡者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陳近南就是陳永華，其他若沈光文之臺灣結社，也與秘密結社性質略同，因此這秘密結合，發生兩種影響：（甲）明季的志士，奔走到海外去，謀求恢復，這與吾國到臺灣和南洋羣島的殖民極有關係；（乙）秘密的結社，流傳成普通流行的秘密教門，在下層社會中，儼然潛伏著很大的勢力。是在近代社會史上是很重要的問題。

（三）社盟雖然禁止，但是一般文人騷客，詩酒流連。陳壽祺東越儒林後傳云：『林衡初名璣，字義儒，閩縣學生，康熙癸未甲申間與郡守顧焯，都督李涵同郡陳祖虞等四十餘人結詩社於平遠臺爲平遠堂集。』後來乾隆年間，全祖望自京師回到鄞縣，與陳南阜，錢芑庭，李甘谷等立眞率社（見全祖望句餘土音序）這可以說是社事的餘波了。

在本篇內祇述到康乾間詩酒流連結社的尾聲爲止，至於依巖結寨，或秘密的結合，這應當專題來研究，不在本章範圍之內，所以不述及了。

附錄一

明季奴變考

一 敘論

明季奴變，這一件事，正史上談到的很少，就是許多史家也不注意。先師梁任公先生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階級下說：「奴變一役偏及江南各省，此事惟聞諸故老，知縉紳之家，罹禍最烈。然事之始末，官私文書紀載極稀，吾今不能言其情形，並其年月亦不能舉出。」但是在他的書內述說的有清雍正時解放的徽州的伴僮，寧國的世僕。這世僕的制度，與奴變很有關係。皇朝通考卷十九五年諭：「江南徽州府有伴僮，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其籍業與樂戶惰民同。甚至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可悉開除爲民。」梁任公先生又說：「吾鄉及附近各鄉皆有所謂世僕者；其在吾鄉者爲龔姓，其人爲

吾梁姓之公僕，問其來由，正如雍正諭所謂「僕役起自何時，茫然無考者。」其身分特異之點，則不得與梁姓通婚，鄰鄉良家亦無與通婚者，其婚姻皆限於各鄉之世僕等等。」世僕的事情，到了清代中葉，雖然看不見了；但是奴僕的階級制度和官家豪奴的專橫，就是到了民國，還是沒有革除淨盡。例如以我家來說罷。我原籍是武進人，謝氏是武進的望族，族中印有毗陵謝氏族譜不下數十冊，據太叔祖謝作霖先生需說：「族譜限制很嚴，印刷族譜的時節，必須事前報名，例如今年報名的九十人，那末至多印一百部，最大的原因是恐怕我家的僕人，頂名冒替，亂了家族的關係。」孟莚孫先生森又說：「吾鄉前清嘉道以前，在店鋪的門前，必有一個家人，戴著紅纓帽子，坐在櫃臺前面一個高凳上，來彈壓一切。」凡此種的瑣事，很引起我研究近代奴僕的制度和奴變的興趣。我的朋友陳守實先生本有一篇明清之際之史料登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三號上，其中有關於記載奴變的問題。陳君按輯的本來很用力了，似乎無須再事按輯，不過他對於奴變的原因，和奴變的情形，因為他是一篇筆記體裁，所以未詳細的討論；並且可以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因此我不憚煩的重為補輯疏證一下。當我按輯此項材料的時候，我常懷疑著，有三個問題：

(一) 爲什麼明代會發生奴僕的情勢？

(二) 明代賣身投靠，和豪奴放縱之風，與社會經濟上發生什麼關係？

(三) 奴變和索賣身契的事，是不是民族階級的運動？

我這篇文章，就依著以上三個問題的次序，來討論奴變的原委。至於我這幾個問題，皆是我所得到的材料，而發生了這幾項的假設，這幾個假設究竟對不對，還須公諸大家討論！

二 明代奴僕制度之所以發生

我對於明代「奴」的這個名稱，與其叫做「奴隸」不如叫做奴僕；因為「奴僕」是當時現成用的兩個字，見於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三，與「奴變」兩個字同是在當時專有的名詞。關於奴僕的記載，約有數事，我們羅列在下面：

(一) 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三奴僕條云：

『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又云：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賃雇募，如江北之例；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原注云：

「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

又云：

「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

（二）佚名撰研堂見聞雜記云：

「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爲奴，卽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贖之，卽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卽得因緣上下，累累起家爲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飢寒，更借託聲勢，外人不得輕相呵。卽有犯者，主人必極力衛扞，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

（三）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卷上明季縉紳田園之盛條云：

「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係門生故吏代爲經營，非盡出己資也。至於豪奴悍僕，倚勢橫行，里黨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計維投身門下，得與此輩水乳交融，且可憑爲城狐社鼠，由是一邑一鄉之地，挂名童僕者，什有二三，至國變後，猶然頤指氣使，輿情不服。試觀康熙壬寅（三年一六六二）金壇逆奴之變，縉紳罹禍最慘，物極必反，此亦其惡報歟！」

由上三種史料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蓄奴這件事到明代又轉盛了；江南的富豪蓄奴可以多至千人。至蓄奴的制度北人是雇募，南人是鬻賣，於是發生出了「賣身投靠」的事情，和「家人」的名稱。一個紳士人家可以養到一兩千個聽差的，這是在社會經濟上極大的問題。前人並沒有注意到這一件事情，就是黃汝成也沒有把「投靠」「家人」等名稱箋注出來，在我心中是一件很煩悶的事，現在把我流覽所及的材料，拿他來解剖一下：

第一蓄奴這件事，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在唐代有佃客，部曲的名稱，到宋代以後，幾乎看不見了。爲什麼到明代又有這樣的繁盛呢？我以爲由於元代異族之來侵。陶南村輟耕錄卷十七云：

「今蒙古色目人之威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

夫婦兩所生子孫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爲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眞臘風土記有一條，也說買奴的故事，文不具引。我們要知道明代買賣奴僕是承了元代的遺風，據明史上說：

『太祖以李善長等有大功人，賜卒百二十人爲從者曰奴軍；及年還鄉，命設百戶一人，流棄衛之，俾屯戍以食，賜以鐵冊，給以印，時謂鐵冊軍。』

這鐵冊軍固然不像後來所說的奴僕，但也可以說是蓄養家奴的發端。顧亭林所云：『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這家奴數百，是由元代養成的習慣，是很恰當的。到了永樂的時候，凡從建文不附燕兵的人，被害的戚屬，全淪爲樂戶奴籍，因此種種的原因，蓄奴在明代朝廷和民間已成一種風氣。

第二蓄奴在民間既成了風氣，爲什麼吳中爲勝，而北方反少呢？據顧亭林的解說，北方是雇募，南方是投獻。論理來應該南方的奴少，北方的奴多，至少也該一樣；爲何事實卻又相反？其中很有可以研究的價值。我以爲社會上發生了奇異的狀況，於社會經濟的背境，有必要的關係。我們翻開明史食貨志他說：「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我們考察明代的賦稅，據食貨志說：「洪武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但是「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由此看來，江浙出產最富，富戶尤多，安知沒有逃避的事，和湖廣河南一樣呢？我常將這件事情，與孟蘊孫先生談過，據他的回答，很可以證明這件事，他說：「清糧一事，殊非易易，在明代民人非依期納糧不可，但至人士一得科甲，便可不依期繳納，甚至不納糧而飛灑於百姓，在事實上固豪家爲上戶，貧民爲下戶，而征糧冊上，則適與相反，此律文所以有飛灑詭寄等罪名也。即以常州而論，鄉里與城市之租稅仍不一律，百姓非及時交納不可，但城市則可延至一年。如鄉間有士大夫之家，即將其所居之地，定案作爲城廂。如貴鄉羅野灣，即因貴族所在，而有半圖爲坊廂。清代賦役全書一切沿明制而來，此可推見明代之狀況矣。」

由他的解說，再拿歷史上的記載來比較，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四云：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爲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爲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爲勢家所有。」

趙氏僅述勢家所強迫，而不知明代投靠，大半出於情願。心史叢刊引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

「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

陸文聲之訐奏復社有：「三吳逋餉，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的話。又松江翁元升等參豪宦董其昌的摺子有云：

「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

這不但膏腴萬頃，連遊船也來投靠了。他們一般老百姓傾家敗產來投靠幹什麼？這不是士大夫階級，可以護庇他們，可以不交錢糧，可以爲虎作倀嗎？所以富人愈富，貧人愈貧，當奴僕的人越發

多了。因此我個更可以明白順治辛丑的奏銷案，他是專向著包攬錢糧的人而來的，所以探化不值半文錢了。投靠是奏銷案以前的事實，奏銷案因投靠而發生，此事一明，這兩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人既做了奴，則在社會上，已成了最低的階級，輩輩作奴，互相婚嫁，永世不能翻身，誠如董含三岡識略所說的：「江左風俗，凡奴婢子採芹者，皆從主姓，無少長悉以叔祖稱之，卽位望通顯，不敢抗行。」人只要做了奴，雖有才智，也無進展之地，這是怎樣不平等的事呀！

第三至於「投靠」和「家人」等名詞，研究起來，也很有興味，唐解元投身爲僕，偷娶秋香，載在蘇州府志，是一件趣事，一般的人們卻無此雅興。小說上說賣身投靠的事很多，事實靠不住，姑不具引，不過吳逆取亡錄上，記載一個投身的契約，我們不妨寫在下面，作一個契約的樣子。其文云：

「袖中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崑常言演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也。」

馮甦就是做劫灰錄的，這雖是一件滑稽的事情；然可以見賣身契的樣子。

「家人」這個名詞見於明史奸臣周延儒傳：

「四年（崇禎）春……所用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皆有私，時論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燕其廬，發其先壟，爲言官所糾，兄素儒冒錦衣籍授千戶。又用家人周文郁爲副總兵，益爲言者所詆。」

這家人未必是奴，但爲言者所詆，則非出身清白者可知，但身附顯官就可以作官了。明代還有「家丁」的名詞，家丁的制度是因營兵制度已壞之後纔興出來。李成梁守遼東，所用多係家丁。這遼家丁與明初的鐵冊軍差不多，與奴僕的制度不同。（註一）

（註一）孟純孫先生說：明代爲邊地都指揮世職者，皆有家丁，不但李成梁爲然，凡武職大員，家中役使之，例許撥類兵若干名。此風清代亦然，但稱役使兵丁，而無家丁之名，則以清興武職非世襲之故耳。明末兵不敷調，往往言官有請發家丁之奏，且謂家丁之訓練每優於類兵。其實養兵之費原出之國帑，但由國家准許將領占用之名數，則作爲家丁，遇戰事其赴敵之責任，較有輕重，認家丁應敵，略關主將之志願。邊衛養兵衆，故所撥家丁之額數多，邊將傳世久，故所屬家丁之勒定，明學論兵重視邊衛之家丁有以也。

由上文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明代的奴僕由於元代所遺傳下來的，明代的奴僕可分爲二類：一是雇募，二是投靠，就是清代大清律關於奴婢還有紅契白契之分。主人對於奴婢，或奴婢對於主人，

所犯的罪，待遇不能相同。可見賣身至清代還仍存在；不過沒有「遊船百艘，悉來投靠」的事罷了。

三 豪奴放縱的情形及奴變的主因

讀書的人，只要得了科第，自然有人來投靠，這是怎樣痛快的事情。所以一般士大夫階級的人們，不但家奴數百，並且家畜歌僮。在明代的士大夫的家裏，時常養了一班歌僮，在那裏徵歌逐曲，焦循的劇說裏說：「嘉隆間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這是在明代司空見慣的事情。可是樂極生悲，不久，就會有豪奴欺主，或招搖撞騙的事發生出來。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八四月條注云：

「明季縉紳，多收投靠，而世隸之邑幾無王民矣。然主勢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產，坑主寶財，轉獻新貴有勢，因而投牒與訟者，有司亦惟力是視而已。物極必反，是以顧六等一呼，從者蠅起，回憶情狀，毛髮悚然。」

這種奴勢制主的情勢，我們可以看到的：若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所說：「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縉紳爲賓主。」是奴僕顯然與主人抗衡了。後來奴僕不但與主人抗衡，而且主勢一衰，反投入豪富來害原來的主人。

像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奴婢部所說：安徽歙人吳養春的家奴吳榮因爲犯了罪，養春欲置之死地，吳榮反跑到北京，投魏忠賢門下充了一名錦衣，後來反把他主人坐贓六十萬，幾乎把他主人喪了命。像這樣的事，在明代中葉以後，是屢見不鮮的；縱然也有一兩個義僕，若尙書吳洪的家奴吳成，蘇州府志雜記上說他：「洪爲諸生時，赴舉南畿，成驅驢取值，以供旅費。」這是很少見的事情。由以上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明代奴僕盛衰的沿革，可以分成三個時期：有明的初年到明代的中葉嘉隆以後，是奴僕養成的時期。萬曆天啓以後，是奴僕豪縱的時期。明末清初是奴變的時期。我們不明白奴僕豪縱的情勢，我們就不能知道奴變之所以激成；現在舉幾個奴僕豪縱的例子來證明他們豪縱的階段，並可以知道養成奴變的原因。

（一）在一個大族之內，也有窮的，也有富的；在富家的奴僕，就瞧不起貧家的子弟。復社領袖張溥就受過他伯父家奴的欺辱；眉史氏復社紀略卷二云：

「張溥之父翊之，失權於其兄大司空輔之。輔之有僕陳鵬，過崑又從而搆之。鵬善筆劄，主人章奏書牘，皆出其手。崑長於聚斂，司空寵之甚；因此內外家政，事無大小，必由兩人。翊之以主分臨之，兩人益恚，至刺翊之，司空不察也。溥嚙血書壁曰：「不執仇奴，非人子也。」兩奴聞之笑曰：「場

蒲履兒何能爲，「以天如母本婢也。受先（張采）聞之，憤謂溥曰：「我二人日後苟得志，使兩奴得生蓋載者，非夫也。」歲丁卯受先舉於鄉，當樹棹楔未有八字（原文疑有誤）受先欲鋸去之曰：「是大類鼻孔，吳下鼻頭最壞事，其除之。」□與親友皆難之，云無此例，受先不能強曰：「吾有法於此，從前鼻向外，故奴多出外生事；向內或差，今卽不之去，鼻宜朝內不朝外。」故受先植楔木八字孔獨向內，其託志如此。及戊辰聯捷，作書約同年縉紳禁收投靠家人，吳下溥俗爲之一變云。」

又云：

『路振飛按婁東，溥言陳過二奴，下之崇明縣學，知縣顏魁登授意獄吏，暗斃之。振飛任滿，繼爲巡方者上虞祁彪佳……適兩張（張溥張采）治衙蠹，有奸胥董寅卿者，南贛撫軍陸文獻之僕也。爲庫吏時，侵盜錢糧，加派病民，兩張致意祁公立斃之杖下，太倉之害頓除云。』

吳偉業的文集裏面有一篇清河家法述，也記張溥受家奴恥辱的事，因爲於事實沒有關係，姑不具引了。

（二）仗主人的勢力，來欺壓百姓；就如錢謙益瞿式耜的家奴，來欺騙圖詐的事。張漢儒疏稿云：

一曰：「豪奴之害，三吳縉紳，豈無名節自矜，獨此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縱令豪奴陸德陸凡之張素軒……等結黨尋趁，或投獻釘封，或假命圖詐，或逼奪人房屋，或炙寫人子女，或百計千方，詐人錢財。及說事講銀，則曰家爺二千兩，或幾百兩，門幹幾百兩，書房幾十兩，講事者另要後手銀幾十兩，任其富戶大家，曲直未分，家貲洗蕩一空。至詐錢入手，奴則綾羅滿身，妻則金珠滿頭，在家膏粱美味；在外包婦買娼。一遇事露，將賄送主，發書護庇，縣官曲徇情面，輕輕了事，歎此無告之民，有不吸盡骨髓者無是理也。此民間之陰禍可斬也。」

（三）胥主投靠別家，而反欺害本主，卒釀事變的事情。例如董其昌的兒子董祖常，因為寵用了陸家投靠的家奴陳明，釀成民抄董其昌的家，房屋田產，放火燒失，擄掠一空。在明季很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沈炳巽權齋老人筆記云：

「董其昌登己丑進士，由館選授編修，歷官禮部尚書，仲子祖權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同里陸生者，先世有富僕，陸誅求無厭，僕乃投充祖權作紀綱，爲護身符。陸生復至需索如舊，祖權統狠僕攢毆之。次日陸生之兄率諸生登其堂，面討其罪，惶恐謝過乃已。又有范某者，其昌姻也，將此事演爲詞曲，被之絃管絲索，以授瞽者，令合城歌之。其昌聞之怒，執瞽者究曲所由來，瞽者以范對，范因

稱無有，乃共禱於郡神設誓焉。未幾范某死，范妻率僕數人造董訕罵。祖權擁諸狼僕，突出踞高坐，闔門執范妻及僕婦，裸其體辱之，髡其髮并及下體，兩股血下如雨。台城不平，羣鼓噪其門，約萬餘人，董家人登屋飛瓦，擲下擊諸人，諸人愈忿，亦登屋飛瓦，互相擊鬪，復有受害者，乘機縱火，焚其家，其昌盡室逃避，家業爲之一空。半載之後，方得寧息。」

民抄董宦事輯，祖權作祖常，祖權恐卽是祖常的筆誤。這件事鬧的很大，記載此事的書也很多。有一部書名民抄董宦事輯的，搜輯此事的材料很詳細；其中有一篇松江府生員翁元升，張復本等辯冤狀，記得很詳細，茲錄其要於後：

「松豪宦董其昌，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交結奄豎，已屢擯於朝紳，廣納苞苴，復見逐於楚士，殷鑒不遠，不思改轍。前人欲壑滋深，惟圖積金；後嗣丹青薄技，輒思壟斷利津。點畫微長，謂足雄視當路；古折柬日用數十張，無非關說公事；迎賓館月進八九次，要皆漁獵民膏。恃座主之尊，而干瀆不休，罔顧旁觀之清議；因門生之厚，而屬託無已，坐侵當局之大權。謀胡憲副之孫女爲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擴長生橋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遷；淫童女而采陰，干宇宙之大忌，造唱院以覓利，壞青浦之風聲。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納

叛主之奴，而世業遭其籍沒，尅減三倉之額，而軍士幾至脫巾。詐富民邱福銀千兩，而一人命也此償條爲彼償；（此事漕院已奏參鄭中尊，後復抄搶陷福得銀二百兩，其昌批揭寬之。）詐生員蔣士翹銀百兩，而一田產也，加價浮於原價。兼以惡孽董祖常一丁不識，濫竊儒巾，萬惡難書，謀充德行。倚藉父勢，玩藐官常，用刺賊陳明等爲爪牙，託幫棍施心旭（卽代董文出官者。）夏尙文（卽誣執陸兆芳者。）等爲耳目，打聽消息，包攬居閒；或褻服而入後堂，或更餘而進書帖，或供招已出而覆審，或罪名已定而潛移。又且招集打行，肆行詐害，溫飽之家，則掇債而盤摺其田房；膏粱之子，則糾賭而席卷其囊橐，囹圄怨氣沖霄，閭閻怨聲載道。他不具論，止論其凌虐同袍者，卽如青浦生員洪道泰以杯酒不從，灌馬糞於府門；（有卷在府。）金山衛生員陸調陽以遊園閉門，毀家資於白晝。（成訟被寢。）去歲九月間，復誘淫生員陸兆芳家使女綠英，臧獲簪計，遣奴二百餘人，二更時分，打進兆芳之內室，驚散其家人，擄掠其什物，以致合郡聞之不平，造爲黑白傳諸書。在其昌父子只宜自咎，以息謗端，何乃信讒而疑內戚，捉生員范景於庭，喝奴冒罵，逼與說書錢二同詭賭誓，羞憤成疾，不旬日而身死，景之母妻，恃託姻親，造門哭訴，揆之情理，豈曰非宜；況止隨三四婦女，寧有他圖。其昌父子不思自反，輒肆憑陵，毀橋於河，閉門毒打，將州守公之命妻，推委於溝壑，（卽景

母馮宜人）將給諫公之孫女，裂去其綾裳，（卽景妻龔氏，與其昌妻爲姊妹。）慘辱隨從之婦女，更不可言狀，大都「剝褲搗陰」四字，約而該矣。打後，大開重門，祖常南坐，對衆呼爲榜樣。復將諸婦昇入坐化庵中，泥塗滿面，上無蔽體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之布。觀者摩肩，人人指髮，咸謂董氏之惡，至此極矣！嗟此諸生，誰無罔極之愛！誰無狐兔之悲！以縉紳辱縉紳之妻，固鄉評所不齒；以生員辱生員之母，亦龔序所不容。桀紂之惡，至於炮烙，未至辱及仕門；官府之刑，非犯奸淫，原無概褫褫服，況龔氏實祖常母姨，而可淫刑以逞者乎？於是三月十五日，在城生員齊集明倫堂，候海防黃公祖，理刑吳公祖行香畢，跪稟平日虐儒數端，細陳本日辱范情狀，懇正祖常陳明之罪。（時范啓宋正在江陰告狀，）蒙黃吳二公祖，虛心傾聽，溫言慰諭；各拜謝散去，隨因縣學生員郁伯紳入府送札，稟拘陳明，蒙卽牌拘責監候審，合郡歡呼，幸白冤有日矣。不意當晚喧傳，范母已死，董奴聞之，慮范氏有登門哭打之事，遂招集打行吳龍等百餘人，連夜入宅防禦。十六日打行之徒，自負其勇，在門首耀武揚威，示莫敢犯；而觀者駢集不下萬人，壅塞街道，遂有拋磚撒糞，以逐之者，激怒衆心，而平日含冤之軍民，乘機而起，先毀陳明之居，外火方起，內火應之，而祖常祖源之宅，俱爲燼矣。祖和宅介其間，以斂怨未深，纖毫不動，誰謂烏合之民，漫無公道哉！

(四) 奴僕雖有特異之材，也不爲人所齒，董含三岡識略卷三云：

『余族叔襟海公有僕曰張福，幼有斷袖之愛；及長遂冒主姓，配寵婢以當爐爲業，生子雲孫，舉甲午鄉薦，聯捷南宮，慮不齒於衆，屢經主人門不入謁，襟海諸子象祖象功輩俱名士也，扼腕不平，率弟子毀其輿蓋，始釋之。雲孫含恨刻骨計圖抗主，其父堅執不從乃止。後復欲與主人爲難，父方臥病，呼雲孫諭之曰：「我受董氏恩不淺，今不能圖報，而屢思反噬，我死不瞑目矣。」雲孫咆哮罵曰：「老賊作如此事，至今被惡名，乃不蚤自爲計，反欲污我耶？」方啜茗，以甌擲父面，血流至踵，哽咽不能出一語，少頃氣塞而絕。……自是四方皆知此事，無與往還者，後宦粵西，迎降吳三桂，賊敗潛逃歸，憂懼得心疾死，識者以爲悖逆之報云。』

雲孫經主人之門，不入謁，和罵他父親爲老賊，固然不是。但董象祖要毀雲孫的輿蓋，辦的也太激烈。在宗法社會上，奴婢之子，和姨太太養的兒子，同爲人所賤不起。這種社會上遺傳下來的惡慣，牢不可破，使人無有自新之路，結果非激起變故不可。

由上四個例子看來，奴僕的猖獗，已達了極點，同時卑視奴僕的心理，也非常的濃厚，那時候的士大夫以蓄奴視爲當然，誰也沒想到有奴變這件事，更沒有想到適當解救的方法，偏偏復社的領

袖張溥他想做「解放奴僕」提高奴僕人格的運動，這是一樁很聰明的舉動；但以張天如的能力，能做思想界的領袖，能操縱當時的政權，欲提拔一個家僮張堯，卻完全失敗了。復社紀略卷四云：

「延陵世容有家僮張堯者，能文章，少受業於越自新，兩張收之爲弟子，主人不之許，使之供隸役，職鈔謄，堯恥之，避之南張所（張采）。延陵拘係其父母，南張爲請甚力，事雖解，而使供役如故。堯不能堪，舉家徙之武陵，吳來之處之客席。未幾，兩張使之入泮，吳江延陵控之當事，求正叛之罪，卒不勝。久之，兩張囑州守周仲澍攜來之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爲堯削隸籍。延陵壓於州父母，勉從之，而內不能平。時敏家法素嚴，僮僕千餘，深以此爲恥，而意無如之何。由此蓄怨復社久矣。文聲一見，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堯事兩張主之，故時敏啣受先甚於天如，乃曰：「相君（溫體仁）仇復社，參之正當其機……」」

張溥之爲張堯削隸籍，雖未必有大规模解放奴僕的計畫；但是這種獎擢人材，一視同仁的態度，是不可及的。可借天如僅僅爲解放一奴僕張堯，反引起陸文聲的訐奏，社事幾爲傾覆，可見社會上的惡勢力，是極不容易解除的。於是不久事機應時觸發，就有羣奴索契運動的暴起。

四 奴變的狀況

奴變發生的主因，並不是因為江南縉紳僑寓之多，和清兵南下，蹂躪地方，一般士大夫避難來南的緣故。他的主因，就是士大夫收投靠的過多，乘勢作福作威，來欺詐平民，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激起了民變；同時清兵南下，一時社會上，成了無統制的現象，一般刁奴乘勢起來索賈身契紙，以為藉此可以打破奴僕的階級；大者殺人放火，小者劫掠一空。在江南松江蘇州嘉定等處都有這種現象，就是山東也不免有這樣的空氣。這種事體的發生，像上章所說的，「民抄董其昌的家產」和文秉定陵注略卷九記：「萬曆四十四年，崑山鄉官周玄暉民變焚其家，」這都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因。就如陳君所引邵廷采思復堂集 祁世培傳：「崇禎間，山陰祁彪佳巡按蘇松，宜興陳氏家奴播虐，怨家刑牲焚廬發塚。公捕奴正法，盡追還所佔男女田房，奏奪陳氏父子官，遂治怨家之亂者，吳中稱為神君。」民間的情形這樣的騷動，一遇見外來的情勢，他們又安得不揭竿而起呢？

因此，我可以大膽的下一個定義：奴變發於清兵南下，在明崇禎十七年和清順治元年以後，在此以前的事都可以說是主因；在此以後的，都可以說是事實：像他們羣衆運動，索賈身原契，誠然是一種階級運動，這種運動，延及江浙各縣和山東的地方已成了社會上普遍的現象，在研究社會和

經濟史的人，是不可忽略的。

就這種事實，分析起來，也可以分爲二種：（一）是奴變，（二）是告訐，告訐的風氣，是奴變的餘波，如今先述說奴變：

（一）奴變，奴變這件事要以太倉鬧的最利害了。佚名撰研堂見聞雜記云：

『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爲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可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並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卽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爲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在主人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習井竈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衆，每日有數十人，鼓噪而行。羣人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如是數日而勢稍定。城中倡首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轉控上臺，而是時新定江南，惡一代之言不祥，斥之。自是氣稍沮，屬浦君舒（本州人）用事，恨其爲罪首，忽一夕，牽出斬之，而天下始快。迨吳撫臺至州，中金姓以亂奴控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復叛，而主僕之分始定。』

此舉爲索賣身契，與爲奴只許一代相統，頗有改革奴僕階級制度的運動。當時太倉家奴並有

烏龍會之組織，其蹂躪地方，爲禍尤烈。研堂見聞雜記云：

『五月十一日，大兵渡江之信方傳，吾鎮卽有鄉兵，卽無賴子之烏龍會也。自崇禎帝晏駕北都，信確，里有點桀者數人，收集黨羽，名烏龍會。雖市井賣菜傭人奴不肖，但有拳勇鬪狠，卽收名麾下衣食之。遇孱弱，卽噬之，必見骨。各置兵器，先造謠言，如魚腹陳勝王故事，謀於八月中大舉，適牌樓市有黨百人，專劫掠里中。劉河廳官兵勦之而散，里人氣沮。會南都立，而巡撫祁公彪佳至，祁爲繡衣時，威素著，人各惴惴，緣此不果。』

其爲首者爲顧慎卿。研堂見聞雜記云：

『顧慎卿者，烏龍會劇者也。爲徐宦家奴，老而黠，素爲衙蠹，販私鹽，行不法。烏龍會起，遂奉爲謀主。其子培皆拳勇，部下與東西分割爲帝。慎卿主東，而西之悍者不如東，豺虎成羣。最橫者莫如金孟調一事。金亦徐奴，家千金，已蚤世，其妻陳氏，一嫠婦，可立噉也。某日晚，忽鳴鑼聚衆曰：「有不出兵者衆誅之！」於是合鎮持竿走，其數千人過陳氏門，卽大噪，合鎮破膽。未至金氏門，卽聲言草薙乃已，復有從中爲調人者，謂必千金可解。斯時性命懸庖廚，卽立許，過其門，復移頓良久方去。次日，則白米三百石，白金六百，狼藉於市。前諸武弁以此脅之，得賄若干，而李州守亦得其詳，欲借此

逼其金，遂發一硃單，拘至官，責二十五，監繫數日，行金上下，共費千金，遂釋。未幾而吳總府者，鎮安東，以搏繫爲名，廉得其假官劫詐情。蓋顧慎卿於八月後，懼人訐發其私，行金上下，假借武弁名色，以箝制人心，而吳總府知之，突差數健卒，并裨將一員，至沙溪，時顧方出外，卽縛其子至舟中，而慎卿方從外洋洋歸，其妻痛詈之，遂自赴舟中就縛。既至州，吳總府鞫之，責五十繫獄待訊，總府欲置之死，而被害民人，無一證者，後竟不死，竄居常熟。」

至烏龍會騷擾之情狀，研堂見聞雜記云：

「大兵渡江，鋒燄遂起，五月十二日聞信，十四日卽數百人執兵，其魁裝束如天神，鳴鑼吶喊，銃聲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卽要諸大姓金帛，諸大姓不卽應，以危言相撼，聲言某日劫某姓，先臚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寢息，忽號於市曰：「東有數百人至矣，各執兵，欲焚市矣。」於是人人各從夢中驚起，抱兒女，攜囊襍，啼哭四奔，婦女雜坐，雖大家閨女，一青布蒙頭，道路如織。及里人執兵迎出，虛無一人，蓋鎮東有無賴數百人，與烏龍樹敵，此其黨中自驚也。至十九日果大集黨數百人，駕飛神槍，鼓行至，會中亦悚首腰袴，提戈而前，相持於鎮東吳家橋，自晡至夕，礮聲不絕，及晚乃散，是夕奔走者復累累，蓬門破屋，填塞子女。」

由上諸文，可以知道奴僕操戈，擾亂治安的情狀。奴變的事，太倉以外，最利害的，則爲上海。孫之騷二申野錄卷八甲申四月條云：

『是月上海二十三保視（原書作視疑誤）聖堯家羣奴持刀，弑主父子。立時焚燼。延至各鄉大戶，無不燒搶。又有顧六等倡率各家奴輩入城，先至紳家索鬻身文契，其家立成齏粉，主被毆辱，急書退契焚劫，大室爲之一空。』

其次若嘉定，瀨陽吳淞崑山南翔都有奴變的事，以下是陳君搜輯的材料，我把他鈔在下面：嘉定的奴變，黃淳耀陶菴集送趙少府還郡（松江）詩序云：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弘光立後一日），於潛趙公自嵩江少府來攝嘉定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淞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釁者。適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備竈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顙呼號。乞一旦之命，幸得不殺；即燒廬舍，飲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迺與公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衆爲稍定。……說者謂嘉定之變，實前此所未有。……』

邵廷采思復堂集卷二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公傳云：

『嘉定華生家奴客爲亂，踞坐縛主杖之，所在數萬同時起，公捕斬數人，餘悉掩獄，令曰：「有爲原主保者，貫其死。」于是諸奴皆膝行搏頤，乞原主赦免，乃募人爲蒼頭軍，親教戰。』

瀨陽的奴變。陳其年廬文集卷一許漱石詩集序云：

『余家陽羨，距瀨陽（卽溧陽）不百里而近，申酉之際，江南大殺傷，而桀黠奴之變作。瀨陽潘姓者，彭氏家人子也。旦日大置酒會其屬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則相與揭竿起，困辱其主人，白晝橫刀市上，乘風縱火，延燒數百餘家。後省會悉發兵，捕獲潘姓者磔之，夷其家。又數年余過瀨陽，瀨之長老泣爲余曰：「使許使君爲令時，得再展一月，此輩無噍類矣；何至有今日。」許使君者諱某，號漱石，楚之漢陽人，丁丑進士，筮仕瀨陽令，撲滅邑中大猾十數，將次及潘氏子，會使君去卒解。』

吳淞，崑山等處的奴變。近人皇甫氏勝國紀聞云：

『明末蘇屬有奴變之禍，其禍起於吳淞富室瞿氏，有奴名宰者，瞽一目，揭竿爲亂，聚黨千人，手刃其主。一時各富家豪奴應之。如大場支氏，戴氏，南翔李氏，崑山顧氏（按卽顧亭林家）均罹

其禍。其禍至清初未止。康熙間各富室不敢蓄奴。」

浙江石門奴變的事情，呂公忠撰呂晚村先生行略云：

「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劫盟寢室，二伯父旦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密書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強欲坐之，先君執不可，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友歡，不顧也。」

這是呂留良家裏也受奴變之害。所謂「錢課考覆」大概指奏銷案而言。

江蘇金壇也有奴變的事情，消夏閑記摘鈔上：「康熙壬寅金壇逆奴之變，縉紳罹禍最慘。」說已見上，茲不另舉。不過康熙壬寅是康熙三年（一六六二），這是奴變發生最晚的時期了。

其在山東也類似有奴變的舉動，我在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裏找到一條，其文云：

『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與胤全家殉節，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乘亂聚衆爲羣盜，亦非義師。』

這是一種變相的奴變，乃託以義師爲名，可見明季的大戶，沒有不受奴僕的害的，所以勝國紀

聞說：「康熙間富室不敢蓄奴。」不過北方的奴僕是僱募，所以受的危害，比南方少。杜于皇變雅堂集卷三癯老僕骨志銘，說的很好。其文云：

『甲申乙酉間，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僕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既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爲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飢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冒主人矣。』

奴僕猖獗至此，當時士大夫真不敢再用奴僕的樣子。像義勤這樣的人，可算是「鳳毛麟角」了。但是社會上紳士們，是站在有地位有身分的地方，在明清之際，無統制力的局面當中，奴僕們可以作跳梁小醜，鬧一下子。及至地方有幾個賢長官出來，這種奴僕的運動即歸平息，但在清初同時又發生箝制人民思想的策略，一般書獃子要懷著民族的心理，要來抗命新朝，所以就有通海奏銷等案發生。那些無智識的奴僕，只貪著發財，那管主人的性命，所以就有「告訐」的事情出來，如今略帶著說明告訐。

(二)告訐。奴變最激烈的時期，我們可以說是崇禎的末年到順治初年；發生告訐的事情，是在順治六七年後到康熙初年。在這個時候，社會上成了一個變態的狀況。清初大儒顧炎武就身受其害，我們是知道的：他第一次受家奴陸恩的害（註二）第二次受黃培詩獄之累。張穆顧亭林年譜引亭林贈路光祿詩序云：

『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繫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懇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註二）孟範孫先生云：亭林所遇之里豪卽葉方恆，顧業成讐，久而不解。至方讜與徐氏兄弟同官相厚，轉敬亭林，其讐始已。

上文所說陷以重案，這不是抗清通逆的事情嗎？至黃培詩案，據張譜引亭林手蹟謂：『姜元衡者，萊州卽墨縣故兵部尙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等一十四人逆詩一案……稟稱有忠

節錄即啓禎集一書，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即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會剃頭之證，有顧推官（咸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以奴告主，當時的清議固已不容，這一案又牽連的人約在三百人以上，大家都爲亭林湔雪，亭林纔免於難，把首告的殺掉，這案就算完結了。現在啓禎詩選業已發現了書中遭忌諱的地方很多，要是當時的人切實的究問起來，恐怕連累的人要和莊氏史案差不多。陳君所引陳其年迦陵文集卷三贈周櫟園先生序，也有講告訐的事。原文云：

「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裝者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愕，倉卒不知所出。公直前上謁。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鞞鞞而白晳何爲者？」公嚙指曰：「君貴人，我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探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董宦室者反詞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構，姑詞之。第君馬勞，不宜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者喜。越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活人，類如此。」

到了康熙初年，政治已經上了軌道，奴變和告訐的事情，漸次的消滅；但豪奴放縱的情形，依然

存在。若徐乾學徐元文的家奴，還是炙手可熱。顧亭林與潘次耕札云……「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趨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微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免而已。」近來故宮博物院在懋勤殿檔箱內，發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江南士庶控崑山巨紳徐乾學，徐元文，常熟翁叔元等「豪奴倚聲，竄虐婁民」的狀子，不下數百起，已刊在文獻叢編內，可以參考。豪奴放縱，倚勢凌人的情形，一直到現在還有這種惡習；不過在雍正年間解放了世僕，那種賣身投靠，和世僕的情形是漫漫的絕跡了。

五 結論

由上文，我們研究所得，豪奴的肇事，要以葦其昌家裏被民抄一件事爲最烈；奴變一事，以松江一府，要算鬧的最利害，其餘各縣，不過均有此普遍的現象。我們可以知道奴變一事，是在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復次，我再帶說幾句話，歷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我們細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穫，所以古代的風俗，和社會的情狀，常常在極小的地方可以發見，吾盼吾國的歷史家，在「高文典冊」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會上瑣屑的地方，何妨拿一點比較，和整理的方法，研究一下呢？

*（附註）我這篇文章，做完了以後，曾請孟純孫先生森修改一過，他爲我補充的材料，都註在每節的下面。他並作了一篇

讀明季奴變考，他指示我兩個意見：（一）是奴隸制度在中國的由來；（二）奴變一事在中國不能算是階級鬭爭。

我對於孟先生這個意見：第一，能補我的不足，極表感謝。第二，我不過考察當日的情勢，並沒有與歐美的奴隸制度階級鬭爭並進而論，但據研堂見聞雜記上說：「男子入富家爲奴，即立身契，終身不得雁行立，間有富厚者，以多金贖之，即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且明季奴有索賣身契和只許一代相統的事，這顯然含有民族階級運動的意味在內。不過孟先生的時代觀念不同，所以主持的意見，也就不一樣了。但是孟先生治學的縝神，我是極端佩服的，謹將原文，附在後面以供參考。

讀明季奴變考

孟 森

剛主先生輯明季奴變事，有階級鬭爭之慨焉。愚於此有以窺中西風習之不同，雖有階級鬭爭之形似，而不可以概論也。蓋其中有自相抵觸之故，如爲奴非奴所甘矣。而有非奴而又樂冒爲奴者，如所云投靠是也。前之奴既變矣，而後之投靠者未已，則所謂鬭爭者安在？世界之所謂奴變，莫大於俄國農奴之反動，剛主殆有鑒於此，欲以明季事比附之，動人警省耳。其前則更有一大奴禍，因主張畜奴與否之不同，造成南北美之大戰，奴不能自變，仁人義士代以國力爭之，而畜奴者

則亦以國力相抗，事關社會經濟，以與人道相背，而卒有以變革之，此則階級鬭爭之真相也。吾國畜奴之制，其發源即不爲贏利而起，考其最初，所以爲奴者有二義：一則犯罪發配，二則戰敗被俘，總之皆刑戮所赦之人。說文云：「奴婢，皆古之皁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藁。」此周禮秋官司厲文，注：「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皁人之官也。」蓋罪人爲奴，本由國家收籍，秋官辜隸，地官舂人皁人，專收容此奴，配役而給以食，其後役不勝配，亦食不及給，則分逮仕宦之家共畜之。奴婢古亦稱臧獲，初學記引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愚謂獲之爲義，當指俘獲。要之，奴制之由來，初不爲利，乃古時一種刑法。有犯而當其罪，無可歸怨，後來貧乏不能自給之人，轉慕此人奴之有賴於其主，因亦效爲之，乃有自鬻之事，要皆非由怨毒而起。王褒僮約所云：「課役煩重，因其奴桀驁而以此折之，知過即已。」較之美洲畜奴，俄之農奴，純以牲畜待遇者，吾國自始無此用心也。以故剛主所輯事實，亦不一義，樂於投靠者既入之。（槓按：此爲奴僕豪縱之成因。）更有縱容其奴，欺壓鄉里姻戚，致激事變者，亦入之。（槓按：此爲背主投靠豪家，所舉例三之故事。）其鼎革之際，綱紀廢弛，報怨逞威，事所恆有，吳下饒沃，

有力之家，餘潤逮其童僕，儼然溫飽；又有餘力培植其子姓，至科第仕宦，亦不可謂非其主家之惠矣。所謂仇怨，亦不過主家靳禮貌相待，恆以故意，不屑視爲同儕，要之，此爲極少數之事；卽有之，亦祇可謂此數人間之恩怨。非如外國成社會間之階級也。然而吾吳因明季之禍，得有識者之箴言，畜奴之風遂渺，小懲而大誡，不可謂非國人之明且哲矣。畜奴易爲雇傭，已無從前羈絆之酷。若由平等之道言，雇傭在雇主與受雇者間，不應有尊卑之別。雇者因其力之所不能，或時之所不暇；受雇者以其所能所暇而承之，通工易事，以相利益。今果明乎階級之非，則何以一國之汲汲皇皇者，求官則曰乞獎拔之恩；與人官則曰施援引之惠；由是赫然有氣餒之相壓焉。是亦猖獗於奴變之初，而踴躍於投靠之日之類也！剛主於此，亦可暫勿容心於階級之鬭爭矣。

附錄二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

一 敘說

清初遷界一事，流毒於吾國沿海一帶最深。然史家多未能道其詳，王先謙編東華錄：順治十四年三月，載有黃梧一疏，然止言防禦鄭氏，未言遷界之事。至十七年六月，僅有調蘇納海爲兵部尙書一條。至康熙二十二年冬，有命吏部侍郎杜臻等至閩粵江浙勘沿海邊界一條；若非熟習其事者，則不知上所云爲何事！

大抵清初對於漢人，頗爲歧視，清兵南下，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在稗史，吾人多能知之。及清朝定鼎，則外假以懷柔之意，以要譽於漢人；實則對於虐刻漢人之事，乃深諱之。其深諱之事，如順治十八年奏銷一案，江浙一帶，殃及萬人。雍正間呂留良曾靜一案，曾撰有大義覺迷錄一書，後反禁之。

乾隆間之搜查禁書，如彭家屏藏野史致禍，莊氏史獄諸案，以及刪改實錄諸事，此其犖犖大者。遷界一事，蓋亦猶如以上所舉諸案，清廷所深諱之事也。

遷界之事，殃及沿海江浙閩粵魯五省人民，其成禍之因約有三端：（一）由於清廷之畏鄭。（二）由於鄭氏之軍法之過嚴，將吏多降入清。（三）由於明季遺民之通海。此事實爲清初東南一最不幸之事，凡順治十七年以後，奏銷、通海、禁社盟諸事，皆與此事有關，若一明此事，則連帶諸事，皆可迎刃而解矣。比來流覽典籍，略有所獲，排而比之，以見其事之大要云爾。

二 遷界之始末

遷界非止一次，亦非一時，受禍之地，亦有輕重之異。當丙戌己酉之後，（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弘光帝由崧已被執，殂於北平，隆武帝聿鍵已殂於汀洲。有明大勢已去，清兵直下，勢如破竹。當時能與清廷對抗而清廷尙生畏懼之心者，惟唐王賜姓之鄭成功，及魯監國之張煌言張名振耳。彼等所居者，均爲沿海島嶼之地，名振等則奉魯王居於舟山。先是成功之父芝龍本出身海盜，曾居臺灣（見江日昇臺灣外紀）後依唐王，未幾降清。成功則未忘明室，起兵鼓浪嶼，佔據金門廈門諸島，踞有福建沿海之地。名振、煌言等相繼歸附，北趨浙紹，南窺惠潮，爲有清一大勁敵，清廷實亦畏而懼。

之。

成功抗拒清廷，爲時甚久，直至清順治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成功大舉北伐，五月至崇明，六月破瓜州，下鎮江，會師金陵。張煌言則別師下蕪湖，太平，寧國，滁，和，徽，池諸郡，當塗，蕪湖，繁昌等二十四縣，相繼俱降；卽杭州九江義憤之士，亦有羣起而應之者；聲勢赫赫，何其壯也（見夏琳海記輯要諸書）。

當鄭氏之北伐，清廷實亦有所準備，然江防之滾龍鎖（卽滾江龍）先已被鄭氏材官張亮斬斷，（臺灣鄭氏始末卷四）所向無前，據計六奇之明季南略言之最爲煊赫，卷十一鄭成功入鎮江條云：『……鎮江至瓜州，江面十里，大清朝守臣用巨木築長壩，截斷江流，廣三丈，覆以泥，可馳馬左右，木柵有穴可射，砲石盤銃，星列江心，用圍尺大索，牽接木壩兩端，以拒海舟，凡費金錢百萬，壩始成。……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泊焦山，先遣四舟，外蒙白絮，內載烏泥，操舵數人揚帆而上。大清兵望見，大發砲石，海舟近壩，從容復下，大清兵注射，砲聲晝夜不絕，有如轟雷，可聞三百里，凡發砲五日，不傷一艘，海舟旣上復下，循環數次。一以誘大清砲矢；二以水兵藏內，近壩卽入水砍斷。……其敘鄭氏之由鎮江登岸，步兵之銳，嚴不可當，如云：

「……大兵馳騎突前，鄭兵嚴陣當之，屹然不動，俱以團牌自蔽，望之如堵。大兵三卻三進，鄭陣如山。遙見背後黑烟冉冉而起，欲卻馬再衝，而鄭兵疾走，如飛突至，前殺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斫馬，一兵斫人，甚銳，一刀揮鐵甲軍馬爲兩段。蓋鑄刀時，用鐵匠百人，挨遞打成此一刀，故銳特甚……」

所謂滾江龍者，據全祖望張蒼水墓誌所云：「大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又沈雲臺臺灣鄭氏始末卷四，敘鄭氏及煌言之北伐，特詳，茲不具引。右上敘諸條，不無揄揚過甚，然清廷畏鄭之強，可以概見。勦之既不可已，撫之又不可能，是以有此堅壁清野，遷界之舉也。

然遷界之事雖發於清人，而實動議於鄭氏之降將，而遷界首功禍及五省者，首推黃梧，蓋成功軍紀極爲嚴刻。如其子經，淫其乳媼陳氏，至必欲斬之。鄭芝鵬失守廈門，斬之。施琅因得罪潛逃歸清。據海紀輯要云：

「賜姓自興兵以來，軍律嚴明，禁止淫掠，犯者立斬。城破之日，諸軍雖爭取財物。遇婦人在室，則卻退不敢入，遠近稱爲三代之師。」

嚴以御衆，不能寬以濟人，實成功之爽德，故將士多降清，而清卽以利用之，若黃梧者是已。故滅

鄭氏之計不在遷界，而實在以招撫鄭氏之將攻鄭氏（姚啓聖之攻臺灣即基於此，見全祖望姚氏第二碑）若遷界者僅足禍五省之民而已。

黃梧以海澄叛，清封爲海澄公，在順治十三年，其後梧即獻平海策，以作報効之地。據王先謙東華錄順治二十八十四年三月海澄公黃梧奏：

『鄭成功未及勦滅者，以有福興等郡爲伊接濟淵藪也，南取米於惠潮，賊糧不可勝食矣；中取貨於興泉，賊餉不可勝食矣；北取材於福溫，賊舟不可勝載矣。今雖禁止沿海接濟，而不得其要領，猶弗禁也。夫賊舟飄忽不常，自福興距惠潮，乘風放浪，不過兩日，而閩粵有分疆之隔，水陸無統一之權，此成功所以通誅也。宜敕沿海督撫鎮臣，商度防海事務，平時共嚴接濟之處，遇賊備加堵截之防，臣專一整飭馬步舟師，視賊所向到處撲勦。至羣賊伎倆，臣所熟悉，破賊機宜，臣籌之素矣。抑更有請者，成功之所以稔惡，倚其父芝龍，陰通家信，搖惑民心，故逆黨堅不悔禍，誠嚴禁芝龍父子不許音信往來，成功將立見敗亡也。』

此疏僅云令沿海邊疆，統一職權，庶不至成彼竄此捕之勢，後之能數省遷界即基於此；然猶未言遷界之計。此疏雖言禁其父子音信，然猶未言殺其父，發其祖塋也，意者此疏經乾隆間修改實錄，

竟或諱之，惟江日昇之臺灣外紀則言之極詳。外紀卷十一云：

『海澄公黃梧一本內密陳滅賊五策：

（一）金廈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則不攻自滅也。

（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檻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海賊船隻無可修葺，自然朽爛，賊衆許多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三）其父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負販，時通消息，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

（四）成功墳墓現在，各處叛臣賊子，誅及九族，況其祖乎！悉一概遷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脈斷，則種類不待誅而自滅矣。

（五）投誠兵官，散居各府州縣，虛糜錢糧，倘有作祟，又貽害地方不淺，可將投誠官移住各省，分墾荒地，不但不散其黨，以絕後患，且可蕃衆而足國也。』

此數條所記，始將其遷界發墓，及安插降員諸事，詳晰明白，不但禍及鄭氏，並欲與己同類之降員而禍之矣。夏琳云：「害及五省，人罹其禍，」未爲過之。此疏既上後，清廷交密議，大概此時並未全體施行；然如是年丁酉，王棄舟山，清廷卽遷其民。黃宗羲舟山與廢所云：「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此爲遷界之最先受害者。至順治十七年庚子，成功既北上不獲，退守金廈二門，繼取臺灣，海事空疏，而煌言又敗，散兵與竄，當時海邊亦無扼守之人，清廷不得不肆其計。是年六月，蘇納海由工部尙書調兵部尙書，東華錄所記僅此一條，蓋亦諱之。惟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宰輔九蘇納海傳云：

『順治十七年擢工部尙書旋調兵部。是時，海賊鄭成功踞臺灣，四出劫掠，有言瀕海居民宜移之內地者，蘇納海同侍郎宜理布奉命赴江南浙江福建會勘定議。』（國史館本傳）

是時福建總督爲李率泰，浙撫爲李之芳，黃梧亦在福建，與福督李率泰會同勦鄭，躬與遷界之役。（漳州府志）故沈雲臺灣鄭氏始末卷四云：

『九月（十七年），李率泰奏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內地安插。』

東華錄康熙三十五所言略同，此爲遷界之嚆矢；而海澄公黃梧則首禍及桑梓者也。是事之發生，固由清廷之肆虐，亦由鄭氏利取臺灣，不計沿海之民之過。蓋鄭氏急欲得基本之地，以作海外扶餘，亦足見其暮氣矣。惟當時清廷大臣亦多反對此事者，茲分兩方面述之：

（甲）當日清廷撫臣雖有反對之事，然皆未見聽用。如臺灣外紀卷十一，所載湖廣道御史李芝芳，以自古養兵原以衛土，未聞棄疆土以避賊者。上疏曰：

「山賊海寇，何代無之；但當制馭有方，使民獲寧宇。未聞堂堂天朝，遷民避賊者也。夫遷民事勢之不可者，今竊爲陛下陳之。聖朝仁政，以得民爲本，萬民歸心，以輸納爲先；五省沿海一帶，遭逆塗毒，正供雜派，輸將恐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深可憐憫者也。梁惠易粟，孟子短之，今詔諭欲徙沿海居民，何以垂訓後世，此臣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明政不修，逆闖犯闕，北京淪沒，我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黨，救民於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家，今中左彈丸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其如天朝體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膽破心寒，今已遠遁臺灣，所存餘孽，或勦或撫，呼吸可定，況沿海皆我赤子，一旦遷之，鴻雁興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歸彼。是以民予敵，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有遷頑民於洛邑，尙得田宅，以優養之，設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禮義，而

無異心。今欲遷沿海一帶，當其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棄田宅，罄家產，別墳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洫也。爲民父母，豈忍若是，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土薄，一夫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尙捕魚買販以補不足。聖諭頒下，欲酌給田宅，安插餘民，然遷實多方，民無所措，且當道者未有處置，惟催趕日促，使民而逃。貧者將積數日之糧，富者而軼數月之儲，逼處內地，無家可依，無糧可食，饑寒逼而奸邪生，不爲海寇卽爲山賊，一夫持竿，四方響應，其若之何？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時，求海濱六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賦盡輸軍國之用，尙欲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持正以爲不可。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半，當道者不思制插安民，只欲盡以遷移，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殲滅，未必能盡降，而國家先棄五省之地土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鹽爲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啻數千萬，土產之物，百倍其利，況乃日用之需，鹽更五穀之輔，一日無鹽，物將日腐。且土產年例解京，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七也。夫郡縣內地，亦賴邊界以捍禦，故朝廷設邊界爲郡縣藩籬，亦以衛民，今兵不守沿海，盡遷其民，移居內地，則賊長驅內地，直抵其城邑，其誰禦之？不知守內地之兵，發一半守邊界衛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戰守，使賊不敢睨視邊界，如是則內地免守，所謂不可者八也。當道者不爲深謀遠慮，操一朝之權，棄百姓過于反賊，萬一不順，向誰之咎。疏

上留中」

按李之芳山東進士，甲寅之變，爲浙江總督。窺當時此項奏疏，尙不止此，惟覓其史料，殊爲不易。既遷界之後，撫臣目睹遷界之苦，而爲挽救之計者，如乾隆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載康熙十二年福建總督范承謨條陳閩省利害一疏，疏云：

「閩人活計，非耕則漁。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已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化爲斥鹵，老弱婦子，輾轉溝壑，逃之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子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饑寒迫，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爲良民矣。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姓更生之會，而閩地仍以臺塞爲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三。且臺塞離海尙遠，與其棄爲海藪，何如復民爲業？如慮接濟透漏，而此等遷民，從前飄流忍死，尙不肯爲，非今若予以恆產，斷無舍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卽釘、蔴、油、鐵、絲、綢、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士棍，有力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何由而濟？如慮區近沿海，難免寇踪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堵禦要害，則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爲控扼嚴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

之時，海逆不無窺伺。伏乞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舊防備，應更移者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則門戶既固，而遷民所以開墾復業，無以糧齎寇之憂，無透越接濟之慮，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著也。』

此證遷界非止一次，康熙十一二年間有復界之事，據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十三年耿逆之亂，遷民悉復故土，范氏之力居多。又廣東巡撫王來任曾以遷界累民，卒於任所以遺疏力爭，疏惜未見（事見廣東通志）。

（乙）遷界之起，實由鄭氏之得臺灣，無暇顧及內地。昔日則思明州爲根據之地，故沿海之民，尙不至有遷移之累，及居臺灣則鞭長莫及，正可以爲清廷利用防鄭之計。在鄭氏之內部，臺灣本尙饒富，實無大關係（詳下條），而對於外部之發展則有莫大之阻礙，顧以鄭氏之剛愎，故無人敢爲言其事者，僅有張煌言上延平王一書，可以見鄭氏之失計，惜鄭氏亦未聽從之也。張蒼水集卷二，上延平王書略云：

『今虜酋短折，孤雛新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權，離畔疊告，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澣如虎，』

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爲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姓棄田園，焚廬舍，宵啼路處，蠢蠢思動，望王師何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汛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僞令，則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思亂，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預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旣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況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瀝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匪朝伊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構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敗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爲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卽錢鏐竇融，亦不足並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踪，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卽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鑑，九仞一簣，殿下寧不自愛乎！「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鮮，又非可以語於今日也。」

此書「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二語，實爲奮發有爲之格言，在興復方面言之，鄭氏之得臺灣，實爲失計；然在鄭氏，實亦有不得已者。此書雖未見聽從，然觀臺灣鄭氏始末卷四有云：

『成功因議取臺灣，招沿海之不願內徙者，屯田其中，以益軍儲。』

觀此語，似卽爲補救煌言之書所言而設。又李之芳疏云：「鴻雁興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歸彼，是以民予敵。」似非無因而發也。

然遷界之後，人民流離，成功實亦悔之。海紀輯要云：

『聞清遷界，賜姓懾然曰：「一舉數省幾萬里魚鹽之地，無故而棄之，將士塗炭，生民豈得計哉。清之技亦窮矣。吾養精蓄銳，天下事未可知也。」』

所謂天下事未可知者，未幾成功卽殂，永無恢復之望。自成功東後，沿海一帶已無義師之蹟，人徒有思明之心，而無起義之機。健者如張蒼水，僅可散兵懸壘，已無用武之地，求一片乾淨土而不可得矣。其文集卷三答趙安撫書略云：

『今執事旣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爲意，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海上之師。在清人旣能開誠布公，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亦何惜講信修睦，且休兵以待天命。不佞與執』

事輩從容羊陸之交，往來僑胥之好，既省墩堡守望之戍，并免舟楫營繕之需，藉我外兵以備他盜，因而煎熬則鹵鹽可行矣；因而採捕則魚鮮可給矣；因而貿遷則商賈可通矣；匪直暫解兵爭，亦以稍甦民困。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斯在。特恐執事畏耳，畏則無成也；又恐執事疑耳，疑則又無成也；不佞何心，必欲重困此一方民哉。則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故里，則不佞卽當夕挂高帆，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訓之區，嘗膽臥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則臣靡尙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正統還歸漢胄，惟執事圖之。」

以蒼水之名臣，有清之勁敵，僅惟有向殘黎請命，得各還故里而不可得，以是知明勢之微矣。雖欲如昔日明季遺民，懷志恢復，通海求援，豈可得乎。

茲將遷界雙方之內容已明，然後言遷界前後實施之始末。遷界之事由黃梧作俑，故首起於閩，所以起於閩者實有其因在。全謝山鮎埼亭集卷十五，姚公神道第二碑云：

「初，閩人堂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蜃之利，而閩益貧。」

遷界起於閩，由閩而浙而吳而粵，沿海一帶幾無地不受其禍，姜宸英湛園未定稿海防篇，言其始末最詳，茲錄其文於后，再將遷界之地，及遷界之時代，分別而言之。海防總論擬藁云：

『……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間，尋奪臺灣居之。遊踪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八年有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兵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詣各省開界。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事竣奏聞，遂盡復所棄地。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徧於占城，暹邏，真臘，滿刺加，淳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推關四於廣東，臺灣，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涖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於是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由此文而觀，吾人可知者，康熙初年徙民內地，八年有詔，稍展界，至廿二年始令開界，此文所云

十九年福建總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當係姚啓聖督閩時。平定海寇紀略卷四云：

『康熙二十年二月辛卯，命展沿海遷界，總督姚啓聖巡撫吳興禮先後具疏，請開遷界，俾沿海人民復業。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前經大將軍康親王等奏請已令展界，嗣因海寇竊據海澄，復遷界，移居民於內地，今金廈雖復，賊集未滅，事關重要，應令福建總督巡撫提督定議奏聞。上諭金廈門諸處已設官兵防守，應如該撫所題，照舊展界；如有姦民，借此通賊者，仍令嚴行察緝。』

似此文所云二十年，始有展界之令，然仍戒嚴，至二十二年，鄭氏平後，始實行開禁耳。其他記遷界者，海紀輯要云：

『閩海以賜姓故，歷年用兵，捐師糜餉，清患之。蘇納海等議曰：「臺灣兩島，得遂猖獗者，實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盡遷入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之氛，盡鳥獸散矣。」從之。分遣滿員督遷各省之界，千年生聚，一旦流離，死亡疾病，慘不可言。』

此段可以知黃梧奏後，經蘇納海等按議之，而是事遂成。

來集之倘湖樵書初編卷九，遷海條云：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恆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遷入內地，其觀望不卽遷者，移兵勦誅之。其邊海州縣所遷之民，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此條可知遷界一名遷海，海島卽指舟山諸地，特未敢顯言之耳。

又國朝耆獻類徵卿貳 金世鑑傳，可以知復界之情，其文曰：

『是時海氛雖靖，而邊界之禁弗弛，民多失業。二十二年，有詔分遣大臣巡歷海疆，其地之可以界民者，悉與清理。於是公偕副都御史雅公，越江浙，同地方大吏，徧閱沿海形勢。因歎海濱餘黎，凋瘵日甚，假使結桴而漁，亦何至觸冒禁網，而顧令坐困若是。遂奏請復溫台寧三郡界外民田九十餘頃，鹽田七萬四千七百畝有奇，要害地應設防者，仍分兵戍守，其餘一切奏罷以省冗食，自是棄田盡墾，營利亦定，民生安堵，僉以爲子孫百世之計。』

由上諸條，吾人所欲知者：一爲時代次數；一爲遷界之防備及疆域里數；茲先言時代，由上文已可知其大概，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有一條，可以補其缺。其文云：

『康熙十八年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險要，各築小寨，防守以界牆，耿逆之亂（康熙十三年）』

遷民悉復故土，及康親王平定閩疆，疏稱遷界累民，聽其自便，至是督撫遂再遷焉。」

按康親王名傑書，國朝耆獻類徵宗藩傳表未言康親王疏稱遷界累民之事。綜核而觀，以上諸條，可以見遷界共爲三次，而各省情形時有不同，詳下各省條。復次則爲遷界之里數。重纂福建通志海防篇云：

『國朝順治十八年，遷沿海居民，以垣爲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

又郁永河僞鄭遺事云：

『暨乎遷界之令下，江浙閩粵，沿海居民，悉內徙四十里，築邊牆爲界。』

阮元修廣東通志邊防篇有云：『再徙內地五十里』由上吾人可知者，遷界後則築邊牆爲界，其距離海面約在三四十里之間，而時亦有遠近之異。既復界後，始令人開墾，樵採漁牧，可以航海行舟。徐懷祖臺灣隨筆云：

『海濱弛禁以後，人置漁舟，家有商舶，惟商舶可以航海，凡使節往來咸藉之。』

於是知濱海之民，始得來往樵採航行之自由，而在他方觀之，遷界之事究與政府亦無甚益也。

故東華錄康熙朝卷三十三云：

『二十二年冬十月，命吏部侍郎杜臻等，閩粵江浙，勘沿海邊界，招墾荒地，復諸遷民業。』

吾人既明以上所引諸文，然後知所復諸遷民業者爲何事？最後吾引吾人所欲遷界首功黃梧之傳，以爲吾文此節之殿。康熙漳州府志人物黃梧傳云：

『黃梧字君宣，平和人。幼喜任俠，鼎革時，八閩雲擾，海寇縱橫，梧入海中，因亂籍鎮海，旋以海澄歸我朝廷，因封公爵，錫名海澄，因大將軍達素攻廈門，以功進太子太保，乃上疏請蒐三島，既奉命，同總督李率、泰固山、郎賽率所部連破廈門、金門等處，降獲甚多。三島既蒐之後，會有遷移之役，海濱流離，投誠既衆，輸餉孔艱，朝廷乃悉令歸農，而編其五千人入伍，俄復移屯江西河南，僅存千二百人爲公標，授梧一等公，世襲十二次，留駐漳南。』

此則可知黃梧遷界之役所得之爵祿，而至首倡遷界之事，則其傳諱之。但其子芳度、海澄失陷降於鄭氏，卒被鄭氏殺戮之禍云。清史稿黃梧傳言之尤詳。

三 各省遷界狀況

上文既將遷界之始末述明，茲復將上文所言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諸省遷界之情形，分別而言之。大抵，遷界一事，福建受禍最甚，其次則廣東、浙江，而山東似未甚受其禍。

(甲) 山東

沿海諸省，雖有未遷界之處，然沿海之地，當康熙初年，皆有釘椿墩戍之設，重則禁人採樵，歷檢山東通志諸書，記遷界之文甚鮮，蓋處僻遠，鄭氏兵力所未及，故清廷亦未注意及之也。

(乙) 江蘇

江蘇一省，有遷界之事者，亦僅有沿海要塞，福狼山一帶之地，及海州雲臺山諸處，其他處則增設海防耳，茲將康熙江南通志所載，關於增防諸處，所記諸事，鈔錄於下。江南通志海防云：

「海州」東北，隔海相望，有雲臺山，國初嘗遷撤雲臺，釘塞海道，至康熙二十年，始議開復，設東海營鎮之。

「揚州」沿海之邑，康熙十一年添設遊擊鎮其地。以泰州以北，歷興化至鹽城，皆爲范公堤護之地。

「崇明」卽三沙之地，周五百餘里，孤懸大海，四面受敵，西北望通州，西南望太倉，雖呼吸可通，而皆爲滄波所隔。國朝順治十年海寇張名振，駐泊東阜，平安二沙。十六年鄭成功據排沙，康熙二十六年周雲龍藏匿舟山，皆爲崇明切膚之患。」

按崇明自順治三年後移蘇州鎮總兵駐邑中，設重兵於此，似未若舟山金廈罹遷界之禍。

「常熟」自狼山而南，與常熟福山相對，爲江海合流，鹹淡分界處，烽戍相望，一葦可達。國朝康熙十九年始開海禁，設立狼福對渡官船二十舸。二十四年復設海關，許民出海貿易，自是狼福之間，往來者項背相望。

「太倉」順治十八年立土寨於山，是年巡視汰城撤守，康熙八年復命大臣會閱始題復。

「松江」郡設墩臺十七座。每墩間懸六里，達於南匯。康熙二年以內墩離海過遠，聲息難通，乃建外塘斥堠，巡防瞭望，內外相資，爲他堡所不及。」

據以上諸節而觀，江蘇雖受鄭氏之影響，但未如浙江福建諸處，受遷徙之甚，如崇明，福狼諸地，但立海禁，禁人民出入採樵，立墩戍，增重兵，以爲防衛之事，蓋江蘇距鄭氏較遠，故受禍亦較淺。然江蘇沿海諸地，容亦有遷徙之事，觀吳嘉紀詩可知，而鄭氏北伐，伐木造舟，抵禦鄭氏，其禍最烈，容下章言之。

（丙）浙江

浙江受遷界之禍者爲溫台寧三府，而舟山爲最烈，舟山之易名定海，卽因遷徙之後，而更斯名。

者，其受禍之烈可知。重纂浙江通志海防云：

『順治十八年，以溫台寧三府，邊海居民遷內地。康熙二年奉命撤沿海一帶釘定界椿，仍築墩臺祭旗爲號，設目兵若干名，晝夜巡探，編傳烽火，歌詞互相警備。四年欽差大臣巡視海邊，每歲輪巡五六次，撤回。七年欽差大臣同總督趙廷臣，由福建沿海出巡，重以提督大帥有巡歷增造艤糧以備戰守。』

其次：遷界最甚者則爲舟山。（即定海），雍正寧波府志鎮海縣條下云：

『康熙二十三年展復海界，賜舟山名定海山，後遂以名其縣，而改定海爲鎮海。』

又定海縣條下云：

『國初爲明季遺頑所據，八年始討平之，旋陷於海寇，十二年再攻克之，遂徙棄舟山爲界外，而以鎮海爲重鎮，然數年內海寇掠鎮之海宴，太丘，靈岩，崇丘，及鄞邑東鄉，忽犯吳淞，犯鎮江，犯江寧不止，夫亦舟山要地，未設勁兵，以爲攔截乎？自康熙初，移提督大帥，駐扎郡城，寇氛漸靖，至二十三年，海宇蕩平，遂賜舟山名定海山，建縣設官，移總兵官鎮其地。』

舟山首當其衝，故江蘇受遷界之禍，較淺者以此，然舟山之民則已苦矣。茲據光緒定海廳志，及

紹興府志舟山與廢諸書述其受禍始末，列表於後：

清順治十三年

徙舟山居民於內地。

清康熙二年

奉撤沿海一帶釘定海樁，下令商舟漁舟不許一舢下海。

清康熙二十三年

移定海鎮總兵於舟山，復界沿海遂定。

清康熙二十六年

舟山置定海縣，因改定海爲鎮海。

舉如右列簡表觀之，則舟山一區，遷徙屢變，據舟山興廢所記，人民盡驅入海，當日之殘酷可知，舉一域，可以知其他之地矣。

(丁) 福建

遷界之事，發軔於福建，而福建受禍最深，其遷界之事，關係全局，上文已詳言之。大抵自遷界之議上後，福建爲首遷之地，鄭氏始末所云：「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內地安插，大概漳泉沿海一帶皆有遷徙之役，清康熙八年，稍展界縱民得採捕，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險要，各築小寨，防守以界（重纂福建通志）。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耿鄭和睦，遷民悉復故土，及鄭經與耿精忠不合，經歷取漳泉汀州諸地，南下潮州，吳三桂爲調停之，不可。於是耿鄭復行交惡，未幾耿精

忠降，鄭氏屢犯沿海諸地。於是沿海之地再遷（據海紀輯要諸書）蓋往復二十餘年，遷徙者再，而人民被騷擾者最甚。記其再遷之役，海紀輯要云：

『十二月（清康熙十六年丁巳）清再遷界。甲寅（十三年）之變，閩省居民遷入內地者，悉還故土。丙辰（十五年）冬，閩歸清，復議遷界，康親王奏言遷界累民，罷之。至是督撫（李率泰）請再遷報可，值破海澄，圍泉州，事暫停，及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自福寧下至詔安，沿海築寨置兵守之，仍築界牆，以截內外，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烟。』

此條敘述閩省再遷之事，甚詳。海外散人榕城紀聞順治十八年十月條云：

『福建浙江廣東南京四省，近海處各移內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露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籍道塗，卽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僦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長樂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二個月，慘不可言。興泉漳三府尤甚。』

然閩省受害最深之處，當爲金廈諸島，及漳泉諸府，因爲鄭氏出沒之地，時爲鄭氏所據，時爲清人所有，往復曷止數次，卽如海澄一縣，據縣志所載，得失往復，亦不下五六次之多，觀下表可知：

清順治十二年

清兵入海澄。

清順治九年

赫文興以海澄叛。

清康熙十三年五月

清人復海澄，又降入鄭氏。

清康熙十六年

清人復海澄。

清康熙十七年

劉國軒陷海澄。

清康熙十九年

清人復海澄設縣。

人民罹此痛苦，復有遷界之役，蓋亦無寧息之日矣。其因遷界影響所及，而病閩者，尙有三事。

（子）絕漁鹽之利。閩省濱海，人民所需者以此，全祖望鮎埼亭集卷十五姚公第二碑銘云：

『公言南海一帶，俱有扼塞城寨，可以列戍，俱有田可耕，而漁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蛟人蜃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牛種，爲國家恤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報可。』

復界之事，卽由姚啓聖所請而起。漁鹽蜃蛤爲濱海人必需之品，此爲人民生活直接之害，姚氏之見，甚當。

(丑)閩省軍隊之複雜。閩亂屢作，駐軍極多。全祖望姚公碑銘云：

『及耿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卽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暗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饑饉，而民之存者寡矣。』

所謂一王者爲和碩康親王傑書，貝子者爲固山貝子傅喇塔，公者海澄公黃梧，伯者都督穆黑林。而王與貝子觀者獻類徵所載貝子之傳，似有不合之意，有詔諭爲調合之。不合之意至以詔諭調處，則當日閩省之紛攘之狀可知矣。

(寅)開修來館。清人之能破鄭氏，不在遷界，而在以鄭氏之降將攻鄭氏。修來館之設，卽基於此。全祖望姚公碑銘云：

『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穀，鮮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間，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況豎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

五鎮大將，廖興，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將之卒，驟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

此事雖爲破鄭之計，而擾人特甚。海紀輯要云：

「清既遷界，遣滿漢兵部戶部郎中各一員，安插海上投誠官，上下相蒙，真偽莫辨，武職率衆降者，照原銜議敘，隻身降者降四級，文官亦降二級補授，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改副使，副將改僉事，參游改同知。或目不識丁，謬膺監司，手無縛雞，濫授總兵。其時博功名者多藉此爲捷徑。」

以上三事，皆與遷界有附帶之關，故并及之。

（戊）廣東

據阮元修廣東通志謂：「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東爲惠潮，柘林，南澳，俱爲扼要之地；中路廣州次之，西高雷廉又次之。」遷界之事，在廣東東起饒平，西迄欽州，以惠潮二郡爲最甚，廣州則在再遷之例，西路高雷廉諸郡，臨海較遠，受禍次之。鈕玉琇，觚賸，粵觚有記遷界一事，其狀至酷。粵觚云：

「甲寅春月，（康熙十三年）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界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跬步，死卽隨之。遷者

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徐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於粵，遺書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字。」

是各省皆有復界之請，此段敘述，流離狀況頗詳，廣東通志邊防篇記其事。通志云：

『明末海寇，鄭芝龍踞臺灣，子成功相繼跳梁。我朝定鼎，差內閣滿洲大臣蘇納海，鼇拜議沿海建墩臺，賊至烽火爲應，以便守禦，徙民內地，以杜奸宄，接濟臺灣之患，粵省東起饒平大城，西迄欽州防城。康熙元年壬寅，命吏部侍郎科爾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南王尙可喜，將軍王國光，提督楊遇明等，巡勘潮濱海六縣，建墩臺七十有三，而海氛未靖。三年甲辰，又遣吏部尙書伊里布，兵部侍郎碩圖，偕藩院將軍提督復勘，令再徙內地五十里。海陽遷去龍溪，上莆東莆南桂四都，秋溪江東水南三都之半，潮陽遷去之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郭峽山舉練三都之半，揭陽遷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饒平遷去龍眼，宣化，信寧三都，惠來遷去上外，中外，下外，蓬洲，鱸浦，鮑江六都。僅存蘇灣一都，增築墩臺八十有四，各設棚欄，以嚴出入。臺臣楊雍建，巡撫王來任，總督李率泰先後疏請，八年春正月，奉旨盡弛海禁，由是撤排棚，添設武營汛防，而臺灣亦旋以蕩平矣。』

此文敘述極詳，吾人可知當日遷界非僅扼要之地，沿海各縣皆有遷界之事，惜他省無此詳細

記載耳。就此所載遷界之地，及觚賸所載續遷五縣，則廣東所遷之地，可以略見。惟此文云八年弛海禁，卽八年展界之事，觚賸所云「續遷」蓋卽指此，此文未載，不無遺憾。至巡撫王來任以死力爭，通志不載其文，究不知其遺疏所記爲何如也。茲將五省遷界之地爲圖以明之。

四 關於遷界詩文之記載

遷界一事，影響於沿海一帶最大，憶當時詩人文士，必有諷詠記載之者，稗乘野聞，其見當日之情狀，必較史家所記者爲尤深。惜當日文網日熾，無人敢記載之耳。無已，則於明季遺民孤臣之詩文集集中求之，其諷詠之際，細惟其意猶或時見其一二而已。張蒼水、明季之孤臣也。其與鄭氏北伐之役，上文書已言之。冰槎集中有答曹雲林監軍書，載其事，其文云：

『弟已移師寄寓沙關矣。種種虜情，已具在前日報文內，不必更贅。獨是僞令遷徙沿海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中，洶洶欲動，惜無一勁旅，爲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媿殺也。弟栖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爲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潮，亦旦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況二阮一陳，俱徘徊閩境，則弟鑿援甚微，然弟之區區，以爲寧進寸，無退尺，寧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

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平原一旅真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

此書在壬寅，卽清康熙元年，正遷界之時，而蒼水亦僅一旅孤軍，難伏處江表矣。陳夢雷松鶴山房集卷十九先室李氏行述云：

「孺人李氏，先岳木長公，閩之福清人。先岳抱負恢奇，不事經生業。明季天下多事，翺遊海外諸國，國朝定鼎後，還鄉里，以遷海故，僑寓浙之永嘉。孺人幼弱，頻經兵燹，寇亂，岳母潘氏提攜轉徙山谷間，草行水宿，瀕死者數矣。是陳亦遭遷界之禍也。」

又有明季詩人吳嘉紀者，亦目睹鄭氏北伐之役，其陋軒詩中有復洲田之詩，似亦有遷徙避匿之事，未久卽復，但未如浙閩之甚耳。其詩云：

「洲田復與民，官長示告諭，故主前來看，猶疑夢未寤，落葉遇回風，衰林尋舊樹。寥寥亂後人，歷歷河上去，烽燧壘尚在，望望生驚懼，十年避兵戈，萬姓凋道路。他鄉溝與壑，一步一回顧。」又云：「斜日寒江流，蓑裳試遶渚，不悟餘黎民，重踐舊田土，廬墓在何處？回顧惟榛莽，雉雞見人飛，狐狸暉且怒。生理何暇計，先須避風雨，刈草覆我階，壘石爲我堵，不復辨東西，向山編竹戶。室成誰

往來，廬中有漁父。」

陸廷掄序野人詩云：「淮河之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疲於奔命，不遑啓處之狀，雖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吳子之以詩爲史也。」蓋紛攘之際，人民之隱衷，社會之疲敝，史家不能詳記其文，幸有詩人詞客，三復而感歎之，然後其旨乃顯，生於百世之後，讀先民之詩歌，往往如目睹其情，身歷其境，吟詠悲歌之而不能自己，於是知生於叔季之世，人民昏墊之苦，賴乎有詩人也。

附遷界始末大勢表

紀	年	干支	西曆	記	明	事	記	清	事
明弘光元年 清順治二年	乙酉	1645	聖安帝被執殂於北京 六月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 閏六月隆武帝聿鍵稱帝於福州 晉安南伯鄭芝龍平國公子成功賜姓朱封忠孝伯				五月克南京始下薙法令 洪承疇招撫江南		
隆武二年 魯監國元年 順治三年	丙戌	1646	隆武帝殂於汀洲 鄭芝龍降清桂王由榔稱帝於肇慶 蘇觀生擁立聿鍵於廣州						
監國二年 永曆元年 順治四年	丁亥	1647	賜姓成功起兵鼓浪嶼						

順治十二年 永曆九年	順治十一年 永曆八年	順治十年 永曆七年 監國八年	順治九年 永曆六年 監國七年	順治八年 永曆五年 監國六年	順治七年 永曆四年 監國五年	順治六年 永曆三年 監國四年	順治五年 永曆二年 監國三年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1655	1654	1653	1652	1651	1650	1649	1648
成功承制設六官儲賢館育館改中左所 爲思明州奉魯王居金門	成功遣將據舟山	魯王自去監國號 五月永曆帝封成功延平郡王	清軍成棟殺其總督來歸鄭氏鄭氏誅之 永曆帝在安隆	魯王入廈門 施郎降清更名環	永曆帝在南寧成功起兵勳王南下揭陽	魯監國駐舟山 三月成功攻漳浦克之永曆封爲延平公	三月成功破同安 定西侯張名來歸鄭氏
	清封成功爲海澄公弗受		郝文興以海澄降鄭氏	清軍克舟山	耿繼茂入粵	吳三桂取川北	

永曆十七年 康熙二年	永曆十六年 康熙元年	永曆十五年 順治十八年	永曆十四年 順治十七年	永曆十三年 順治十六年	永曆十二年 順治十五年	永曆十一年 順治十四年	永曆十年 順治十三年
卯癸	寅壬	丑辛	子庚	亥己	戌戊	酉丁	申丙
1663	1662	1661	1660	1659	1658	1657	1656
成功子經立	永曆帝殂於雲南成功奉明朝仍稱永曆年 號 二月開創臺灣府縣設承天府總號曰東都 五月成功薨	永曆帝入緬甸 成功據臺灣		七月成功由崇明入江直抵金陵張煌言由 蕪湖別取徽寧池州太平滁和諸縣均請降 東南大震	成功大舉圍江南	成功率師北上進攻黃巖 徐孚遠自交趾還 成功棄舟山	黃梧以海澄降 成功略溫台永曆封爲延平郡王仍自稱招 討大將軍
耿繼茂取廈門	吳三桂弑永曆帝於雲南	吳三桂進軍緬甸執桂王於緬甸 請遷沿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 之民於內禁採樵立海禁 清稟鄭芝龍於市 福臨殂玄燁立改明年爲康熙元年	命耿繼茂移住福建	梁化鳳敗鄭成功鄭氏南旋東南黨獄大 起	浙江瑞安諸縣降鄭氏	黃梧獻平海策請發鄭氏墳墓及遷界事 還舟山之民過海死者甚衆	清封黃梧爲海澄公

永曆十八年 康熙三年	辰甲	1664	張煌言散兵縣署被執不屈死	
永曆十九年 康熙四年	巳乙	1665		清遣慕天顏至東寧招撫
永曆二十年 康熙五年	午丙	1666	經遣吳宏濟聘吳三桂	
永曆二十一年 康熙六年	未丁	1667	經率師次澎湖與尙之信響應	
永曆二十三年 康熙八年	酉己	1669		清有詔稍展沿海界地
永曆二十七年 康熙十二年	丑癸	1673	經率師次澎湖與尙之信響應	
永曆二十八年 康熙十三年	寅 甲	1674	經遣入入福州報聘 六月耿鄭交惡入泉州黃芳度以海澄降潮 州總兵劉進忠以潮州降 冬十二月三桂遣周文琪來臺灣爲鄭耿解 和	
永曆二十九年 康熙十四年	卯乙	1675	經破尙之信於鰲母山 六月經攻漳州下之籍黃芳度家	
永曆三十年 康熙十五年	辰丙	1676	經遣劉國軒入惠州	康親王傑書貝子傅喇塔入閩 耿精忠降

永曆三十一年 康熙十六年	丁巳	1677	經棄漳泉諸郡回臺灣所復諸縣皆棄獨海澄未下	清兵入泉州冬十月總督姚啓聖入思明州議和以海澄未下之故啓聖奏請施琅同攻臺灣啓聖開修來館
永曆三十二年 康熙十七年	戊午	1678		吳三桂稱帝國號曰周卽位於衡州改元昭武未幾死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永曆三十三年 康熙十八年	己未	1679		
永曆三十四年 康熙十九年	庚申	1680	經棄海澄棄思明州退遁回臺灣委政於世孫克塽	始開海禁清兵入廈門康親王傑書有遷界累民之奏
永曆三十五年 康熙二十年	辛酉	1681	克塽被馮錫苑所殺經卒世子克塽立三藩平世璠自殺次年殺耿精忠	
永曆三十七年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1682	六月克塽降清六月施琅攻澎湖劉國軒敗績退還東寧未幾臺灣爲清人所有	六月清人克臺灣十月清遣兵部侍郎金世鑑等勘驗沿海邊界招民開墾始開海禁復界

上列之表，於清初東南沿海遷界之關係，可一覽而知矣。

五 遷界後對於臺灣鄭氏利害之關係

遷界之事，原爲堅壁清野之計，以防禦鄭氏，已如上文所云其事之結果，則有害於東南人民實

甚，然對於鄭氏，果足以制止之乎？其實際乃未必然也。

大抵清廷之爲遷界計者：一則嚴立海禁，禁止人民出入；二則制止鄭氏不得與內地交通，絕其供給。以爲此舉，必可平定鄭氏而有餘矣。蓋鄭氏運籌之敏，實有可驚者，郁永河僞鄭遺事云：

『鄭成功以弱冠招集部附，踞守金廈門，雖在海外，密邇內地，閩省沿海港澳，可以出兵進剿者，在在皆是，倉猝攻之，守禦非易，成功於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爲寨，搃守水口，又徧布腹心於內地。凡督撫提督衙門，事無巨細，莫不報聞，皆得早爲之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終不敗事，其用心固已深矣。』

清廷遷界之事，其重要關鍵，所以防備鄭氏者，卽在於杜絕交通。然鄭氏既入臺灣之後，則有非此法可以制止者，茲可分二項言之：（一）臺灣地爲海島，爲未開闢之地，向爲生番所居，自荷蘭入其土，始有建設之事。該處土地豐腴，出產極多，糖蔗稻穀有種必穫，地係初闢，一年三收，而茂林修竹，琉璜水簾，尤其特產，耕種之利，自可坐獲一也。（二）又臺灣自與荷蘭交通，商舶往來，貿易絡繹，東接日本，南去呂宋爪哇諸地，爲貿易便利之邦，鄭氏既得臺灣，欲南取呂宋，齎志未成，尙能保守此土者二也。有此二利，則無中土接濟，亦可自治，況官吏往來，難免私濟，是以遷界之後，尙能垂二十餘年。

者此也。鄭氏既得臺灣，頗有施設，改安平鎮亦嵌城爲承天府，設縣二曰天興，曰萬年，總號曰東都。（以上據海記輯要臺灣通史諸書）其建設之法：（一）則曰屯田。（二）則曰交通。近人臺南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建國紀曰：

『成功曰：爲治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後，乃可足兵。……今臺灣土厚泉甘，膏壤未闢，當用寓兵於農之法，庶可以足食，而後足兵，然後觀時而動，以謀光復也。……籌餉轉輸，屢爲國患，故善爲將者，不得行屯兵之法。』

此殆言其設施之計，其實施之法，臺灣通史卷八田賦志云：

『諸鎮之兵，各分其地，按地開墾，自耕自給，謂之「營盤」。三年之後，乃丈其則，以立賦稅。農隙之時，訓以武事，此則寓兵於農之意也。永曆十八年，嗣王經委政陳永華，永華善治國，分諸鎮土地，復行屯田之制，於是闢地日廣，遠及半線。二十四年，右武衛劉國軒伐大肚番，追之至北港溪，駐軍以戍，則今之國姓莊也。寧靖王術桂入臺後，以竹滬一帶，土厚泉甘，墾田數十甲，歲入頗豐，有餘則散之故舊，不需湯沐之奉，而諸鎮屯田，至今尙留其跡，此則鄭氏富強之基也。……』

當康熙初年，鄭氏之闢臺灣，其每年收入之數，惜無法以統計之，然行屯田，不假外來之產，足以

養兵禦敵，其自衛之力可知。復次：則所言之交通，臺灣濱海，內地既加封鎖，則海外交通，必由臺灣，鄭氏反可坐得其利。郁永河僞鄭遺事云：

「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餘萬，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徧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後通賂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及乎遷界之令下，江浙閩粵沿海居民，悉內徙四十里，築邊牆爲界，自是堅壁清野，正計量彼地小隘，賦稅無多，使無所掠，則坐而自困，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固非無見。不知海禁愈嚴，彼利益普，雖智者不及知也。卽疇昔沿海所掠，不過厚兵將私橐，於鄭氏公帑原無損益。海外諸國，惟日本最富強，而需中國百貨尤多，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爲日本婦所出，因以渭陽有求必與，故鄭氏府藏日盈。自耿逆叛亂，與鄭氏失好，耿兵方圖內響，鄭兵卽躡其後，已據閩之興漳泉州邵，粵之潮惠七郡，養兵之用，悉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爲矣。」

由上之文觀之，鄭氏之所以敗者，由於過事武功，至內不能自給，終至不振，其言雖確，然當清廷方盛之時，縱不出據閩粵，恐亦不能相持過久也。然觀上二證，遷界之事，累吾國東南沿海一帶之民

實深，而無甚大害於鄭氏亦明矣。

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秋八月，清人既得臺灣，乃廷議欲墟其地，施琅獨以爲不可。其奏有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并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琉璜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爾，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噫，吾國肥饒之區，視爲無用之所，而墟之者，曷止臺灣！吾書至此不禁慨然！

民國十九年二月九日，草成於國立北平圖書館。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重改訂於南京中央大學梅廬之旁。